建設

学術性月刊

DEC 5 - 1956
Cont. Copy

10

1956

零售每册三角五分

P
C402
H52

新建設　一九五六年　十月号（总第97期）

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下前进（社　論）……（1）

关于矛盾的对抗性、非对抗性与飞躍形式……黃紹进（3）
——兼論我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矛盾性質

国家資本主义的形式及其变化……管大同（11）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郑廷础（21）

偉大的阶級論者——魯迅……李瑞良（33）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20周年

必須堅持邏輯理論中的唯物主义路綫……李志才（40）

太平天国为什么不准繪人物……罗尔綱（47）

顧愷之的艺术和他的"傳神"美学……馬　采（55）

評介厄斯納著"經济危机"第一卷……苏紹智（62）

編輯者：新建設杂志編輯委員会　北京东單区小甜水井1号
出版者：光明日報社　北京石駙馬大街90号
总發行处：邮电部北京邮局
代訂代售处：全国各地邮局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排版印刷封面：光明日報印刷厂
印刷正文：北京市印刷二厂
預定价目
全年十二期　4.20元
半年六期　2.10元
三个月三期　1.05元
定費一律預收

印張：4　定价：(5) 0.35元　本期印数：（京）29,710

社論

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下前进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举行，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大事，这次大会是我国建設社会主义的里程碑。大会总結了我国兩次革命和国家建設的丰富經驗，用以指导我們今后的工作；大会又規定了我們今后的任务，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为了順利地实現今后的任务，大会又規定了正确的政策和妥善的步驟。这对于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發展人类进步事業，爭取世界持久和平，都有深远的重大的影响。它的各方面的深远的影响，正在并將日益明显地表現出来，把我們的正义事業引向更大的胜利。我們庆祝大会的偉大成功，并願竭尽我們微薄的力量为实現大会的决議而努力。

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一年中間，中国共产党領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極为輝煌的胜利，把中国的面貌根本加以改变。我們珍貴这些胜利，我們热爱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壯丽的明天，我們更是热爱領导我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这次代表大会使我們进一步体会到党的偉大和正确。党是全心全意为了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党是經常关怀人民的福利的，党是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与中国革命实踐相結合的正确原則的，党是不懈地貫徹群众路綫的，党是鼓励和發揮一切积極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党是号召我們向祖国文化遺产、向苏联、兄弟国家和一切外国，学習有用的东西的。这不能不加深我們对党的热爱，使我們更加紧密地团結在党的領导之下。毛主席在开幕詞中指示我們，中国共产党領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这也就使我們进一步体会到学習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要。

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現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經获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結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們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任务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最高利益，因此也就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任务。

这个任务是能够完成的。为了順利实現这个任务，大会根据我們已有的經驗，分析了現时具体情况，規定了各項正确的政策。在这些正确政策的照耀之下，我們已可看見我們各方面的工作將要大为發展和提高。

毛主席在开幕詞中指示，依靠以工人阶級为領导的工农联盟，团結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是我們获得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根本經驗，体現在一切具体工作的政策里面。我們的工农联盟將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成为牢固不破的联盟，在共产党領导之下的人民民主統

一战綫將要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將要进一步改善，我們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团結將要更加巩固，我們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友誼將要發展。这一切就將使我們获得無穷無尽的力量和有利的条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設事業。

为了把各項工作做好，大会指示我們必須認眞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所进行的整風运动，对于提高党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对于推进党和非党的团結，起了偉大的作用，为中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極为重要的条件。通过这次大会，我們相信，在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上，我們將要取得新的胜利，使我們的各項工作做得更有成效。一九四二年中国共产党的整風运动也在党外的知識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帮助了知識分子認識和改正自己的缺点。我們相信一切要求进步的知識分子必然会从代表大会的这一精神中，汲取重要的教訓，进一步提高自己。

調动一切积極因素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是大会所極为注意的一个問題。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中，都从各方面討論到这个問題。为了这一目的，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权要作适当調整，近海地区工業的潜力要进一步發揮，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更要密切結合，重、輕工業及工業与农業的發展要更加密切配合，对于犯錯誤的同志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这一切英明正确的政策，会把潜藏在六亿人民中的一切积極因素，都發揚起来，在中央的統一領导下，为社会主义事業提供用之不竭的力量。

关于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規定了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基本任务和各項指标。我們的第二个五年計划是积極的，又是可靠的。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我們要繼續进行以重工業为中心的工業建設，推进国民經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化的巩固基础；繼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在發展基本建設和繼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發展工業、农業、手工業的生产，相应地發展运輸業和商業；努力培养建設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經济文化發展的需要；在工农業生产發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第二个五年計划是在第一个五年計划的成就和經驗的基础上制定的，因此它使各部門、各方面有了更好的配合。第二个五年計划是我們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又一个重大步驟，它的提出將大大地提高我国人民的劳动热情，为提早和超額完成第一个五年計划和迎接第二个五年計划而努力。

培养建設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是第二个五年計划向知識分子提出的光荣任务。科学文化工作的作用，在今后的建設工作中將日益显著。知識分子必須在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下，完成全国人民对我們的委托。

大会通过的新的党章將进一步提高党的質量，扩大党內民主，發揚党員的政治积極性，改善党的組織工作，加强党的团結統一和战斗力。中国共产党是領导我們国家的核心力量，党的进一步壮大就为我們国家的發展提供了进一步的保証。新的党章对党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知道不少进步的知識分子是以党員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对党員的新的要求对于他們也是一个鼓舞和督促。

关于矛盾的对抗性、非对抗性与飞躍形式

——兼論我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矛盾性質

黄 紹 进

1955年第一期的“哲学研究”，刊登了舒煒光同志所作“中国过渡时期的漸进性飞躍”一文。这篇文章对于我国过渡时期国内阶級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矛盾的性質、及矛盾斗爭的飞躍形式，作了分析。舒煒光同志認为：“我国过渡时期，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之間的矛盾乃是对抗性矛盾，这是毫無疑义的。”認为：“只要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之間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就是对抗性的。”而且“無論在任何的条件下，只要兩个对立的阶級同时在某一个社会里存在着，他們始終都是对抗性矛盾。这样的矛盾根本不可能轉化为非对抗性矛盾。”（以下所引舒文的着重点是笔者加的）对飞躍的形式，他認为：这种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經过漸进性飞躍的形式来解决。

在同一期的“哲学研究”中，还刊登了李达同志的“‘矛盾論解說’中一个重要的更正”。也認为舒煒光同志的意見是正确的，并在这篇重要更正的“附記”中写道：“为了說明对抗性矛盾或非对抗性矛盾的轉变，我举了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矛盾的例子，这完全是錯誤的。因为工人阶級和資产阶級的矛盾，从始到終是对抗性的矛盾，只有在消灭了資本主义的剝削制度时，这个对抗性的矛盾才能消灭。但是消灭資本主义的剝削制度，即消灭这个对抗性的矛盾的步驟和方法，則因各国政治經济的具体狀况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着重点是笔者加的）

下面，我想就三个主要的問題，發表一些不同的意見，提出来和大家商量。这三个問題是：一、究竟什么是矛盾的对抗性？它有什么特征？二、矛盾的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的相互轉化問題。三、矛盾性質与飞躍形式的关系。并从这三个方面，探討一下：我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矛盾，究竟是不是对抗性？能不能轉化？以及它与飞躍形式的关系。

一

在研究矛盾的性質的时候，特别是在研究矛盾的对抗性的时候，首先要把以下的几种情况，加以区别。

第一，必須把矛盾和对抗、矛盾的斗爭性和矛盾斗爭的对抗性区别开来。毛澤东同志說：“矛盾和斗爭是普遍的、絕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爭的形式，則因矛盾的性質不同而不相同”。“对抗只是矛盾斗爭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323—4頁）列宁說：“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由此可見，矛盾和对抗、矛盾的斗爭性和矛盾斗爭的对抗性，是不能混为一談的。在舒煒光同志的文章中，許多地方，是把这一点混淆了的。例如他說：“資产阶級如果不占有社会生产資料，不使用雇用劳动者，不再剝削工人，那么，它就不再是資产阶級了。这样一

来，在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矛盾当中，就失去矛盾双方面中的一方，資产阶級不存在了，因而無产阶級这一名称也就失去了意义。毛澤东同志指示說，沒有資产阶級，就沒有無产阶級；沒有無产阶級，也就沒有資产阶級；（按：毛澤东同志的这兩句話，是为了說明矛盾的同一性的，并沒有回答矛盾的性質問題——黃）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沒有和它作对的矛盾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他接着說："只要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之間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的性質就是对抗性的。"他这里的矛盾，就是对抗。下面，他又把阶級斗爭和矛盾对抗性混淆起来。他說："否認过渡时期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之間矛盾的对抗性，就必然要导向否認在这个过渡时期里存在着阶級斗爭。"他并引証了列宁和毛澤东的話，証明过渡时期阶級斗爭的存在，沒有中止，作为說明矛盾的对抗性的依据。像这样把矛盾、斗爭与对抗不加区别，是錯誤的，而且是有害的。在社会生活中，工农之間、城乡之間、党派之間、領导与被領导之間、中央与地方之間、批評与被批評之間……都是有矛盾，有斗爭，但矛盾的性質，斗爭的形式，則还要另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認之为对抗。

第二，应当把主要的矛盾和对抗性的矛盾区别开来。主要的矛盾，是說"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308頁）而对抗性的矛盾，則是表明矛盾的性質，表明矛盾着的兩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和狀态。有人援引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議中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尙存在着兩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由此而推論出：我国过渡时期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这就是把主要的矛盾和对抗性矛盾混淆了。本来，在社会生活中，主要的矛盾，往往就是最尖銳的、激化的、也即是对抗性的。但終究这还是兩件不同的事。我国过渡时期，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正因如此，才要通过阶級斗爭来解决这一矛盾。但不能把凡是主要的矛盾，都看成是对抗性的。例如在我們社会主义企業內，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如在中央和地方之間，集中和分散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但也不是对抗性的。

第三，应当把外部矛盾与对抗性矛盾区别开来。在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的著作中，說到矛盾的对抗时，往往使用了"外部对抗""外部冲突"等字眼，因此有人誤解为：外部的矛盾就是对抗性的矛盾，这是不对的。在亞力山大罗夫主編的"辯証唯物主义"一書的第六章第四、五节中，常常說到"社会主义自己內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劳动阶級內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工人和劳动农民的結合內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和在这个結合以外的对抗性矛盾"……。这些提法是含混不清的。首先，內部和外部，就不是一个絕对的东西。以整个世界来講，如果說地球是內部，則地球以外的天体就是外部；以地球上的国家来講，如果說社会主义陣营是內部，則資本主义陣营就是外部；再以社会主义陣营来講，如果說中国是內部，則其他国家就是外部……这都是相对的。至于矛盾的性質，完全不能由內部矛盾或外部矛盾来决定。內部矛盾中，也有对抗性的，如国家內部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外部矛盾中也有非对抗的，如社会主义国家与和平中立国家的矛盾。至于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矛盾既可以說是外部矛盾，又可以說是內部矛盾，从这里是不能說明矛盾的性質的。

究竟什么是矛盾的对抗性呢？它有些什

么样的特征呢？

在回答这个問題之前，还需要把对抗和对抗性之間的关系、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在矛盾中的地位，簡要地作一些說明。

对抗，是矛盾斗爭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行动。对抗性，則是表明矛盾的性質，表明矛盾具有發展为对抗的可能性，表明对抗之不可避免。如兩国宣战，处于敌对狀态，这是对抗性；战爭，才是对抗。这兩者不是完全等同的。但是，它們却具有必然的規律性联系。对抗性，它使矛盾的运动必然（合乎規律地）走向对抗；对抗，則是对抗性矛盾运动的必然結局。馬克思在闡明剝削制度的社会对抗性时写道："一个在阶級对立上建筑起来的社会要走到殘暴的矛盾上去，走到物体和物体底冲突上去，作为最后的解决……"（馬克思："哲学的貧困"，解放社版，第251—2頁，着重点是我加的——黃）这段話正說明了这种的規律性。

矛盾之所以具有对抗性或非对抗性，又是怎样来确定的呢？

这是由于对抗性或非对抗性在矛盾中的地位所确定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在矛盾中并不是絕对地互相排斥的。我們說到对抗性矛盾时，并不排除矛盾中尙包含着非对抗性的成分或因素；我們說到非对抗性矛盾时，也不排除矛盾中尙包含着对抗性的成分或因素。对抗性与非对抗性，同样也是矛盾性質中所存在的矛盾着的兩个方面。問題是在于："矛盾着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310頁）我們說对抗性矛盾的时候，只是說矛盾中对抗性因素，居于主导的方面；我們說到非对抗性矛盾的时候，只是說矛盾中的非对抗性因素，居于主导的方面。在苏联，曾有人認为：在那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全沒有对抗性的矛盾。这是不符事实的。实际上，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与叛国分子、盜窃公共財产分子、及其他破坏苏維埃法治的犯罪分子之間，矛盾仍是对抗性的。只是在苏联，这种对抗性的因素，仅是次要的，非主导的方面。

現在，我們可以把矛盾对抗性的特征，归結为如下几点：

1、在矛盾中，矛盾着的双方，矛盾的各个方面，对抗性的因素居于主导的方面；

2、在矛盾的运动中，由于对抗性因素的不断增長，矛盾趋向激化，对抗將成为不可避免；

3、解决这种矛盾的飞躍形式是"爆發"。

非对抗性矛盾的特征，則有与以上三点正好相反的特征。

根据以上的論点，我們来研究研究我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之間的矛盾性質。

我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之間的矛盾，即兩个阶級之間的关系，正如同过渡时期中其他的許多矛盾或关系一样，有着極其复杂的和过渡的特点。从矛盾的各方面各部分来看，从矛盾运动的各阶段来看，都不是同一的、不变的。在整个过渡时期，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之間的矛盾，旣有对抗的一面，也有非对抗的一面。概略地講来，在解放以后，由于兩种經济体系的同时并存，而且存在着"誰战胜誰"的矛盾，这种矛盾，基本是对抗性的。但这种对抗性已經和解放前的对抗性有程度上的差别。这种对抗性，在經济恢复时期，随着經济的發展，也在逐步發展，到1952年"三反""五反"之前，这种对抗性發展到了最高峰，資产阶級向無产阶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迫使無产阶級不得不进行有力的反击。"三反""五反"就是这种对抗性發展的必然結果，"三反""五反"

已經使矛盾的斗爭成为对抗。

即使这样，也不是說在这个阶級斗爭中，矛盾的一切方面都是对抗性的。事实上，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守法資本家，对無产阶級仍采取合作的态度，而且也有为数不多的資本家，接受了国家的和平改造的政策，初步地走上国家資本主义的道路。根据統計：在全国工業总产值中，公私合营的比重，在1949年是1.6%，到1952年則增長为4%。

經过了"三反""五反"的严重斗爭之后，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矛盾的对抗性，仍然存在，不过已开始向消灭的方向轉化。在这之后，党和国家从各个方面加强工作，积極进行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利用、限制、改造。这些工作的結果，非对抗性的因素，在逐步积累和增長，对抗的方面和非对抗的方面，在逐步地轉換着位置。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初，由于农業合作化高潮而引起的全国范圍的資本主义工商業的全行業公私合营，标志着这种矛盾性質的大轉变。这就是說：非对抗性已經成为矛盾性質的主要的方面了。

在全行業公私合营以后，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矛盾，具有以下的几点特征：第一，資本家已經由"私家人"开始成为"半公家人"或"公家人"，由剝削者开始轉变成为劳动者，資产阶級願意、并已經接受了工人阶級的教育改造，願意并已經在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說，非对抗性的因素，已成为主要的方面了。当然，在利潤分配上，思想意識上，还是有某些对抗的因素存在着，但这已不是主要的了。第二，公私合营以后，阶級斗爭的形式，主要將是随着企業改造的进程，長期地耐心地对資产阶級分子进行說服和批評教育，树立他們的社会主义思想，把他們逐步地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这就是說，矛盾斗爭的發展趋势，將不是对抗的不可避免，而是可以避免对抗。第三，显然，这种矛盾的斗爭形式，不会是"爆發"式的，而是"質的逐步过渡"。从以上的特征来看，我們可以說，在全行業公私合营以后，我国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之間的矛盾，基本上已是非对抗性的了。

二

在研究矛盾的性質的轉化的时候，我們是把矛盾看作是运动着的，是运动中的矛盾。矛盾的性質，当然也要从矛盾的运动中，作具体的分析。毛澤东同志說："必須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現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307頁）

从这一点出發，我們認为：一切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能由对抗性轉化为非对抗性，或是由非对抗性轉化为对抗性。这在舒煒光同志的文章中，一般地是肯定的。

但是他不承認一切的矛盾都具有这种相互轉化的可能性。在他看来，某一些矛盾，天生就是只有对抗性，根本不可能轉化的。例如他說："作为剝削阶級与被剝削阶級之間的矛盾，無論是奴隶与奴隶主，农奴与封建地主，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之間的矛盾，也無論在任何条件下，只要两个对立的阶級同时在某一个社会里存在着，他們始終都是对抗性矛盾。这样的矛盾根本不可能轉化为非对抗性矛盾"。这正是离开了矛盾的运动来观察矛盾性質的結果。这里順便指出，舒煒光同志在这里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話："自由民与奴隶，貴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行东与帮工，簡言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始終是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作为他上述观点的論据，这是离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的。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一段話，原意只是为了說明它前面的一句，即："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級斗爭的历史。"（着重点是我加的）在这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武断地說到一百年后的历史的具体进程是怎样的。

也有一些人，把某一些矛盾，看成是天生就只有非对抗性，根本不可能轉化为对抗性。例如在亞力山大罗夫主編的"辯証唯物主义"第六章第四节中，說到社会主义制度下非对抗性矛盾的特征时，說："由于沒有敌对的阶級，由于整个社会利益的一致，非对抗性能够及时得到克服，而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这句話，如果只是这种非对抗性矛盾，能够及时得到克服，那是对的；如果是指这种非对抗性完全沒有轉化为对抗性的可能，那就不对了。例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能够"及时得到克服"的。但却不是完全沒有發展为对抗的可能性，如果我們工作上存在着缺点，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沒有"及时克服"这种矛盾，它就有可能發展成为对抗。毛澤东同志列举的党內思想斗爭的例子，"高、饒反党联盟"事件的例子，都說明非对抗性向对抗性的轉化。只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对抗性矛盾，是暫短的、局部的、非主要的。

我們不仅要从矛盾的运动中，考察矛盾性質的轉化，而且要从对抗性与非对抗性在矛盾中的地位，来了解矛盾性質的形成、轉化过程。

对抗性与非对抗性在矛盾中的地位，不是絕对的，也不是均衡的。它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它的变化和發展，是按照"由量变到質变"的規律进行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着，事物的性質也就随着起变化"（"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310頁）。但是，在舒煒光同志看来，对抗性与非对抗性在矛盾中的地位，是絕对地排斥的，也不是"由量变到質变"地轉化着的。他說："对抗性矛盾是由于矛盾双方在利益上产生对立而产生的，它將随着相互利益上敌对关系的根本改变而發生根本变化"。

对于我国过渡时期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矛盾性質的轉化，舒煒光同志說："对抗性矛盾向非对抗性轉化，并不是無条件的，其条件就是該对抗性所由产生的經济基础的变化。"又說："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之間矛盾的对抗性，是由他們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对立地位，以后由此而引起的阶級利益上的对抗性所决定。"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他接着說："这种基础，（指經济基础——黃）工人与資本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对立地位，在我国过渡时期的条件下，并沒有根本改变。資本家受国家法律的保护还可以取得一定合法的利潤。虽然利潤是被限制了的，但或多或少仅是数量上的差别，而沒有改变其相互关系的本質。"在这里，他把我国过渡时期的經济基础、或生产关系，看作是沒有变化的，或者看作是仅有数量的差别，而沒有質的变化，这是大錯而特錯的。

大家知道，我国过渡时期的經济基础、或生产关系，它的最大的特色乃是过渡性的，而不是什么"沒有变化"的。我国宪法第十条中写道："鼓励和指导它們（指資本主义工商業——黃）轉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資本主义經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这就充分說明了我国过渡时期的經济基础、或生产关系，是变化着的，而且有質的轉化。那末，由經济基础所决定的阶級关系、即阶級矛盾，当然也是会随之而起变化的。

在公私合营的企業中，企業生产关系上，很明显地有以下的几个变化：一，企業由資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而且社会主义成分是領导的地位，資本家对企業不能再任意支配了。二，职工在企業中的地位，也起了根本变化，成为企業的主人翁，而不再是为資本家作牛馬了。三，企業的生产，是按照国家計划，并按照社会主义經营管理的原則来进行的。四，企業的利潤，除了一小

部分作为对資本家的贖买費用之外，大部分是用于企業發展，职工福利，和国家資金积累上。五，資产阶級在国家和工人阶級的領导、监督、教育之下，逐步地进行着自己的改造，由剝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在这种国家資本主义的經济关系中，工人阶級和資产阶級的矛盾，無疑地，非对抗性是主要的方面。因为資产阶級除了能得到国家法定的一定利息之外，再也沒有能与無产阶級相对抗、进行剝削和压迫的物質基础了。

当然对抗性还是有，但这不是主要的方面。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們的結論是：在我国过渡时期的条件下，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矛盾，是可以由对抗性轉化为非对抗性，而且是已經轉化了。这种轉化的主要条件，是在于生产关系，即經济基础，所有制的改变而产生的。至于促使这种轉化的外部条件，如国际国內形势，及其他等条件，也是很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在舒煒光同志的文章中說得很詳細，这里不重复了。

三

关于矛盾性質与飞躍形式之間的关系，前面我們談到矛盾对抗性的特征时，已經作了一般的說明。我們認为：矛盾性質与飞躍形式之間，是有其內在的必然的規律联系的：对抗性矛盾，它的飞躍形式就会是“爆發”、“暴力”、“冲突”；非对抗性矛盾，它的飞躍形式就是“質的逐步过渡”。这是必然的規律。其所以会是这样，乃是由于矛盾性質的本身所决定了的。所謂对抗性，就是矛盾的兩方面，是敌对的、不可調和的，这就必然会發展为对抗；所謂非对抗性，就是矛盾的兩方面，虽然彼此对立着、斗爭着，但不是敌对性的，它的飞躍，可以通过对立面的一方向他方逐步轉換，即“質的逐步过渡”而实現。毛澤东同志說：“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决。”（“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299頁）就是表明矛盾性質与飞躍形式之間的規律联系。

舒煒光同志的文章中說：“我們可以說，矛盾的性質决定解决矛盾的方法，决定飞躍的形式，……但不能反过来抽象地說，解决矛盾的方法，飞躍的形式决定矛盾的性質。”这是对的，飞躍形式是不能决定矛盾的性質的。但是飞躍形式却反映了矛盾的性質。不能說，飞躍的形式，能与矛盾性質無关，而可以由人們的主观意志来决定。

在同一个地方，舒煒光同志說：“对于分裂为敌对阶級的社会，那里反动的社会阶級占着統治地位，爆發是必需的；但是，对于革命的無产阶級占据了統治地位，又还沒有最終消灭剝削阶級的社会，爆發就不是一定必要的。”这里，他只考虑了必需和必要，即人們主观的願望，而沒有考虑客观規律的必然。

我們承認，在利用社会規律中，人們的主观能动作用，（即必需和必要）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但是不能把这种主观的要求和客观事物的規律性混为一談。

在客观上，对抗性是与爆發相联系的，而非对抗性是与“質的逐漸过渡”相联系的。

也許有人要問：“根据你的論点，我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矛盾，只是在‘三反’‘五反’之后，主要是在全行業公私合营之后，才能化为非对抗性的，而在这之前，仍是对抗性的。那末，为什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竟就确定了对資产阶級的利用、限制、改造，即和平过渡的政策呢？”

这是另外一个問題了。这是关于利用矛盾性質轉化的可能性的問題。

現在，我們仅就矛盾性質这个問題来談。

在我們的历史条件下，無产阶級与資产

阶級之間的矛盾，既有对抗性因素，也有非对抗性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矛盾会是对抗性的，而在另一种条件下，矛盾也会轉化为非对抗性的。

即使是对抗性矛盾，矛盾的双方，仍可以是“同时共存”着，甚至还可以在某种限度內“和平共存”着。（如同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这兩个对抗性的制度体系的和平共存）但这种共存不能被認为是“漸进性飞躍”，更不能因此而認为对抗性矛盾可以实現“漸进性飞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并沒有任何質的改变。

但矛盾既然包含有兩个方面的因素，事物的發展，也就包含有兩个方面的可能性：可能發展为对抗性，也可能發展为非对抗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領导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級，預見到这种可能性，同时也有利用这个可能性的“必需”和“必要”，通过自己的政策，創造必要的条件，使矛盾由对抗性轉为非对抗性，从而用和平的方法，即“漸进性飞躍”的形式，消灭資产阶級，使它“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轉化”（“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316頁）毛澤东同志在“論持久战”中指示說：“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現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針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这里，还要批判一种錯誤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把飞躍的形式，看作仅仅是、或主要是由事物的外部条件决定的。如：亞力山大罗夫主編的“辯証唯物主义”第六章第四节中，說道：“对抗性矛盾的解决形式会随着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在舒煒光同志的文章中，也說：“对抗性矛盾随着条件不同，可能經过不同的飞躍形式，以达到解决矛盾。”他并引用了毛澤东同志的話：“依事物本身的性質和条件（着重点是舒同志加的）經过不同的飞躍形式，一事物轉化为他事物。”但是，他在这里却把毛澤东同志的話片面地割裂了。毛澤东同志說的是“性質和条件”，这里性質和条件是有机地联在一起的，而且性質是放在第一位的。对于事物本身的性質和影响它的外部条件的关系，毛澤东同志还說过：“事物內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內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內因而起作用。”（“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290頁）

举几个例子：

在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以后，無产阶級成为国家的統治阶級，与劳动农民結成了巩固的联盟，而資产阶級在政治上已失去了統治的地位。当时从国內的条件来說，对無产阶級是有利的。在新經济政策时期，列宁已預見到与資产阶級“謀妥协”的可能性，提出了向資产阶級“贖买”的国家資本主义的政策。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干涉而引起阶級矛盾的激化，以致無产阶級不得不对資产阶級实行暴力的剝夺。

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在反法西斯大战胜利以后，在国內無产阶級取得政权后，整个形势对無产阶級是有利的。但主要因为資产阶級陰謀組織反革命复辟，阶級矛盾激化了，因而飞躍形式就不是“和平过渡”而是“暴力”的。

在中国，外部条件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是相似的。却發展为另一种的飞躍形式，这是因为“經过‘三反’‘五反’的严重斗爭，許多資本家提高了覚悟，他們表示願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样，我們的国家对資本主义工商業就有可能采取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这些例子，正如赫魯曉夫同志在向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說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斗爭激烈的程度，使用

或不使用暴力，这与其說是取决于無产阶級，不如說是取决于剝削者抵抗的程度，取决于剝削阶級自己是否使用暴力。"

这样的例子还有：

例如：解放台灣的問題。周恩来总理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种可能的方式，即战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条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这种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除了国际国内形势等外部条件之外，主要还在："自从我們發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号召以后，在台灣和海外的国民党軍政人員中，已經有不少人表示了他們的爱国願望。我們相信，願意促成台灣和平解放和祖国完全統一的人，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增加，这將是不可抗拒的趋势。""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們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結起来。"（1956年6月28日在第一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議上的發言）

再如，在我国人民民主專政的条件下，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但在对待具体的反革命分子来說，也給他有兩条道路：抗拒严受鎮压，坦白寬大处理。

我們对于战爭中的敌人，从来是"放下武器，交槍不杀"。

这都說明了矛盾性質，外部条件和飞躍形式的关系。

*　　*　　*

研究以上这些問題，在实踐上和理論上，都是有着巨大的意义的。

如果否認了在过渡时期中，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存在着矛盾，那就会犯右傾的錯誤。但是如果否認这种矛盾可由对抗性轉化为非对抗性的可能，那末，就会犯"左"傾的錯誤，那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阶級斗爭日益尖銳"的結論。如像亞力山大罗夫主編的"辯証唯物主义"第六章第四节中，說："在無产阶級專政确立之后，阶級斗爭不是熄灭，而是更加尖銳化。"在舒煒光同志的文章中也說到："否認过渡时期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之間矛盾的对抗性……至少是否認存在着極其尖銳的阶級斗爭，否認过渡时期是一个極其复杂、特别尖銳的阶級斗爭时期。"

同样地，否認了这种矛盾性質轉化的可能性，必然又会得出"無产阶級專政与內战不可分离"的結論。显然，这也是与事实不符的。

如果認为公私合营以后的矛盾，仍旧是对抗性的，那末，必然会在实际工作中产生"左"傾情緒，不能很好地与資本家同居共事，如像有些公私合营企業的公方干部，不敢与資方同坐一間办公室，有关生产的文件、計划，不敢給資方人員看，这样就放弃了接近对方、了解对方、改造对方的責任。

如果把矛盾、斗爭、与对抗混为一談，則將会产生極其严重的后果。如把不同意見的爭論，学术上的"百家爭鳴"，一概認为是对抗，而采取强迫命令的手段，用斗爭会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就会犯大錯誤。

这些問題，是在我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經驗之上，提出来的新問題。这些問題在理論上的解决，無疑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而要解决得好，就需要把各种不同的意見摆出来，互相批評、糾正。从这一角度出發，我大胆地提出如上的粗淺見解，請同志們指正。

国家資本主义的形式及其变化

管大同

一

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目前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再經过几年的工作，就可以胜利地完成这一偉大的历史任务，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国七年来，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經过了曲折复杂的斗爭过程，是通过国家自上而下的領导和資本主义企業中工人群众以及广大的社会力量自下而上的支持来进行的。不能設想，把資本家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一件簡單而輕易的事情。和平改造是在我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阶級斗爭。

我国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資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主要是公私合营的形式来逐步进行的。也就是通过国家資本主义的道路来把資本主义企業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業，同时，并把資产阶級分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国家資本主义經济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这是我国国家資本主义的特点之一。国家資本主义形式的多样性，是同我国資本主义工商業的具体情况以及国家对資本主义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分不开的。我国資本主义工商業分散落后，情况复杂，各行業、各企業的具体条件各不相同。因此，就需要根据国家的要求和企業的具体条件，采取不同的国家資本主义形式来对它們进行改造。国家資本主义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它們的基本特点是相同的。它們是在社会主义經济領导下的、社会主义經济成分同資本主义經济成分在不同程度上的和不同方式的联系与合作，它們是在国家管理和工人群众监督之下的、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經济形式。

根据社会主义經济成分同資本主义經济成分联系和合作的程度的不同，各种国家資本主义形式区分为初級形式和高級形式。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政策，是引导和推动資本主义經济走上国家資本主义的道路，由国家資本主义的初級形式向高級形式發展，最后由国家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以达到消灭資本主义和消灭資产阶級的目的。

二

在这里，对我国国家資本主义的几种主要形式和它們的变化加以概略的說明。

（一）国家資本主义工業的初級形式

工業中的国家資本主义初級形式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加工：这是由国营企業（或合作社）供給全部或者一部分原料（或半成品、零件），确定原料和成品的交换比率，委托私营工厂在一定时期內，按照国家所規定的規格、質量、数量进行生产。加工的全部成品均由国家收回，国家則按照規定付給私营工厂以合理的工繳（或称加工費）。工繳一般包括工資及其他合理費用、加工产品应繳納的国税和企業的合理利潤。

（2）訂貨：这是国营企業（或合作社）以合理的貨价向私营工厂預先訂購一定数量

的产品，私营工厂即依照国家规定的規格、質量标准进行生产，并按規定的时期交貨。訂貨貨价包括該項产品的合理成本、产品应繳納的国稅和企業的合理利潤。必要时，国营單位并可預付給私营工厂一部分貨价作为定金，或以配售方式供应一部分原料，或以折价方式供应一部分生产資料。

（3）統購：这是国家根据社会經济的需要，对某些与国計民生关系重大的产品，指定国营商業按适当的价格，長期性的統一收購，并統一銷售（如棉紗）。与統購性質相近的还有專卖，私营工厂生产的專卖物品也是由国家統購的（如酒类）。对私营工厂来說，統購的产品常常是采取加工的方式，但不同于加工的是，凡統購或專卖的产品，私营工厂都不能再自行在市場上銷售。

（4）包銷：这是由国家商業單位規定私营工厂的产品标准（規格、質量等），或者在这些产品保持一定的标准的条件下，协議确定价格，在相当时期内，以一个行業、一个企業或一种产品为对象，由国家包下其所生产的产品的一部或全部。这样包下来的产品，必須全部卖給国家。在具体执行时，也常常采取加工、訂貨或者近似于加工、訂貨的方式。它同加工、訂貨不同的是，包銷部分因生产改进而增加或超額生产的产品，原則上也应当卖給国家。

由于統購和包銷时常是采取加工、訂貨的方式或者近似于加工、訂貨的方式，通常我們說到加工訂貨时，也时常將这兩种形式都包括在内。除以上几种形式外，工業中国家資本主义的形式还有收購。这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如产品規格、質量等），国营商業單位以合理的价格，临时性的或定期的收买私营工厂一定数量的产品。

加工訂貨是社会主义經济和資本主义經济在企業外部的合作。这种合作，一般是表現为各种公私之間的合同形式——加工合同、訂貨合同、包銷合同。統購的产品虽然由国家法令規定，但具体执行时，也表現为公私之間的加工合同。在公私合同中，具体地規定了加工訂貨的条件和公私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如加工訂貨产品的規格質量、产品的数量、交貨的时間及合理的工繳或貨价，都必須明确地規定，并可以規定生产监督、財务监督的具体办法。合同一經签訂，公私双方都必須貫徹执行。因此，公私合同不是普通的买卖合同，而是体現公私关系、体現社会主义經济同資本主义經济之間的領导和被領导关系的具体形式。国家根据合同指导私营工業的生产，工人根据合同监督資本家的經营。国家机关在企業外部的管理和工人在企業内部的监督的密切結合，是貫徹执行加工訂貨合同，限制資本主义消極作用的重要环节。

加工訂貨的国家資本主义形式的主要作用如下：

第一、通过公私合同，社会主义經济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私营工業的生产和銷售，使私营工業的生产間接地受国家計划的支配。由于它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受国家計划的支配，这就削弱了資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由于控制了这些商品的分配，从而限制了資本主义的投机性。由于国营經济控制了原料和产品，就逐步切断資本主义工業和資本主义商業的联系，割裂了資本主义經济体系，使他們不能不依賴社会主义經济。

第二、通过工繳、貨价的核定和对企業成本、利潤的掌握，限制了資本家的剝削，并將私营工厂利潤的一部分以商業利潤形式轉移到社会主义商業中去，从而使产品分配的形式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增加了国家資金的积累。

第三、在加工訂貨等国家資本主义形式中，工人的地位和劳动的性質也起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工人在企業中的监督已經同国营經济的領导和国家机关的管理結合起来。由于企業生产已間接受国家計划支配，由于資

本家的剝削已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这里，工人已經主要是为国家的需要而生产，只有較小部分是为資本家的利潤而生产。这就有利于發揮工人劳动的积極性，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四、通过公私合同来督促私营工業按質、按量、按期完成国家生产任务，并根据中等标准、合理利潤的原則核定工繳、貨价，發揮奬励先进、帶动落后和淘汰有害的作用，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私营工業改进生产和經营，更好地利用私营工業的生产力，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服务。

因此，国家通过加工訂貨形式来改造資本主义工業，是一个極为必要的步驟。通过这些形式，不仅可以把資本主义工業吸引到国家資本主义軌道上来，利用它們的积極作用和限制它們的消極作用，并为进一步改造它們創造必要的条件；同时，加工訂貨是一般資本主义工業比較容易接受的国家資本主义形式，并可推行于規模較小的企業，适合于我国資本主义工業分散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着發展生产、繁荣經济的目的，国家即开始采取收購、加工、訂貨等形式来扶持私营工業的生产，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經济和資本主义工業的联系。在国家的扶持下，私营工業生产有了迅速的發展。私营工業的产值，1952年比1949年增長了54.2%。但这种增長不是單純的資本主义的發展，到1952年，加工訂貨产值已占私营工業产值的56%。1952年"五反"运动以后，国内政治、經济狀况發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1953年国家有計划經济建設开始，資本主义無政府狀态同社会主义有計划發展的矛盾尖銳地暴露出来。因此，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資本主义經济的改造，加工訂貨形式有了迅速的扩大和發展。加工訂貨的产值如以1949年为100，則1952年为727，1953年为999，1954年为1,011，1955年为731，加工訂貨占私营工業产值的比重，也由1952年的56%增長为1953年的61.8%，1954年为78.5%，1955年更达81.7%。在这一时期，加工訂貨已經成为私营工業生产的主要方式。

但是，加工訂貨形式对資本主义工業的改造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我們知道，資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矛盾有兩个，一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發展的矛盾，一是資本主义生产盲目性和国家有計划建設的矛盾。在加工訂貨形式下，基本上限制了資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但由于企業仍为資本家所有，企業基本上还是按資本主义方式来管理，社会主义經济和資本主义經济的联系还只是在企業外部，資本家采取唯利是圖的态度，不按質、按量、按时完成国家生产任务的情况还是普遍和严重的，这不能不影响到国家的計划。同时，由于生产关系还沒有改变，仍然束縛着生产力的發展。公私矛盾、劳資矛盾和其他許多矛盾还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理，成为提高企業劳动生产率和發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也影响到对資产阶級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因此，随着国民經济計划的加强，随着社会主义工業化和农業合作化的發展，就要求將国家資本主义加工訂貨的初級形式引导向高級形式的公私合营發展。

（二）国家資本主义商業的初級形式

我国資本主义商業分为批發商和零售商兩大类型。对批發商業国家是采取由国营商業逐步代替的政策，逐步吸收其从業人員，利用其貿易关系和貿易網。但对一部分国营商業还不需要代替的批發商業仍然采取国家資本主义的形式来进行改造。对零售商則是利用它們的商業網、从業人員和資金，在国营商業領导下，为城乡交流和供应人民需要服务，并且在这一时期主要是通过經銷、代銷的国家資本主义形式对它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經銷：这是国营商業（或合作社商業）以全部或大部掌握的商品，委托私营

零售商店經銷。經銷店以現款按批發价格向国营商業(或合作社商業)进貨，并按国家的銷售計划、国营商業的零售牌价和其他規定条件出售經銷商品，获得批零差价的收入。經銷店对經銷的品种，不再向自由市場进貨。

与經銷屬于同一类型的还有批購零銷，簡称批銷。它和經銷不同的是：批銷的商品通常是一些比較次要的商品，因此在价格上除有的是按照国营商業的牌价出售外，有的也可以按照核定价格出售；批銷店对批銷商品，如果經过国营商業或合作社商業允許，也可以向自由市場进一部分貨的。

与經銷相同的还有对資本主义批發商的經批。經批是国营商業以全部或大部掌握的商品，委托私营批發商对私营零售商經批。經批店以現款向国营商業进貨，按照国家計划和其他規定条件批售經批商品，并获得差价收入。

（2）代銷：这是国营商業（或合作社商業）以国家（或合作社）的商品委托私营零售商店代銷。代銷店必須繳存一定数額的保証金，并按照国家的銷售計划、国营商業的零售牌价和其他規定条件出售代銷商品，获得規定的手續費。代銷店必須將代銷款按規定繳入国营商業(或合作社)指定的机構。代銷的品种代銷店不再向自由市場进貨。由于代銷通常是国家全部掌握貨源的商品，因而專营这些商品的私营商店就成为專業代銷的商店，兼营这些商品的私营商店則是这部分商品的代銷店。

与代銷相同或相近的还有代批、代購、代进和代出。

代批：这是国营商業（或合作社商業）以国家的商品委托私营批發商向私营零售商代为批售。代批店必須繳存一定的保証金，并按照国家計划和其他規定条件代批商品，获得規定的手續費。对营業較大的代批店，国营商業可以派干部領导和监督。

代購：就是国营商業(或合作社商業)委托私营商業按規定的品种、規格、数量和价格，代購土特产品，給以規定的手續費。

代进：就是国营商業指定品种、規格、数量和訂購或收購限价，委托私营进口商在国外資本主义市場代为購进商品，并給以規定的手續費。

代出：就是国营商業以国家的商品委托私营出口商按照規定限价向国外資本主义市場代为銷售，給以規定的手續費。

（3）公私联購：这是国营商業或合作社商業組織一部分私商，規定公私比例、收購計划和收購地区，联合到产地收購土特产，收購的商品按照国营商業的牌价或核定价格实行联銷或分銷。

同公私联購相近的还有公私联营。就是国营商業組織一部分私营进出口商，对某一宗或若干宗进出口業务实行公私联合經营。

商業方面的国家資本主义一般也是通过公私合同或协議的形式而实現的，这种公私合同或协議，是体現公私关系、体現社会主义經济和資本主义經济之間的領导与被領导关系的具体形式。

国家資本主义商業的各种形式，一般具有下列的特点：

第一、国营商業基本上控制了私营商業的貨源，逐步地將私营商業的銷售納入国家商品的流轉計划，限制了資本主义經营的盲目性。但由于在各种形式中，私营商業同社会主义經济联系和合作还有內外和程度的不同，因此，这种計划性的程度也就有所不同。例如，公私联購和公私联营一般是行之于某批收購任务，这种形式是不固定的，因之其計划性也是不經常的。在經銷和批銷形式下，社会主义成分和資本主义成分是在企業外部联系和合作，但批銷店一般是由私商向国营公司要貨，国营公司审核其計划，而不是国营公司規定其品种和数量，同时，批

銷店仍可以从自由市場进貨，其計划性就不如經銷。經銷店的經銷商品是国家控制的，其銷售是按照国家計划进行的，經銷店对經銷商品不再向自由市場进貨，这样，其經营業务就已經直接或間接地納入了国家的計划。在代銷形式下，社会主义經济同資本主义經济的联系和合作已經进入到企業內部，代銷商品是屬于国家所有，資本家的資金大部分已繳存国家为保証金，代銷店特别是專業代銷店的經营業务已經成为国营商業或合作社商業銷售計划的一个組成部分，这就基本上克服了資本主义盲目性同国家計划的矛盾。

第二、国营商業控制了私营商業的出售价格，稳定了市場，并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資本主义商業的剝削和投机違法活动。在經銷和批銷的形式下，私商获取批零差价的利潤，批零差价是由国营商業核定的，虽然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市場因素的影响，但資本家的利潤已經受到限制，他們也不能任意抬价杀价。代銷的手續費則是更接近于商品流轉費用的核算标准，是根据国家商品供应計划和对私营商業統一安排的計划确定的，資本家的利潤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这里，社会主义商品流通过程已經代替了私人商業資本的运动过程，私人資金已經作为保証金繳存国家，只是間接地起着某些資本剝削的作用，資本家已經不能再把它当作資本来自由运用了。

第三、由于国家資本主义商業的銷售已在不同程度上納入了国家計划，由于資本家的剝削已經受到限制，店員在企業中的地位和劳动的性質也起了变化，他們主要地已是为完成国家的銷售計划、为消費者的需要而劳动。因此，店員的劳动态度也就有了改变，店員的监督作用也加强了，許多国家資本主义商業中，店員参加了經营管理。

第四、通过各种国家資本主义形式，利用了私营商業的資金、人員和銷售網，扩大了商品流轉。資本主义商業和資本主义工業之間，資本主义商業和农民、手工業者之間的联系被割断了，使資本主义經济日益依賴于社会主义經济，扩大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商業的陣地和領导地位。同时，也維持了私营商業的經营，便于对它們进一步地进行改造。

商業中的国家資本主义形式發展的时間比較工業为晚。在1952年，国家資本主义商業还只占純商業机構批發总額的0.5%和零售总額的0.2%。在这个时期，国家主要是發展社会主义商業以树立和巩固在市場上的領导地位。到1954年，国家已經通过加工訂貨控制了主要工業产品，对粮食、食油、棉花、棉布先后实行了統購統銷，国营商業并逐步代替了私营批發商的業务，这时，国家資本主义商業才有了迅速的發展。国家資本主义商業的零售額，如以1952年为100，則1953年为210，1954年迅速增为4，700，1955年达到13，100。同时，在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統購統銷时，即有計划地將私营粮食商納入了代銷。在1954年实行棉布統購統銷时，又將私营棉布商納入了經銷和代銷。这就开始了全行業性的改造。在1954年，上海已經有19个私营零售行業18，660戶、北京有8个行業10，300戶实行了全行業的改造。这样，就为进一步地發展到全行業公私合营創造了条件。

（三）国家資本主义的高級形式——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是改造資本主义工商業的主要形式。

公私合营企業一般是由国家或者公私合营企業投資，并由国家派干部、同資本家实行合营的企業。私营企業实行公私合营，須經人民政府的核准。

公私合营企業是国家資本主义的高級形式。是在社会主义經济直接領导下，社会主义成分在企業內部同資本主义成分合作的企業。这种合作不同于一般私人資本主义性質

的合股公司，社会主义成分在企業中居于領导地位，而資本主义成分則居于被領导的地位。社会主义成分在企業中的領导地位，并不是取决于公股在企業中所占比重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工人阶級在国家政权中的領导地位，取决于社会主义經济在国民經济中的領导地位，取决于公股代表与工人群众的結合及对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的教育和改造。因此，公私合营企業的經营管理，必須在公方領导之下，由公方代表和私方代表負責。公方和私方的关系，具体地体現着領导与被領导的关系。公私合营企業的生产和銷售是按照国家的計划来进行。企業的生产、財务、劳动、基本建設、安全衛生等制度，也必須遵照国家的規定办理。

在公私合营企業中，私方的合法权益是受到保护的。私营企業实行公私合营时，要对企業的实有財产按公平合理的原則进行清点估价，并对企業的債权債务加以清理，以确定公私双方的股份。对企業原有的私方实职人員，是按照量才使用的原則并参酌他們原来的情况，在公私合营企業中安排他們的职务，許多私方代表并担任了企業行政上或生产上的主要职务。不但安排了他們职务，而且要尊重他們的职权，这样，他們就可以充分貢献其經营管理或技术的才能和經驗，并在生产实踐中受到教育。同时，私方还可以按照国家的規定，分得合理的利潤。

公私合营企業內部既有社会主义成分，又有資本主义成分，因此，公私矛盾是公私合营企業中的主要矛盾。公私合营企業中有关公私关系的問題，由公私双方代表协商处理。协商不能一致时，报請国家主管机关解决。較大的公私合营企業一般还設有董事会，作为公私双方协商議事的机構。

公私合营企業中，工人的地位有了重大的变化，他們和公方代表結合在一起成为企業的領导力量。工人代表并参加了企業的管理。工人同企業行政的关系已不是單純的劳資关系，在这里，由于資本家还剝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劳資关系仍然部分地存在，但工人同公方代表的立場是一致的，因此劳資关系主要地是通过公私关系来表現，有关劳資关系的一些問題，可以通过公私协商来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沒收了官僚資本，由于官僚資本在某些民族資本主义工商業中有投資，因此，就出現了一批公私合营企業。以后，陆續有一些較大的資本主义企業經过資本家的申請，实行了公私合营。到1954年，国家开始了有計划地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公私合营企業开始有了較迅速的增加。这个时期，在扩展公私合营的方式上是对規模較大的資本主义企業（主要是資本主义工業）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工業的产值如果以1949年为100，則1950年为188.7，1951年为367.2，1952年为622.5，1953年为916.9，1954年为2,316.9。到1954年底，資本主义工業中已有30%左右的資本，25%左右的职工，33%左右的产值，轉变为公私合营。此外，交通运輸業中，有136家私营輪船公司和1,700余輛私营汽車实行了公私合营。私营金融業除少数华侨銀行外已全部公私合营。商業中也有少数加工性、技术性的大商店和飲食店实行了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企業比資本主义企業以及其他国家資本主义企業具有显著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和作用主要表現在：

第一、企業由私有变为公私共有，資本家丧失了对生产資料的支配地位，而社会主义成分确立了在企業內部的領导地位。这就使公私合营企業的經营管理不再采取資本主义方式，不再以追逐利潤为目的，而是逐步向国营企業看齐，完全以發展生产、保証需要和国家計划的要求为指导方針。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和国民經济有計划發展的規律，在公私合营企業中起直接的作用。

第二、在产品的分配、价值的分配上基本上脫离了資本主义的形式。企業的利潤是采取“四馬分肥”的办法来分配的，即是按照国家所得稅、企業公积金、职工福利奬金和股东股息紅利四个方面来分配。其中股东股息紅利約可占全部盈余的四分之一左右，資本家按私股比重分得利潤。这样，資本家的剝削受到进一步的限制，企業利潤大部分已成为国家資金的积累。

第三、企業內部的阶級关系和工人劳动的性質發生了重要的变化。工人群众同公方代表結合在一起，成为公私合营企業的領导力量。工人的劳动在計划的范圍內直接体現为社会劳动。这样就可以使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發揮劳动的积極性和創造性。

第四、在公私合营企業中，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可以得到公股代表直接、經常的領导、教育和工人群众的帮助、监督，这就更有利于發揮他們的才能和积極作用，为企業生产服务，并有利于他們学習新事物、新思想，克服旧的作風和習慣，进行自我改造。

因此，在公私合营企業中，劳資矛盾和公私矛盾能够获得更有效的处理，从而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提高質量，降低成本，逐步向国营企業看齐。能够不断改进生产，积累資金，有計划地扩大再生产，發展社会生产力。能够培养更多的工人干部和技术管理干部，进一步地教育和改造資方人員。

但是，在个别扩展公私合营的方式下，公私合营形式的优越性和作用还受到一定的限制，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首先，我国資本主义工商業中絕大部分是分散落后的中小企業，而实行个别公私合营的則是少数規模較大、設备較好的企業，这部分大企業实行公私合营，提高了生产經营能力以后，就更增加了为数众多的小企業的困难，加深了公私之間和私私之間的矛盾。其次，在个别扩展公私合营阶段，公私合营企業的利潤分配主要是采取“四馬分肥”的办法。在这种制度下，企業生产的增加必然会同时造成資本家剝削的扩大，这就限制着工人劳动积極性的进一步發揮和企業生产經营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因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發展的矛盾不能完全有效的解决。再次，由于剩余价值的規律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到企業的經营管理上来。因此，就不能从根本上堵塞資本家进行唯利是圖的違法活动的漏洞，使国家遭受損失，也影响对資产阶級分子的教育改造。上述这些矛盾，只有在公私合营进入新的發展阶段，即全行業公私合营和实行定息办法以后，才能够得到解决。也只有在这个阶段，公私合营形式的意义和作用才能够完整地發揮出来。

（四）由于个别企業的公私合营形式到全行業的公私合营形式

1955年下半年，开始了按行業地扩展公私合营。1955年年底，繼农業合作化高潮之后，在全国范圍內形成了資本主义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营的高潮。到1956年1月，全国資本主义工商業基本上实現了全面的公私合营。同时，公私合营企業的利潤分配，也从1956年起，由“四馬分肥”的办法改为采用定息的办法。这就是对全国各地区、各行業的公私合营企業，在实行公私合营时期，不論企業盈亏，按年息5厘(即5%)的息率，使資本家按照他們的清估后的投資額分得固定的利息。全行業公私合营是我国在改造資本主义工商業的实踐过程中創造的新形式，是資本主义工商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基本形式。

全行業公私合营是国家資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它比个别公私合营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这不仅是数量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从旧質到新質飞躍的关鍵。

第一、全行業公私合营和定息办法的实行，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資本家所有制已經不完整，只剩下了一

个取得定息的权利。資本家对企業生产資料的所有权已經和使用支配权分割开来。实际上企業完全已由国家管理。

第二、企業公私合营期間，資本家的利潤已經固定在一定的数額上，和企業盈亏無关。剩余价值的規律已經在企業的經营管理中失去了作用。企業盈余的增加不再扩大資本家的剝削，而只是增加国家資金的积累。这就基本上解除了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發展的束縛。

第三、社会主义已經在整个行業中树立了領导地位，控制了全行業的供应、生产和銷售各个环节，使整个行業都直接地納入了国家計划，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則进行生产和經营。資本主义的盲目性已經完全消失。并可以打破企業与企業之間的界限，按照国家的計划对全行業进行經济改組工作。对各企業的設备、技术、資金、人力統一調配使用，以及在行業之間和地区之間进行調剂。逐步改变私营工商業分散落后同国家經济建設要求不相适应的狀况。

第四、資本家在企業中的地位和职权發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們已經具有兩重身份：一方面他們还是資本家，另方面他們又是国家安排的企業公职人員。他們在企業中的职权已經不是依靠生产資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資本家的职权，而是国家給予的公职人員的职权。定息办法的实行从根本上堵塞了資本家唯利是圖思想發展的道路。这样，就更有利于發揮他們的經驗和才能，为国家和人民需要服务。也更有利于从工作实踐中对他們进行思想改造，把他們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因此，全行業公私合营和定息以后的公私合营企業，虽然在形式上仍然是社会主义成分同資本主义成分在企業內部的联系和合作，仍然是公私共有的企業。但企業中存在的資本主义因素主要地只是表現在資本家握有私股分取定息上，而社会主义已經在企業中占絕对統治的地位。因此，这种公私合营企業基本上已經是屬于社会主义性質的了。

在全行業公私合营后，对于某些小工業和小商業为了适应于分散生产和分散經营的特点和需要，并鼓励从業者的生产經营积極性，仍然采取了加工、訂貨和經銷、代銷的形式，并保留它們原来一些便利于人民群众的优良經营制度。但是，这种加工、訂貨和經銷、代銷形式已經不同于国家資本主义初級形式的加工、訂貨和經銷、代銷了。其主要区别在于这种加工、訂貨和經銷、代銷已經不是建立在生产資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公私合营的基础之上，因而成为公私合营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仍然給予小工業和小商業加工費、手續費、进銷差价等作为他們的收入。但这种收入实質上是一种計件工資的形式了。

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以加工訂貨、經銷代銷和个别公私合营为主要改造形式的阶段推进到以全行業公私合营为基本形式的阶段以后，由在利潤分配上以"四馬分肥"为主要分配形式推进到实行定息制度以后，可以說，已經完成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步驟。这一步驟的完成，基本上解决了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的矛盾，从而为完成最后的步驟——实現国有化准备了極为有利的条件。

三

無产阶級專政下的国家資本主义的性質和意义，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早已有了明确的闡述。列宁指出，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無产阶級夺取了政权以后，"全部問題——無論理論上或实踐上的問題——就是要找到正当的方法，应該怎样把資本主义之不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內和某种期限內是不可避免的）發展，引导到国家資本主义軌道上去，这必須賴有一些什么条件，怎样保証在不远將来变国家資本主义为社会主义。"（"論

粮食税”）

列宁关于国家資本主义的学說，已在我国革命的实踐斗爭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發展。国家資本主义是我国对資本主义工商業实行和平改造的必經途徑，是过渡时期阶級斗爭的特殊形式。各种国家資本主义形式正是体現了党和国家对資产阶級的又团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团結的政策。在和平改造的方針下，国家对資产阶級实行了贖买的政策，这就是說对收回他們的生产資料是付給一定的代价的。这种贖买办法，即是工人阶級在为了滿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同时，也从生产的利潤中，分配一部分給資产阶級。“四馬分肥”和“定息”都是贖买的具体形式。这就正如列宁所說的：“我們現在能够而且应当做到把这兩种办法結合起来——一方面要無情地懲治不文明的資本家，即懲治那班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資本主义’，也不去設想作任何妥协，只是用投机業和收买貧民等手段来繼續破坏苏維埃設施的資本家；另一方面要与文明的資本家，即与那班肯接受‘国家資本主义’，能实行这种資本主义，能以眞正用生产品供給千百万人之大企業底聪明練达組織者資格出現，能对無产阶級有益的資本家謀妥协，或向他們实行贖买”。（“論粮食税”）

在我国，国家資本主义是国家对資本主义工商業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統一体現。通过各种国家資本主义形式以及它們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国家正确地利用了資本主义工商業在扩大生产和商品流轉、积累国家資金、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維持社会就業等方面的积極作用，逐步改进了企業的生产和經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限制了資本主义的盲目性和破坏作用，限制了資本主义剝削和投机違法活动。同时，并逐步地改变了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善了劳資关系和公私关系，鼓励了資本家的經营积極性，結合企業的改造，教育和改造了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列宁曾指出：“誰是国家資本主义企業的組織者，誰就可以把它变为自己的助手。”（“論粮食税”）这一点已經为我国革命的实踐所光輝地証实。在我国过渡时期，国家資本主义的發展不仅沒有引起資本主义的泛濫，而且巩固了社会主义經济的領导地位，使整个社会經济的改造朝着社会主义胜利的方向發展。

全行業公私合营和实行定息以后，我国改造資本主义工商業的工作已經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这就是說，我国改造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第一个步驟——把資本主义改变为国家資本主义——已經完成。但是，公私合营企業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企業，資产阶級和資本主义剝削还沒有最后被消灭。因此，今后的任务就是要实現国家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轉变。在这个轉变过程中，还需要經过复杂的經济工作和政治工作。

我国私营工商業基础薄弱。許多企業設备簡陋、技术低劣、工序不全、經营管理混乱，在生产力和商業網的分布上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現象。因此，改造資本主义工商業，不但要改变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还要提高它們的生产技术和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經营管理制度。对这些情况复杂的企業，必須根据它們不同的具体条件和社会需要，区别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来提高和改进它們的生产和經营。对于資本主义企業中原来的經营管理制度，要进行細致的客观的分析，改革其中不合理的部分，保留合理的部分，利用它們更好地为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服务。因此，全行業公私合营以后，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則有計划地对它們进行經济改組、企業改革和技术改革，仍然是一項重要的經济工作。只有做好这些工作，才能够充分地發揮企業的生产力，以适应于社会主义經济發展的要求。

在目前的情况下，对資产阶級分子的思想教育工作更是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改

造資产阶級分子的目的，是要使他們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企業实行国有化的时候，做一个社会主义企業的工作人員。全行業公私合营以后，国家已經把原在企業中任职的資方人員全部安排在公私合营企業中担任各种职务，他們已經是在国家領导下工作。但是，他們还存在着剝削，还保持着資本主义經营思想和作風。因此，对他們的改造工作必須从兩个方面进行：一方面要組織和領导他們进行系統的学習，向他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一方面必須使他們在企業工作中有职有权，充分發揮才能，帮助他們做好工作，通过工作实踐提高思想，学習到社会主义的工作方法，使他們成为眞正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时，还必須繼續对公私合营企業中的工人群众进行有系統的教育工作和組織工作，使他們切实担負起进一步改造企業和团結教育資产阶級分子的任务，最后完成由国家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上接第46頁）在表述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相互关系上，我們覺得用不着像周谷城同志那样說："辯証法是主，形式邏輯是从"，"辯証法……是形式邏輯的主人"。（"新建設"1956年第2期，第59頁）等等。因为这样提法是不能說明科学間的眞正关系的。

* * *

总之，我們必須用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形式邏輯的性質以及其与辯証邏輯的相互关系。不能用形式主义的观点，把形式邏輯归結为文法一个系列的科学。我們不能不注意，現代資产阶級的学者，他們为了宣傳非理性主义，在竭力鼓吹形式主义邏輯理論。从罗素到卡尔納普，他們对邏輯进行各种各样的歪曲。邏輯实証主义的主要代表卡尔納普宣称："一种哲学的即邏輯的研究，必須是一种对語言的分析。"（卡尔納普："科学的統一"，轉引自康福斯著的"保衛哲学"，三联書店1955年版，第64頁。）并且具体地說这种分析語言的邏輯，只是涉及"形式的"性質，"不牽涉到符号的所指或式的意义，而單純地只牽涉到这种式所構成的符号，种类和次序。"（卡尔納普："語言的邏輯語法"，轉引自同前書，第65頁。）他們就是这样来歪曲邏輯的本質，企圖利用形式主义解除科学地認識世界發展的邏輯武裝，苟延其垂死的阶級命运。可是这套新花样，在馬克思列宁主义面前，都遭到了严重打击而破产。

我們中国的邏輯工作者，多半还是处在运用辯証唯物主义研究邏輯理論的初期。或多或少地在过去受着一些旧的影响，或者不知不覺地陷于形式主义，这当然不能与資产阶級学者的有意歪曲混为一談，不过我們应当重視这一事实，在邏輯理論問題中，反对唯心主义、形式主义，坚持唯物主义的路綫。

1956年9月5日于長春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郑廷础

孙中山不仅是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而且也是偉大的思想家。他遺留給我們許多宝貴的文化遺产，就中包括了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本文試圖分析他的哲学思想。本文曾参考了艾思奇同志的“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見“实践与理論”一書，1939年，上海生活出版社），苏联謝宁同志的“偉大的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原載苏联“哲学問題”1955年第二期）等文，特表示感謝。

在孙中山的領导和革命派的努力下，取得了辛亥革命的偉大胜利。由于革命派沒有發动广大农民的力量，革命胜利的果实被以袁世凱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級所窃取，辛亥革命終于流产。此后中国社会又进入一个黑暗的混乱的时期。

在封建軍閥黑暗統治的年代里，孙中山仍然坚持着斗爭。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感到很痛苦，并且不能不使他徬徨起来：如何才能找到出路，究竟到什么地方才能找到救中国的力量和方法。因此，敢于寻求眞理的孙中山不得不来总結他的革命經驗。这样，他就写出了他的著名的哲学著作——“孙文学說”。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給中国人民，也給孙中山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在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孙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賦予三民主义以新的生命。

孙中山繼承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优良傳統，并且在某些方面提出他的創造性的新見解。他繼承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学派关于宇宙起源于“太極”的学說，并且在許多方面对它加以發揮。在說明物質和精神的关系时，孙中山也沿襲了中国唯物主义的傳統講法：認为物为体心为用。在認識論方面，孙中山也提出了注重实踐的理論。孙中山也吸取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成果，如达尔文进化論思想等，丰富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

下面分三部分来講：孙中山的自然观，認識論，最后是結束語。

一

孙中山的唯物論，总归于三个基本問題：第一，宇宙起源論；第二，人类进化的过程；第三，物質和精神的关系。現在加以分别叙述。

（1）宇宙起源論。孙中山認为宇宙起源于“太極”。在中国哲学史中，各家对“太極”的解釋互有差别，有唯物論的解釋，也有唯心論的解釋。到了北宋周敦頤，把問題提得更明确了，他認为“太極”是万物的根源。孙中山繼承了中国唯物主义的这一傳統，重新提出：宇宙起源于“太極”，認为“太極”是万物的根源。他又利用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成果，对“太極”作了新的理解。他認为“太極”就是西方說的“伊太”。关于这一点，他說：

> 太極用以譯西名伊太也。（“中山全書”，二，“孙文学說”，上海中山書局版第43頁）

現在問題在于：孙中山講的“太極”是物質性的呢还是精神性的？我們認为他講的“太極”是物質性的。因为他認为“太極”就是“伊太”，而“伊太”实际上就是当时自然科学所說的气体狀态的“以太波”，是物質性的。因此，我們就有理由說他所講的“太極”乃是一种原始的混沌未分的气狀的物質。他又認为“太極”能够运动和变化。这样，他就肯定了物質变化的永恒性。

孙中山进一步描繪了宇宙万物演化的过程。他把世界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他說：

> 进化之时期有三：其一为物質进化之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之时期，其三則为人类进化之时期。（同前引書）

在物質“进化”之时期，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他說：

> 元始之时，太極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質，物質聚而成地球。（同前引書）

又說：

> 地球本来是气体，和太陽本是一体的。始初太陽和气体都是在空中，成一团星云，到太陽收縮的时候，分开許多气体，日久凝結成液体，再由液体固結成石头（今日之地球——引者）。（“全書”一，“民权主义”，第84頁）

这就是他說的“进化”的第一个时期，也就是地球形成的过程。自从地球产生到人类出現这一段时期，他把它叫作“物种进化之时期”。关于这个时期，他是这样描述的：

> 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成人，則为第二期之进化。（“全書”，二，“孙文学說”，第43頁）

这里，我們也必須看到，孙中山并沒有說明“生元”（細胞）由何而来。孙中山还指出，人类出現以后，“进化”进入第三个时期——“人类进化之时期”。以上是孙中山对于世界“进化”三个时期的划分。这种划分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它对世界万物的發生和發展的总过程描繪出了一个接近事实的輪廓；它說明了地球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也說明了人类是自然界物質長期發展的結果，是自然界的产物。这种見解是与当时自然科学發展的水平相适应的。

（2）人类进化的过程。孙中山根据达尔文进化論的观点，認为人类是由物种長期發展进化而来的。他說：

> 物种由微而显，由簡而繁，本物竞天擇之原則，經几許优胜劣敗，生存淘汰，新陈代謝，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同前引書，第43頁）

他还更进一步地指出：人类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并指出其进化的必然性。他說：

> 人由动物进化而成，不是偶然造成的。（“全書”，一，“民权主义”，第85頁）

孙中山認为人类出現以后，产生了新的特点：有了社会关系，以后出現了“阶級”，繼而产生了“仁义道德”和其他社会現象。因此，他認为不能把“物种进化之时期”中的物种进化的規律——生物进化的規律，用来解釋人类社会現象。什么是物种进化之規律？他說：

> 物竞天擇，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此物种进化之原則也。（“孙文学說”，第43頁）

他指出，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达尔文生存竞爭原則起作用，但是，不能用这个原則来解釋人类社会。他說：

> 乃至达尔文氏發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擇原則后，而学者多以为仁义道德皆屬虛無，而竞爭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則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級，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則之上矣。（同前引書，第44頁）

这种观点，在科学發达的今日看来，仍然不失为卓越的見解。

为什么"物竞天擇"原則不能适用于人类社会呢？他也作出了解答。他說：

> 此时期（"人类进化之时期"——引者）之进化原則，則与物种之进化原則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則，人类則以互助为原則。（同前引書，第43頁）

这就是說，人类是互助的，不是竞争的，所以物竞天擇之原則不适用于人类社会。这种观点，細加分析起来，有合理的因素，也有空想的因素。所說合理的因素是：孙中山反对弱肉强食，主張"博爱"，反映了民主主义革命家的偉大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他認为人类"互助"是为了建立"天下为公"、"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極乐之天堂"的理想世界。但是，由于他不主張阶級斗争，而主張阶級調和，因此，要想通过人类的"互助"，建立一理想的大同世界，在有阶級的社会里，是一种空想，是不可能的。

根据他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起源論和人类进化的学說，孙中山还提出了历史进化論的思想。他認为历史的發展是前进的运动，而且其速度日益加快，其前途日益光明。他說：

> 近代文明进步，以日加速，最后之百年，已胜于以前之千年，而最后之十年，又胜已往之百年，如此遞推，太平之世，当在不远。（同前引書，第44頁）

这种观点有力的打击了当时封建軍閥統治的不合理性和反动性。这怎样說呢？孙中山認为現在是实行"民权"的时代，可是"一般官僚至今还是主張复辟，恢复帝制"，"排斥民权"，这是和时代潮流不相适应的。他認为今天的时代是人民的时代，是"民权"的时代，而袁世凱等封建軍閥的作为是逆时代的作法。这样，孙中山的历史进化論的观点，在理論上用来打击当时封建軍閥統治的不合理性和反动性，难道这不是很明显的嗎？同时，这种理論也为他的民权主义提供了理論根据，从而，在理論上，武装了民主革命派。（見"全書"，一，民权主义，第91頁）因此，孙中山的历史进化論思想，具有理論和政治实踐的双重意义。但是，孙中山不了解历史进化的动力是什么，在当时，他也沒有找到走向"太平之世"的路。他所提出来的三民主义主張，并沒有得到实現。这样，孙中山在俄国人的影响下，在共产党的具体帮助下，他終于找到了新的力量，重新把他过时了的旧三民主义改变为适应于新时代需要的新三民主义。

根据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孙中山又进一步地对馬尔薩斯人口論加以駁斥。按馬尔薩斯人口論看来：人口增加是几何級数，物产增加是数学級数。孙中山認为馬尔薩斯的人口論是不合乎事实的荒謬的学說。虽然孙中山并沒有指出馬尔薩斯人口論的社会本質，但是，他已經明确地指出了馬尔薩斯人口論对于削弱民族的毒害作用。他認为法国因为曾經相信过这种学說，結果造成人口發展率很慢，这"都是中了馬尔薩斯学說的毒"（同前引書，"民族主义"第15頁）他提示国人千万别相信馬尔薩斯的这种荒謬的"理論"，不然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險。他进一步地指出：人口的繁荣是民族生命力的一个因素（不是唯一因素）。孙中山从理論上揭露了馬尔薩斯人口論的反科学性（从孙中山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看来）；从政治上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論根据。（他認为民族的强盛取决于下面三个因素："經济力"、"政治力"、"人口"。見"民族主义"第，二講）因此，孙中山对馬尔薩斯人口論的批判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这里，我們提一提孙中山对馬克思学說的态度。他認为馬克思的学說"是集几千年

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全書"，一，"民生主义"，第204頁）。孙中山之所以贊美馬克思的学說是因为馬克思的学說不是主观虛構出来的，而是根据客观事实得出来的。他說：

……馬克思專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問題的經济变迁闡發無遺。（同前引書，第203頁）

这也表明了孙中山，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应有态度。

（3）物質和精神的关系。这是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問題，哲学家因对这个問題的不同解决而区分为唯物論和唯心論二大陣营。孙中山繼承了中国唯物主义的傳統。他說：

在中国学者，亦恒言有体有用。何謂体，即物質；何謂用，即精神。（"全書"，三，"軍人精神教育"，第126頁）

这就是說物質是体，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用，是第二性的。他又認为：精神是离不开物質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他說：

二者（指物質和精神——引者）……不可分离。（同上）

在孙中山的全部著作中，从来沒有談到过有脫离人体而独立存在的什么精神。相反地，他坚决主張，精神是物質的最高派生物，精神并不是在有机体發生以前，或与有机体發生同时就存在了，它是在有机体發生以后产生的。

其次，孙中山以精神为物質之用是專指生物界特别是人类而言的，离开生物界的范圍，無所謂精神之用了。在孙中山的思想里，并沒有那把物質和精神的体用关系普遍到全宇宙的庸俗思想。他仅仅認为精神作用只为人类所独有。他說：

世界上仅有物質之体，而無精神之用者，必非人类。（同上）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孙中山所謂的精神并不是玄妙的不可測的超越于客观事物之上的离奇的东西，而是高度組織起来的活的有机体的屬性。

根据他对物質和精神的关系的正确看法，孙中山第一，駁斥了二元論观点。孙中山認为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是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联系着的：

精神虽为物質之对，然实相輔为用也。（同上）

这样，孙中山就駁斥了"以精神与物質为絕对分离"的二元論的观点。第二，他駁斥了庸俗唯物論的观点。孙中山認为精神与物質并不是同一的东西，他說：

精神……为物質之对。（同上）

这样，他就駁斥了把精神和物質等同起来的庸俗唯物論观点。

但是，我們也必須指出，孙中山对精神所下的"定义"的弱点。他說：

至于精神定义若何，欲求精确之界限，固亦非易，然簡括言之，第知凡非物質者，即为精神可矣。（同上）

从这段話看来，好像孙中山把精神說成是和物質并存的东西，是二元論的思想吧？！我們認为不能这样理解。实际上，它表明孙中山不懂得精神和物質之間的辯証关系，同时也夸大了精神作用。但是，我們也应該看到：在孙中山的政治斗爭实踐中，对于这种精神反作用的夸大的說法是可以理解的。

孙中山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有它的局限性，因而对唯心主义作了重大的讓步：

夫心也者，万物之本源也。（"孙文学說"自序）

这种講法显然是唯心論的講法。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孙中山是在什么样的具体

条件下講这話的。孙中山自己回忆說：辛亥革命所以推翻清廷政府，是因为党人抱着坚决推翻清廷的宏偉志向。清廷被推翻后，有的党人变質蛻化，投奔到封建軍閥的幕下，以分潤一点殘羹；有的被軍閥恐怖所吓倒，退出了革命；有的再不相信三民主义了，反認为他的“理想”太高。既然党人步調不一，不能把革命坚持到底，这样，要搞“建設”也就不容易了。特别是当他把“心”了解为“万众的心”、“人群之需要”时，那就更进一步接近唯物主义了。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孙中山对社会發展的动力是不了解的。因此，他也就不能懂得为什么他的三民主义理想不能实現，而把原因归之于“吾心信其不可行”之故。孙中山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說的“夫心也者、万物之本源也”这句話并不表示他放弃了唯物主义的立場，而是由于他过份地夸大了人类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对唯心主义作了重大讓步。我們評定一个哲学家，并不仅仅看到他的个别的詞句，而要看他在整个思想体系中，对哲学的基本問題是怎样解决的。

孙中山唯物主义思想的弱点还表現在他对“生元”的学說上。他說：

> 生元者何物也？曰，其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議者矣。……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覚灵明者也。（“全書”，二，“孙文学說”，第8頁。）

孙中山在歌頌生命現象之奇妙复杂。而当时生物科学还沒有能力完全認識生命的起源。孙中山自己就說：“人身之奥妙，尙非人类今日知識所能穷也。”（同上）孙中山对生命現象的解釋不包有神秘主义的傾向，就是在这一个問題上，反动的蔣介石走狗陈立夫对“孙文学說”进行了歪曲，制造出他的反动的唯心主义法西斯哲学——唯生論。孙中山認为动植物（包括着人类）乃是由“生元”（細胞）組成的。而“生元”是一种很奇妙的物質。蔣帮的陈立夫就利用了孙中山这一含混不清的观念，說什么“我們关于元子性能的說明与总理所解釋之生元之功能正完全一致。”（陈立夫，“唯生論”，卷上，第19—20頁）“元子”是什么呢？答曰：組成宇宙的最小單位。这就是說，宇宙是“元子”組成的。“元子性能”是什么呢？他說：

> 元子是有生命常活动且具有神妙的智慧与偉大的能力的东西……元子为宇宙間有生無息大智万能的主宰，……。（“唯生論”，第18頁）

这就是說宇宙万物都有生命，生命主宰着一切。陈立夫又說：

> 在我們唯生論的見地，是認为宇宙万物都有生命的，并不承認唯有动植物才是生物，或者說根本就不承認宇宙間有一死物。（“唯生論”，第20頁）

陈立夫歪曲了孙中山的学說，認为“宇宙一切皆有生命”。他是在宣傳他的法西斯哲学“理論”。唯生論这种理論的的荒謬和反动是很徹底的。它說万物都是有生机的，有生命現象的，有精神作用的，冥冥中有一种“求生存的意志”（“唯生論”，第46頁）在支配着万事万物。因而社会的發展不是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更不是由于阶級斗爭的推动，而是任何人，不管是剝削者或被剝削者，不管是帝国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他們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取得最好的“生存机会”，蔣介石反动派認为这中間沒有什么是非曲直。陈立夫企圖在“唯心或唯物的二个偏見之外，另外得到一个充实美滿生趣盎然的哲学”。（“唯生論”，第6頁）实际上，却是更狡猾地宣傳着極端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唯生論。关于他提出唯生論是为了反对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这几年来唯物的論調，日見其囂張，唯心的論調，又失之空寞，結果徒使举世滔滔。（“唯生論”，第6頁）

这就是說，由于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时中国思想界广泛地傳播开来，唯心主义哲学得不到發展，“失之空寞”。因此，在陈立夫看来，有必要提出唯生論来与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抗。这就是陈立夫提出唯生論哲学的政治用意所在。

二

孙中山对人类認識問題也进行了闡述。知行問題是其中的重点。

关于这个問題，孙中山的基本論点是“行先知后”，“知难行易”。我們將从对这二个論点的分析中看出他的認識論的唯物主义实質。

在說明孙中山的認識論以前，我們了解一下中国哲学史中对知行关系的爭論，不無好处。知行二字最早見于尙書，但尙書对知行并沒有作出詳細的解釋。知行是中国哲学中二个重要的范疇。各家对知行关系的意見归納起来不外是唯物論与唯心論的兩种解釋。唯物論的解釋，以王船山为代表。他們認为知包括二方面的意思，一是对事物的認識，一是对道德的認識。他認为行，从普遍意义上来說，是应事接物。对知行关系的見解，他既不同意程朱“先知后行”的見解，也反对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在中国哲学史中，他是坚决主張提出：行先知后，知以行为基础的新見解的一个。

孙中山繼承了中国唯物主义認識論正确的部分，又根据他自己的革命經驗和他所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从社会整体的观点和社会进化的观点，提出他的新見解。

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的学說，以与当时正流行着的“知易行难”的学說相对立。他認为“知难行易”学說是眞理，“知易行难”学說不是眞理。为什么呢？这原因是由于相信“知易行难”的人所了解的知不是科学的知，透徹的知。知道得透徹，做起来就是容易；知道得不透徹，做起来就困难。所謂知道得透徹，不但知道理想和目的，而且还知道实現理想和目的的手段和方法。然而，相信“知易行难”的人，对事情只看到理想和目的就算是知了，不求知道怎样做。这种知，要拿来实行，自然是沒有根据了。仅仅以这样的知为滿足的人，要他不相信“知易行难”的錯誤思想，自然是困难的。在孙中山的一次演講中曾講到工人和农民的合作問題时，指出：要工农合作，自然并不是困难的事，但問題在于：怎样使他們合作，这自然不是容易的事。他說：

难处是由于不知，不是不能行，是由于不知道怎么样去行。（“全書”，三“演講集”。）

这正是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的学說所要求的。孙中山以为中国“欲由革命一躍而几于共和宪政之治”，也必須經过一定的条件；他認为中国人民知識太淺，政治能力太差，要实行共和，必須“創一过渡时期为之补救”，那就是“訓政时期”；“在此时期，行約法之治，以訓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以上見“全書”，二，“孙文学說”，第57頁）不管他对人民的这个見解是否正确，但要达到目的，必須有一定的方法和条件。这种見解，無論如何是正确的。在这里，孙中山不仅不是一般人所誤解的那种只有理想而無实行的空談家，同时他自己正是反对那种空想革命家。当时有些人不了解孙中山的“行約法之治”的“訓政时期”的意义，孙中山就批評了这种錯誤。他說：

当时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所主張，而只采予約法之名，以定临时宪法，以为共和之治，可不冉其道而一躍可几。当时众人之所期者，实为妄想，顧反以予之方略計划为难行，抑何不思之甚也。（同前引書）

所謂知，用哲学术語来說就是認識。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說里的“知”的理解，就是他的哲学思想的認識論。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演說里，他講过：

> 何以革命不能成功，皆由于方法未善之故，使反革命派能乘隙以入，施其破坏而不覚，虽至失敗，尙不知其所以失敗的緣由，若当时有办法，有团体，事先防范，繼續努力奋斗下去，建設起来，則只需三年之时期，其效果已頗有可观，决不至如今日之一無成績。（“全書”，三，“演講集”第246頁）

这种求进步求“知”的精神，正是孙中山提出三大政策，树立新三民主义，掀起新的革命高潮之原因。这正是由于他的“知”是以客观事实的根据和条件为基础的。提出适合于現实情况的知，正是由于孙中山的認識是唯物主义的。孙中山在“軍人精神教育”一文中，曾指出人类的認識是随客观事物的發展而發展的，而不能停留在旧的立脚点上。他說：

> 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識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否則漸卽于老朽頹唐，灵明日錮。（“全書”，三，“演講集”，第131頁）

这段話正是他的認識論的唯物主义要素的反映。

只知道理想，不知道方法；只知道做，不知道怎样做；只知目的，不知手段；不知根据，不知条件；只知主观意圖，不知客观情况，这正是主观主义的知，唯心論的知。这样的知不是孙中山所需求的知。这样的知，自然是“易”的，然而不是“眞知”。这实际上是淺見。他說：

> 凡眞知特識，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眞知識也。如中国之習聞有謂天圓而地方，天动而地靜者，此数千年来思想見識，習为自然，無复有知其非者。然若以科学按之，以考其实，則有大謬不然者矣。（“全書”，二，“孙文学說”，第48頁）

由此可見，孙中山所了解的知是科学的知，是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的“眞知”。他認为古来中国所說“俗呼养子为螟蛉，盖有取于蜾蠃变螟蛉之义”是錯誤的。从科学研究起来，才知道蜾蠃并不是把螟蛉作为自己的子，而只把它作为自己的子的粮食。普通人只从表面看問題，所以不了解事物的眞实的內容。如果只把这样的知作为知，自然是很容易的，但可惜这非“眞知”，而一般人只以这种“知”为滿足。所以孙中山說：“吾国人所謂知之非艰，其所知者大都类于天圓地方，天动地靜，螟蛉为子之事耳”（同上）。这是淺見，只看到表面的現象或假象，而不滲透到事物的眞正的本質的深处去。这样自然就不能得到“眞知”，科学的知。

以上是从知的內容方面来說他的唯物主义。至于从知的根据方面来講，孙中山又怎样呢？他認为知識的范圍很广闊，整个宇宙都是人們探討研究的对象。他說：

> 智之范圍甚广，宇宙之范圍，皆为智之范圍。（“全書”，三，“軍人精神教育”，第131頁）

并且，他还进一步指出“智”的三个来源。他說：

> 智何自生，有其来源。約言之，厥有三种：（一）由于天生者；，二由于力学者；（三）由于經驗者。中国古时学者，亦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之說，与此略同。（同上）

那么从来源来說，孙中山似乎是說人类中有天生的認識，不待学習，就可以获得眞理。也就是說眞理不必来自客观物質世界的反映，可以憑人的主观自生的吧？如果說知識可以不必建立于物質世界的反映上面，这是对孙中山的誤解。若是我們仔細加以分析，孙中山的意願并非如此。孙中山这里所說的“智”由天生，并不是說“知”由天生。也就是說人的聪明智力可以得自天賦，但并不

是人的認識得自先天。或者說，孙中山說的“生知”，不是指天賦观念，而是指人的智力。必須把这二者区别开来，才能懂得孙中山对“生而知之”的理解，并不是唯心主义的。孙中山自己就是这样說的：

> 凡人之聰明，惟各因其所得天之厚薄不同，稍生差别，得多者为大聰明，得少者为小聰明，其为智則一，此由于天生也。（同上）

这种理解，并沒有錯。馬克思主义認为人类的才智是有差别的，只有当人們辛勤劳动，不断学習和实踐时，他的才智才能放出光彩。孙中山認为重要的还是“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关于这，他說：

> 若由学問上致力，則能集合多数人之聰明以为聰明，不特取法現代，抑且尙友古人，有时較天生之智为胜。例如甲乙二人，甲聰明而不好学，乙聰明虽不如甲，而好学过之，其結果，乙之所得，必多于甲。此則由于力学也。（同上）

又說：

> 此外亦有……由經驗得来者。諺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故所历之事旣多，智識随亦增長，所謂增益其不能者，此由于經驗也。（同上）

我們就可以看出：孙中山所說的“知”——認識，是根源于客观物質世界，是物質世界的反映。而聰明才智只是作为一个有利条件存在着，它本身并不是認識的来源。孙中山也从来沒有說过“先知先覚者”的認識是天然生来的。

我們进一步地研究孙中山“知难行易”的学說，就可以証明在知的来源方面，孙中山的見解亦是唯物主义的。要了解孙中山对知行关系的解决，我們必須了解他的“行”的意义。他所了解的“行”，是指的：观察、实驗、經驗等。他說：

> 对于一件事，須用观察和实驗的方法，过細去研究，研究屢次不錯，始認定为知識。（“全書”，三，“演講集”，“国民要以人格救国”，第176頁）

在另一处，他又說：

> ……費千万人之苦心孤詣經历試驗，而后知之。（“全書”，二，“孙文学說”，第48頁）
>
> 夫練習也，試驗也，探索也，冒險也，此四事者，乃人类文明之动机也。（同上）

在“民权主义”第一講里，孙中山談到知識的来源时，說：“世界上考究万事万物……要靠实地去考察，不專看書本的历史。”比如对地質、禽獸、土人作考察，便能推知我們祖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全書”，一，“民权主义”，第86頁）。諸如此类的例子，在他的著作中屢見不鮮。根据上面的材料，我們可以知道，孙中山着重实踐，乃是唯物主义的認識論的实踐观。（当然，他的实踐观有一定的局限性，留待后面再講）明白了孙中山对“行”的理解后，我們再来看看他对知行关系如何解决。孙中山繼承了中国唯物主义路綫，認为行在先，知在后，实踐先于認識。他說：

> 身內飲食之事，人人行之，而終身不知其道者。（“全書”，二，“孙文学說”，第15頁）

就是說，飲食是通常的事情，但人人对飲食衞生的科学却一点不知。人人天天在用錢，对于錢的眞正性質通常却沒有眞实的了解（“孙文学說”，第二章）。日本当初的維新也不是知道了这条道路才去做的。最初不过是由于“外患憑凌，幕府無措，有志之士，激于义憤，于是倡尊王攘夷之說，以鼓动国人”，然而不知不覚之中“攘夷不就，則轉而师夷，而維新之業，乃全得师夷之功。”这就是日本自以为做尊王攘夷之事，而不知实际上所行的是“师夷”，“是故日本之維新，多賴冒險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維新而已。”（以上見“孙文

学說”，第五章）

行在先，知在后是孙中山在認識来源上的唯物主义的見解。这是說事实在先，認識在后，認識是在实踐的基础上产生的。据此，孙中山对王陽明的唯心論認識論——“知行合一”学說提出了批評：

> 若夫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所以勉人为善者也，……其勉人为善之心，誠为良苦，無如其說与眞理背馳，以难为易，以易为难；勉人以难，实与人性相反。……陽明之說……究無补于世道人心也。（“全書”，二，“孙文学說”，第五章）

不只这样，孙中山还指出王陽明認識論的唯心主义的实質。他認为王陽明的“合知行于一人之身”的見解是錯誤的。王陽明号称的“知行合一”，实际上是把行归并到知里面，取消了行。

根据行先知后的观点，孙中山对盧騷民約論的天賦观念思想进行了批評。盧騷認为民权是天賦的，人生来就具有民权思想。孙中山認为：

> 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全書”，二，“民权主义”，第4頁）

接着他又指出：并不是先有了盧騷的“言論”，然后才發生法国民权的“事实”；相反，先有了法国民权的潮流，然后才有盧騷关于民权的“言論”。

孙中山認为“思想”乃是“时势潮流”的反映，是在“时势潮流”的基础上产生的。孙中山虽然正确地認为盧騷的民权思想乃是由于法国当时“时势潮流所造就出来的”，但是，他并不了解产生法国当时“时势潮流”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实質。因此，当他一涉及到社会历史問題时，他就不能貫徹唯物主义的原則了。尽管这样，孙中山对盧騷天賦观念的批判，表明了他的唯物主义認識論的立場：“先有事实，后有言論”，先有实踐，后有認識。

孙中山認为“知难行易”是眞理，不知亦能行。不知亦能行，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求在实踐中来認識客观物質世界。他認为，我們所要得到的知識，常常是在反复实行之后才能达到的結果。他說：

> 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費千百年之时間以行之，而后乃能知之。或費千万人之苦心孤詣經历試驗，而后知之。（“全書”，二，“孙文学說”，第47—8頁）

虽然孙中山說的这几句話比較簡單，但反映了人类認識的眞理和認識史的特点，那就是：人类对于客观物質世界的認識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一系列的实踐过程。孙中山把人类認識史分为三个时期——“不知而行之时期”，“行而后知之时期”，“知而后行之时期”——，不亦有理乎！因为它反映了人类認識的特点，并且和科学認識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他說：

> ……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發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同上）

由不知到知，由不認識到認識都是通过实踐过程的。能够这样地把握認識論問題，这不仅是唯物主义的，同时也是辯証法的。旧的机械唯物論都不能了解人的主观努力和实踐活动在人类認識中的作用。旧机械唯物論認为認識是直观的，也就是說，在他們看来，人好像是一面鏡子，客观世界有什么，他只是消極地把它反映进来。在他們那里，人类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沒有什么意义。这种对于認識的直观的了解是錯誤的。科学的眞理是通过实踐的活动从客观物質世界得到的。离开了实踐，人类的認識就不可想像了。实踐不仅認識自然是重要的，而且認識社会現象亦是重要的。对于自然界的認識，

孙中山認为通过观察、实驗、經驗等方法。（关于这一点，上面已經講过了）对于社会問題的認識，孙中山認为要通过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当然，孙中山所了解的社会实踐与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是二回事，留待后面講）沒有实踐就不能获得眞知識；人們不可能先求知而后行。孙中山認为要想离开实踐而求得理論的認識是不可能的，或者不会得到成功。他說：

> 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同前引書，第46頁。）

由此可見，孙中山是把行放在認識論首要地位上。他說"不知亦能行"，其意义也正在于此。关于这一点，他說：

> 中国人几尽忘其远祖所得之知識皆从冒險猛进而来，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繼則行之而后知之，其終則因已知而更进于行。（同前引書，第47頁）

又說：

> 人类之进步，皆發軔于不知而行者也。……夫練習也，試驗也，探索也，冒險也，此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生徒之練習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欲能也。科学家試驗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發現也。偉人杰士之冒險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業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同前引書，第73頁）

从这二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孙中山正确地認为知識依靠实踐求得；同时又依靠所获得的知識，帮助我們更进一步的实行。他說：

> 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同前引書，第48頁）

由实踐到認識，又由認識到新的实踐，这样来了解知行关系，乃是合乎辯証法观点的。孙中山認識論中的辯証法因素还表現在：他認为人类对客观物質世界的認識彼此是有联系的，比如，电学（人类对电的認識）和化学（人类对物質变化的認識）就有密切的联系。他說：

> 近世科学之發达，非一学之造詣，必同时众学皆有进步，互相資助，彼此乃得以發明。（同前引書，第40頁）

由此可見，孙中山把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認識，从社会总的認識联系中来加以考查。这也是他的認識論中辯証法因素的另一方面的表現。所以从認識論，整个說来，孙中山固然不是辯証唯物論者，但是，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却具有不少的辯証法的因素。

現在我們又要問：为什么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的学說来？这样提法究竟对不对呢？这一学說的理論根源和社会根源又是什么呢？

"知难行易"学說是在行先知后这一基本前提上提出来的，并且以行先知后作出發点。根据我們上面所分析的孙中山对知行概念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因此，他說的行先知后亦是唯物主义的。从行先知后所引申出来的"知难行易"学說，我們又如何去估价呢？前面我們已經分析了他对"知难"的理解：他說的"知"是科学的"知"，并且包括着二方面的內容——理想，目的，以及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方法。要把握这样的"知"，自然是困难的。孙中山根据人类認識自然的情况和他自身的革命經历都充分說明了这一点。所謂"行易"，因为"不知亦能行"。这是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学說的理論根源。

其次，孙中山提出这一思想亦有其社会根源。清王朝虽被推翻，但革命总不能成功，因为革命需要在破坏之后进行建設，而一提到建設，就受到許多人的指責："先生之志高矣远矣；先生之策，閎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何？"人人都以为孙中山理

想太高，以为他提出来的方案都沒有实現的可能。这就造成了施行他的革命理想的一大思想上的障碍。于是他再三考虑，“專从事于知易行难一問題，以研究其究竟。几費年月，始恍然悟于古人之所縛，今人之所信者，实似是而非也。”于是有得：“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知之而又不行者，則誤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以上均見“孙文学說”，第一章）他認为知易行难的思想“傳之数千年，習之遍全国”，“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为牢不可破”，他認为“知易行难”之說是他“生平之最大敌”。为了在革命事業中謀成功，不能不“先作学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被国人視为理想空談也。”（以上引自“孙文学說”，自序）

孙中山認識論中的唯物論見解是馬克思主义以前中国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創見。这表現于下面几点：（一）中国历代唯心主义的思想家們，总是把对于封建道德的認識作为人类認識的最高标准的。他們所謂的实踐，無非是封建道德的履踐。可是孙中山呢？他非常重視科学的实踐。孙中山繼承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王船山的行先知后的观点，并且問題提得比王船山更明确。王船山說：“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艰者先，先难也，非艰者后，后获也。”就知行先后来說，孙王見解一致；就知行难易来說，二人意見不同。孙中山在这些問題上，都有詳甚精辟的論証。（二）中国古代思想家們，都是从个人方面来看待知行关系問題，因此，他們就不理解实踐的社会意义。孙中山却对社会比較有整个的看法，他从社会的进化証明行先知后，知以行为基础，因此，他能唯物論地解决知行关系。

但是，我們也必須指出：孙中山的認識論仍然有着局限性。首先，他对实踐的了解有时是很片面的，形而上学的。他有时把实踐仅仅理解为：观察、实驗等，沒有跳出自然科学所使用的方法范圍。他不了解社会实踐的全部內容——生产实踐和阶級斗爭实踐。所以当他一涉及到社会历史問題的时候，他就不能貫徹唯物主义的原則了。比如，他認为他的三民主义沒有得到实現是由于“知易行难”一說所起的思想障碍的緣故，（馬克思主义并不否認这点，但不仅仅归結于这一点），而不了解：这是由于地主經济基础沒有得到改变之故，是由于广大的中国农民——革命的主力沒有發动起来之故，沒有先进的阶級領导的原故。总之，是由于他不了解生产关系变革的实踐和阶級斗爭的实踐。因此，他也就不能正确地說明他的三民主义不能实現的原因。正像毛主席在“实踐論”中所說的：“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不了解認識对社会实踐的依賴关系，即認識对生产和阶級斗爭的依賴关系”。

其次，孙中山有时形而上学地割裂了理論与实踐的关系。他說：

> 以科学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經济学分工專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同上書第46頁）

即使在“科学愈明”的时期，社会分工怎样繁杂，人类的認識总是不能离开实踐的，（虽然他認为認識是建立于实踐的基础上）說理論可以脫离实踐，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錯誤的。

为什么孙中山的認識論有很大的局限性呢？原因何在？这是由于資产阶級局限性所决定的。第一，孙中山不了解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偉大作用。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改造的偉大力量，同时也是認識客观世界的偉大力量。人民群众在实踐中，不断地积累着丰富的經驗，为規律性的認識——科学的認識（即孙中山所說的“眞知特識”）提供了極为重要的知識材料，使之上升为理論。而理

論又要回到实踐中去檢驗，这又須要經过人民群众的实踐活动过程。因此，截然地等分为知和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由于孙中山沒有正确地估計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虽然他認为行很重要，而且行在人民）这就使得他有时在解决知行关系时，产生了形而上学地隔裂二者关系的缺点。第二，孙中山，作为一个民主主义的革命領导者，有时过分推重知的重要，这固然是由于为了解决中国的革命問題，急于寻找新的革命眞理而感到困难的緣故；但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夸大了"先知先覚者"的作用的原故。这样，他对知行关系的解决，有时就产生了理論脫离实踐的形而上学的缺点。

三　孙中山哲学思想有着革命的战斗的意义。

孙中山哲学思想的历史貢献在于：

甲、自然观方面：

（一）孙中山明确地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宇宙起源論和宇宙进化論的思想。他認为"太極"（伊太）是世界万物的根源和总体，而"太極"是物質性的，这样，他就肯定了世界是物質性的。

（二）关于物質和精神的关系，孙中山繼承并發揮了中国唯物主义的傳統講法，認为："物質为体，精神为用"，提出了对二元論和庸俗唯物論观点的駁斥。

（三）根据宇宙进化的过程，孙中山提出了历史进化論的思想。

（四）孙中山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認为社会"进化"和自然"进化"有着本質的不同。

乙、認識論方面：

（一）孙中山認为"知"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質的認識，即他所說的"眞知特識"：行是科学的实踐：观察，实驗。

（二）对知行关系問題，他提出了二个基本論点："行先知后"，"知难行易"。所謂"行先知后"是：实踐先于認識，認識依靠实踐，这正是孙中山唯物主义的認識論貢献。

（三）在孙中山的唯物主义認識論中包含了不少的辯証法的因素。比如，他認为認識不仅要依靠实踐，并且指导新的实踐；对客观世界的認識彼此互有联系。因此他認为認識必須从社会总的認識联系中来加以考查。

但是，孙中山不懂得物質和精神之間的辯証关系，因此，他对精神現象的解釋模糊不清。他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因而在某些問題上对唯心主义作了重大讓步。孙中山把实踐了解为观察、实驗等，不了解阶級斗爭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实踐，因而在历史观方面不能不陷入唯心主义。其次，他有时把理論和实踐加以形而上学的分割。

偉大的阶級論者——魯迅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20周年

李瑞良

阶級和阶級斗爭理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內容，是無产阶級的重要理論武器。無产阶級的革命利益要求每一个党的和非党的战士用科学的阶級論武裝起来，作为革命斗爭的有力武器，也作为思想改造的有力工具。

阶級論是魯迅思想發展的高峰。不能說，在魯迅的前期思想里沒有强烈的阶級意識，这种阶級意識是他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基本特征。但也应該說，他早期的阶級意識与現代阶級論之間还有性質上的区别，因为在那时期他还沒有看到阶級社会的历史規律和眞正动力，特别是还沒有看到無产阶級的历史作用；这就是說，他的思想还沒有提高到完全科学的程度，而这种提高就是意味着質的飞躍，意味着立場的轉变，——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場到無产阶級立場的轉变。不是别的，正是革命的阶級論使魯迅的后期思想煥發着具有巨大生命力的光彩，并表現出一个偉大思想家的实踐力量。

因此，沒有疑問，考察魯迅的阶級論思想是發掘魯迅思想遺产的重要环节之一。

这里所論到的，只是魯迅的阶級論的几个主要方面，也就是他的后期思想的一些重要特征。

一

馬克思主义的阶級論即科学的阶級論，是社会發展規律的理論总結，是具有內在联系的科学体系，是整个馬克思主义的有机部分，它根本不同于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阶級論点。因此，掌握革命的阶級論是关系到革命者的立場和党性的根本問題，它意味着立場、观点和方法的根本变革。

作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魯迅的阶級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不是点滴的摭拾，而是他从立場到观点，从世界观到方法論的根本变革的結果和表現。

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阶級論者的世界观和社会观。同样，哲学唯物主义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而被魯迅接受下来的。唯物主义立場是魯迅的阶級論的科学基础。从哲学唯物主义出發，魯迅广泛地論証了思想意識的第二性和文学艺术等意識形态的阶級性問題。他正确地認为：在阶級社会里，阶級地位的不同决定人們思想見解的歧异和对立，而阶級地位的不同不是抽象的唯心主义語句，而是实际的阶級利益的区别和对立；阶級矛盾，特别是資产阶級与無产阶級之間的矛盾，是对抗的，不可調和的。他說：

> 帝国主义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癡宜，是它們的宝貝，那么，它們的敌人，当然是我們的朋友了。（“南腔北調集：我們不再受騙了”）

資产阶級学者企圖用阶級調和論来代替阶級矛盾論，来掩盖阶級压迫和阶級斗爭的現实。跟資产阶級的阶級調和論作斗爭，是魯迅站在無产阶級立場上所进行的理論上的

第一仗，也是他的科学的阶級观点的第一次煅煉和考驗；而这一仗輝煌地表現出魯迅在文化战綫上的主將的作用，証实了魯迅的無产阶級立場，并且出色地表达了他的科学的阶級論点。針对着当时資产阶級学者梁实秋的“人性論”，魯迅指出，人在阶級社会里即断免不掉所屬的阶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实乃出于必然。”（“二心集：‘硬譯’与‘文学的阶級性’”）这就是說，阶級和阶級对立是阶級社会本身的产物，是社会的規律性。阶級矛盾的对抗性决定阶級斗爭的尖銳性。在另一个場合，他說，对于剝削阶級，被剝削阶級“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記”）由此可見，阶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調和主义不过是剝削阶級的欺騙而已。不但如此，因为阶級斗爭是在一切社会生活領域中进行的，所以阶級立場問題是一个根本問題，在現代的阶級斗爭中，对于任何革命工作者来說，解决立場問題是解决其他問題的先决条件；立場不明确，就必然会产生許多問題。同时，由于立場問題帶有根本性質，因此，改变立場，从非無产阶級立場轉到無产阶級立場，是一种切实的艰巨的思想斗爭。魯迅本人，从进化論到阶級論，从紳士阶級的叛逆到無产阶級的战士，就是經过一个复杂的斗爭过程的，这个过程意味着旧立場的鄙弃和新立場的确立。所以，魯迅深刻地体会到立場問題的重要性和改变立場的复杂性。他認为，立場的轉变是有一定規律的，是有踪迹可寻的，是具有实际的阶級內容的，所以它根本不同于变幻莫測的流氓作風和空洞叫喊的机会主义。他說：

> 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变化并無綫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論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 他現为批評家而說話的时候，就随便撈到一种东西以駁詰相反的东西。要駁互助說时用爭存說，駁爭存說时用互助說，反对和平論时用阶級斗爭說，反对斗爭时就主張人类之爱。論敌是唯心論者呢，他的立場是唯物論，待到和唯物論者辯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論者了。（“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論者”）

所有这些，跟轉变立場是毫無共同之处的。魯迅之所以能够尖銳地提出这个問題，洞悉那些流氓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的行徑，并揭露他們的阶級本質和社会淵源，正是他自己立場明确的佐証。

阶級斗爭的原則要求劳动人民具有明确的阶級自覚性。阶級意識的任何削弱和模糊，只能对剝削阶級有利；任何自流傾向和放弃党的領导的企圖，都是对革命事業的損害。在反动統治时代，統治阶級爪牙用“人性論”、“民族主义”等幌子来否認社会的斗爭現实，模糊大众的阶級意識，以配合其对革命力量的“圍剿”。在这种情况下，宣揚革命的阶級意識，激發大众的阶級自覚性，就不仅是經常性的任务，而且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迫切課題。在魯迅笔下現出了原形和尾巴的那些反动論調，从新月派的人性論，寵犬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直到向無产阶級要自由的文艺自由論或第三种人，不論它們之間有那些差别，但有一点是它們所共有的，这就是他們否認文学的阶級性和阶級斗爭的必然性。而否認这一点就是否認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求無产阶級在凶恶的敌人面前放下自己的武器。魯迅清楚地意識到这一点。在他的論战文字中，阶級和阶級斗爭观点像一根軸綫一样貫穿在他的論点的各个方面；在他的笔下，燃燒着阶級斗爭的火焰，洋溢着强烈的阶級感情。他十分清楚，在現代的阶級斗爭中，即在無产阶級領导下的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及买办集团之間的斗爭中，超阶級的人是沒有的，第三种人是站不住的。或者是有利于資产阶級，或者是有利于無产阶級和人民大众，問題就是这样摆着的。無产阶級阶級斗爭的利益要求立場明确、旗帜鮮明的战斗者；非無产阶級出身的人必須站

到無产阶級的立場上来：

> 小資产阶級如果其实并非与無产阶級一气，則其憎恶或諷刺同阶級，从無产者看来，恰如較有聰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沒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無須管得，更說不到損益。（“二心集·关于小說題材的通信”）

魯迅的阶級論思想在他維护文学的党性原則方面有充分的表現。应該說明，他的革命文学思想是他整个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組成部分，和他的阶級論思想是相互發揮的，絕不是片断的或偶然的摭拾。这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他不仅在文学方面，而且在社会意識形态的其他方面也貫徹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例如，他指出，社会道德，作为意識形态的一个范疇，也深深地打上阶級的烙印，因此，压迫者的道德与被压迫者的道德并不相同。（見：“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記”）根据这个道理，他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所竭力提倡的“中国固有文化”的阶級本質：

> 这固有文化本来毫無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約的信义，是“誘敌深入”的和平。（“南腔北調集：眞假堂吉訶德”）

从社会意識的阶級性的原理出發，魯迅有力地說明了文学的党派性問題。在“‘硬譯’与‘文学的阶級性’”这篇著名的文章中，魯迅不但粉碎了資产阶級唯心主义的人性論，宣揚了文学的阶級性原理，并且进一步論証了革命文学对整个革命事業的巨大战斗意义，預見到它的無限的發展前途。他說：

> 無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們之力，来解放本阶級并又一切阶級而斗爭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二心集：‘硬譯’与‘文学的阶級性’”）

魯迅的阶級論思想也表現在他的阶級分析方法上。他对于历史事件和社会現实的阶級分析，是他的文字的巨大邏輯力量的重要根源之一。例如，在“‘硬譯’与‘文学的阶級性’”和“‘丧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中对資产阶級爪牙的揭露，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对翻筋斗的小資产阶級文学家的描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对“民族主义”走狗的勾划，以及在“論‘第三种人’”中对第三种人的分析，都是运用阶級分析方法的卓越例子。魯迅善于辨别社会現象和阶級斗爭的外观与实質，善于从假象中看出本質的东西；这种深邃銳利的洞察力，既建基于科学的認識論，同时也相应地建基于科学的方法論。

由此可見，魯迅的阶級論思想是从世界观到方法論的徹底革命的产物和标志，是深深地扎根在他的思想深处的。这就証明：思想改造是有骨有肉的，是完整的、复杂的和生动的。任何教条的拨拾和搬弄，虛伪的招牌或片断的剪貼，都与眞正的馬克思主义思想毫不相干。

魯迅的阶級論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和內容是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無产阶級及其先鋒队的正确認識。

大家知道，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魯迅的前期思想里，缺乏对劳动人民的革命力量的充分估計，特别是缺乏对無产阶級的領导作用的明确認識，因此他曾經感到彷徨，覚得自己是在作“絕望的抗战”（“兩地書”第一集）。但是，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的革命斗爭，这些偉大的事实在魯迅的思想进程中引起了革命的变化，使他看到社会發展的客观規律，并相信“惟新兴的無产者才有將来”。（“二心集：序言”）这种新的看法給魯迅以新的精神力量。自此以后，魯迅对于無产阶級的革命特性和历史作用，对于無产阶級革命的任务和目的，对于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都有充分的認識和高度的信

心。当資产阶級学者恶毒地歪曲無产阶級的面貌时，魯迅坚决地維护無产阶級的尊严，粉碎了敌人的誣蔑，庄严地宣称無产阶級是“新的社会的創造者”；（“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問”）当敌人卑鄙地制造共产党在“杀人放火”的謠言时，魯迅揭穿了它，說“这只是一种誣陷”；（“南腔北調集：辱駡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在国民党瘋狂地进行軍事圍剿，制造白色恐怖，摧殘左翼文艺，槍杀革命作家的情况下，魯迅坚定地宣布：“惟有左翼文艺現在在和無产者一同受难，將来当然也將和無产者一同起来。”（“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現狀”）总之，在最黑暗的年代里，他表达了对中国無产阶級前途的坚强信心。我們在这里看到，当魯迅謙遜地向眞理低头，勇敢地充当中国無产阶級的战斗的一員时，他对于中国革命事業有多么重要的貢献！

关于無产阶級的历史面貌問題，魯迅在跟正面敌人作斗爭的同时，也跟那些庸俗观点和流氓習气作斗爭。他反对在文学作品中把無产阶級加以流氓化的恶劣傾向，認为恐吓和辱駡决不是战斗，而只能是歪曲無产阶級的面貌和解除無产阶級的武装。他說：

> 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駡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該將上海流氓的行为，塗在他們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駡人的無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該由文艺加以糾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將来的無阶級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鬧得不可开交。
>
> 無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級，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場，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詩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現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傳聞，但这只是一种誣陷。（“南腔北調集：辱駡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这些話值得我們反复体味。在今天，当工人阶級已成为領导阶級，阶級斗爭以新的形式繼續深化的时候，警惕任何对工人阶級进行歪曲的企圖和傾向，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跟胡風反革命集团的斗爭中，我們已經看到，敌人是很喜欢用歪曲工人阶級的手段来破坏革命事業的。

魯迅的阶級論的突出表現是他的革命論。他再三指出，無产阶級革命和無产阶級專政的目的“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級”，是“为了將来的無阶級社会”。（“南腔北調集：我們不再受騙了”）这个崇高的理想在魯迅笔下成为战斗的武器。他既严厉地批評了那些摆出“知道点革命的利害”的恐吓臉孔的幼稚病者，也給敌人的誣蔑以沉重的回击，从而維护了革命理想，扩大了政治影响。

魯迅十分重視革命策略。他認为革命者必須有武器、講策略：战斗的作者不应該以漫駡代替战斗，而应該注重于論爭，“而且要‘喜笑怒駡，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南腔北調集：辱駡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就是說，对付敌人，必須拿起科学的理論武器，誰放弃了科学理論，誰就等于解除自己的武装。魯迅認为革命文学是革命斗爭中的重要武器，因此他要求“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脈搏的”。（“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他指斥了那些借革命来推銷“文学”的投机分子，同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促进左翼文艺和整个革命事業的密切結合，并培养了整整一代的革命文学工作者。他自己就是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脈搏的。

魯迅对革命的策略观点是从以下認識出發的：在頑固的敌人面前，革命者是不能沒有策略和武装的。他亲身看过許多革命先烈的血迹。慘痛的事实使他始終保持清醒的头腦。他說，“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所以，“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

何况，無产者革命是惊天动地的空前事業，它含有复杂的現实內容，它“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設”，所以需要各种麻煩的工作。（“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見”）

魯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永远值得我們效法的，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复杂性有充分的估計和清晰的分析；对于中国革命的領导权、中国革命的路綫和党的基本政策等問題都有明确的認識和深刻的理解。如所周知，統一战綫是中国革命的法宝之一，是党的一項基本政策。在抗日战爭前夕，党及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抗日爱国民族統一战綫的口号，这口号鼓舞了全国人民，發揮了無比威力，震惊了內外敌人，包括托洛斯基分子，他們企圖从各方面来歪曲和誣蔑这个口号，甚至企圖借此来挑撥魯迅和党的密切关系；因为他們知道，魯迅是党在文化战綫上的重要力量。在这时候，魯迅以他的立場的坚定性和对政策的明确性回击了敌人。他在著名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严肃地与托派划清了界限，坚定地站在党的旗帜之下。从下引的文字里可以看出，他这样做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对党的政策的正确理解：

> 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級的領导的責任，而是將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級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場，才眞是阶級的立場。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們，似乎胡塗到連这一点都不懂的。（“且介亭杂文附集：論現在我們的文学运动”）

> 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联合是無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学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
>
>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战綫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拥护的，我無条件地加入这战綫，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認为非常正确的。（“且介亭杂文末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統一战綫”）

正因如此，魯迅对中国人民革命寄以無穷的希望，对于我們党給以無限的信任和支持。他称頌中国共产党是“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現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且介亭杂文附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革命的政党”；認为“他們不是說，而是做，夢着將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將来的現在”。（“南腔北調集：听說夢”）終他的一生，尽管周圍环境多么恶劣，尽管有胡風反革命分子的挑撥破坏，尽管他所在地和革命根据地之間有多大的距离和严密的封鎖，但是，他始終景仰着中国共产党，热情地縈注于党的活动，而且和党保持密切的联系，积極影响党的号召，尽了他自己的力量。困难、危險、封鎖和破坏都改变不了他的立場。正当革命事業遭到重大困难、許多人被白色恐怖所吓坏的时候，他驕傲地說：“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且介亭杂文附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原因很簡單，因为他已經跨越了本来的阶級，成为無产阶級和劳动人民的偉大战士了。

总之，無产阶級革命和無产阶級專政是科学的阶級論的中心內容，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結論。科学阶級論的創始人馬克思本人曾經明白指出無产阶級專政問題在他的全部工作中的重要位置。① 因此，認識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必然性和無产阶級政党的領导的重要性，是科学的阶級論者的主要标志。魯迅，在他的思想發展进程中，恰恰达到了这个高峰。这就是为什么魯迅是一个偉大的阶級論者的緣故。

---

① 参看馬克思致約·魏登麥尔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452頁。

二

应該指出，鲁迅从民主主义的立場到馬克思主义阶級論的立場，这是一整个的思想發展过程，是有其一定的原因和規律的。这里虽然不可能研究鲁迅思想發展的全面規律和具体道路，但是我們有必要来說明其中一些重要的、特别具有現实意义的方面。

首先应該說一說鲁迅所处的时代环境。他自己对于客观現实給他的教育这一点是很重視的，他說他的思想变化是"由于事实的教訓"。（"二心集：序言"）

鲁迅生活在19世紀末叶和20世紀前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里。这就是說明，他的一生正处在帝国主义时代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正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覚醒时代，正处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瓦解过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这个时代無論在世界史上或中国史上都占着空前重要的地位。鲁迅經历过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以至于抗日民主运动等等一系列的巨大历史事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潮：进步的和反动的，革命的和改良的，順流的和逆流的，形形色色，各自代表一定的阶級或阶層，表現其积極的或消極的作用；而这些思潮又都在上述变革面前經受了历史考驗，获得了不同的命运。整个旧中国，不但不可避免地在这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中接受同样的历史洗礼，而且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相应地产生特殊的变化內容。

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軍閥国民党反动統治所帶来的社会灾难以及对革命力量的摧殘鎮压使鲁迅产生無比深沉的感触和憤慨，使他不但憎恶封建阶級，而且痛恨帝国主义及买办集团，从而粉碎了他的旧民主主义幻想。在"答国际文学社問"中，他表达了这种情緒。他說：

> 我在中国，看不見資本主义各国之所謂"文化"；我單知道他們和他們的奴才們，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問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彈以屠杀革命群众。（"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問"）

另一方面，更具有决定意义的現实，是十月革命和苏联建設的成功，中国共产党所領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斗爭。如果說，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統治是从消極方面使鲁迅憎恨旧的一切，那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人民革命斗爭就是从积極方面使鲁迅产生新的希望，因而也就使他毫無留恋地摈弃一切旧事物。鲁迅对苏联的热爱是众所共知的。他自己說：

> 先前，旧社会的腐敗，我是覚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該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創造者是無产阶級，但因为資本主义各国的反宣傳，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現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無阶級社会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气了。（"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問"）

应該强調，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它所領导的革命事業对于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如果說，鲁迅对党的拥护是由于他对党的綱領和政策的正确理解，那么，同样应該說，他的这种理解的根据是党的綱領政策的客观眞理性。鲁迅，作为一个偉大的思想家和战士，正是偉大的中国革命現实的历史产物。离开了这个偉大的現实，就不可能有偉大的人物。这一点，鲁迅自己也是很清楚的。他对統一战綫政策所抱的热情洋溢的态度，就充分說明党的政策的眞理性是多么深刻地感动了他的心灵。事实上，在黑暗的环境中，党像海洋中的灯塔一样在他面前屹立着，給他以無穷無尽的精神力量。

由此可見，党和人民是怎样用自己的力

量哺育自己的战士和兒子的。

但問題不仅如此。我們还应該在他自己身上找到本質的因素。

这方面，首先应該注意的是魯迅的革命实踐。可以說，魯迅的阶級論思想是在革命的現实下，从自己的实际斗爭中煅煉出来并巩固起来的。魯迅的一生充滿了战斗的紀录。在他的生活的后期，他更担負了革命的思想战綫上的重任。对于他的思想發展具有特殊意义的，也正是他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以及其他买办集团的爪牙所进行的一連串的斗爭。从这些斗爭中可以看出，他明确的把理論斗爭看做阶級斗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的論战总是以革命利益为出發点的，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思想的批判，他都注意追究其社会根源，分析其阶級本質，估計其实踐意义和实际影响，而不是把它看作抽象的孤立現象。他对于任何一种反动論調的政治危害性都十分敏感，因此能够深刻地把理論斗爭和政治斗爭結合起来，把思想論爭提到阶級斗爭的水平上。例如，他指出新月派理論的資产阶級本質，民族主义文学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質，以及"第三种人"的陰險論調和虛伪幻想等，所有这些，既是他的阶級分析的出色表現，也是他的战斗的实踐观点的具体反映。同时，正是这些斗爭大大地煅煉了并提高了他的阶級論思想，使它趋于更成熟、更銳利、更完整的地步。

魯迅的革命实踐不仅表現在他的文字方面，而且更表現在他的政治活动方面。如上所述，他把文学看成革命事業的一翼，把文学的命运和革命的命运紧紧地結合在一起。他反对"單关在玻璃窗內作文章"，（"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見"）要求作家投入斗爭中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他自己就是这样做了的。从1930年参加左联以后，他在政治上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他的政治实踐和思想实踐以惊人的力量相互推动着，不断向前發展；特别是他和党产生了直接的和間接的联系以后，他的思想就更加發展起来，并趋于成熟了。

除此以外，魯迅的自我批評的精神也是促使他的思想向前發展的重要原因。魯迅的作風是在敌人面前無比倔强，而在眞理面前却十分謙遜。他从不掩飾自己的缺点。特别是在接受馬克思主义理論的过程中，他不是沒有經过痛苦的思想斗爭的，相反地，他正是在这种斗爭中消化过来的。他自己說过，在翻譯馬克思主义文艺理論的过程中，"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減。"（"二心集：'硬譯'与'文学的阶級性'"）他十分明白，馬克思主义（他用"社会科学"一詞来代替）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眞理，是科学、文学的理論基础，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它，所以他对文艺批評家的基本要求就是"眞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論"。（"二心集：我們要批評家"）至于他自己，就在逝世前夕，他还說："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習。"（"且介亭杂文末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統一战綫"）这就是他对馬克思主义理論的态度。

在掌握科学的阶級論和整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方面，今天的知識分子，比起魯迅当时所处的环境来，具有根本不同的和無比优越的条件。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报告"中指出当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巨大成績和三条道路；这些成績之所以获得，这些道路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們有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武裝起来的党——中国共产党的領导和人民政权的存在这个根本保証。这就是說，今天的知識分子是在工人阶級領导之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而获得工人阶級思想立場的。在这情况下，回忆魯迅的战斗的一生，学習他的光輝的思想，一定能够更加激励我們前进。

必須坚持邏輯理論中的唯物主义路綫

李志才

自从周谷城同志的“形式邏輯与辯証法”一文發表后，在“新建設”上又陆續發表了几篇批評性的文章，并且还發表了賀麟与張世英二位同志的評介黑格尔在这一問題上的理論的文章。討論中所涉及的問題，是比較重要的，它們反映着我国一些邏輯工作者的值得研究的看法。作为一个邏輯学說的爱好者，我也被組織来談上几点粗浅的意見。

> 討論具体地表明了“思惟規律的理論……从亞里士多德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激烈論爭的場所。”（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版，第23頁，）

邏輯理論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爭，在这里采取着新的历史形式繼續着。

有些同志虽然对形式邏輯也表示了“肯定”的态度，認为它是有用的学說。可是却抽掉它的客观基础，把它与認識事物隔裂，不能从科学的角度来考察它；認为它只是“推論”的空洞形式，“不考虑內容”的眞伪，等等。这些观点不仅影响着对形式邏輯本身的研究，而且也影响对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相互关系的理解。

为什么能有这些不正确的看法？原因不外乎是沒有根据唯物主义的原理对形式邏輯作具体的分析，和不能以批判的态度对待邏輯历史上的反科学的歪曲与謬論。

大家知道，形式邏輯的奠基人亞里士多德，虽然他是一个动搖于唯物論与唯心論之間的哲学家，但是他的形式邏輯理論却基本上是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他把他那主要是演繹系統的邏輯，当作認識事物的方法，求得知識的工具；不把它看成空洞的思辨形式。他提出过邏輯命題与文法的語句不同，因为前者涉及到反映对象的眞伪，而文法的句子只管語言形式本身。列宁曾明确地指出过：“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客观的邏輯到处与主观的邏輯混在一起，而且又到处都可以看到客观的邏輯。”（“哲学笔記”1947年俄文版，第304頁）亞氏邏輯的演繹体系，以后又得到其門徒逍遙派等的学者們的科学补充。

形式邏輯学說，在資本主义新兴时期，又被佛蘭西斯·培根与笛卡兒等哲学家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他們强調“發現邏輯”，建立了归納的邏輯方法，使形式邏輯体系趋于較完备的形态。

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辯証唯物主义經典理論家，从科学發展的要求出發，与唯心主义作了斗爭，使邏輯学說有了新的發展。

可是，在这形式邏輯循着唯物主义道路向前發展的过程中，是遭到了封建时代与資本主义时代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魔难的。

中世紀的經院哲学，把邏輯当成科学的侍女，歪曲了亞氏邏輯的科学本質，把它当成空論的艺術，用以为証明神的教义和愚惑人民的工具。使形式邏輯那种与客观存在相一致的思惟形式，脫离它的眞实內容，并且大大地加以煩瑣化和形式化。

特别是在18世紀的康德的邏輯理論中，形式主义、唯心論的观点，达到最露骨的程度。康德公然宣称："邏輯依賴于先天的原則，从这里，一切邏輯規則得以派生并得以証明……。""在邏輯中，我們不問悟性認識什么，它能認識多少，或其認識达到多深。……問題只是：悟性如何認識其自身。"（"邏輯引論"，1885年英文版，第4頁）他認为邏輯是以研究先驗的思惟形式为任务，它是只顧形式的正确，不管其內容是否眞实的問題。而把邏輯所研究的东西看成永久不变的教規。它不是来自客观世界，因而也不是認識事物的方法，頂多也只能借助它們来"整頓"經驗的內容。

康德的这种先驗論的形式主义的邏輯理論，对于后世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不仅在現代資本主义世界里，就是在我国过去，这种影响，也还可以看到显明的痕跡。不过康德的这种露骨的形式主义邏輯理論，在現代科学面前，是不能完全發生效用的，所以現代資产阶級哲学家就只得用一些新的花样延續着它，原因就是太露骨了。甚至康德的这种形式主义曾遭到过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反对。

黑格尔曾以唯心主义辯証法坚决地批評过康德的形式主义。黑格尔批評形式主义、形而上学、形式邏輯，从而提出了他的唯心主义辯証邏輯学說。这种辯証邏輯学說，有其很大的"合理內核"，它反映着邏輯思惟所躍进的新阶段。可是由于黑格尔是个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不能科学地揭示思惟与存在的关系，因此也就不能科学地处理邏輯学說。他虽然批評了康德的邏輯形式主义，但对傳統的形式邏輯，沒能而且也不可能給与科学的解釋。在他的邏輯学說里，形式邏輯沒有能够摆脫形而上学，到处將二者混淆，甚至把形式邏輯說成是沒有什么用处，而且是沒有必要專門学習的东西。他說："通常邏輯教本（按指形式邏輯——引者）所討論的……推論形式的知識已被認作空疏的学院智慧，对于实踐的生活以及科学的研究均不复有何用处。……我們亦并不是須得先研究邏輯，然后方可作正确的推論。"（"小邏輯"，三联書店版，第364頁）他并且認为形式邏輯"仅是形式的科学，……研究概念、判断、推論的形式，而絕不涉及內容方面有沒有东西是眞的。"（同前引書，第337頁）而且它只能是"謬誤与詭辯的工具"。（列宁："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人民出版社版，第39頁）

这里，很明显的看到，黑格尔虽然反对康德的形式主义，但却不能徹底。实际上他在形式邏輯的問題上，仍然是种形式主义的观点，这不仅表現在上引的对于形式邏輯的思惟形式的看法，而且还更明显地表現在他对形式邏輯思惟規律的批評上。例如他說："'甲是甲'。否定的說法：'甲不能同时为甲与非甲'这种定律并非眞正的思想定律，……沒有意識依照同一律思想或想像，沒有人依照同一律說話，也沒有任何种存在依照同一律存在。……專倡导这种抽象定律，并热心表揚形式邏輯的經院哲学，久已在人类的健康常識和理性哲学里失掉信用了。"（"小邏輯"，第257頁）另外对矛盾律、排中律以及充足理由律，他都从同样的意义上加以否定性的批評。当然，反对經院哲学，反对形而上学、形式主义这都是好的，可是不能把形式邏輯也与这些反科学的东西不加分辨地混为一談。

形式邏輯与形而上学不同，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是沒有客观根据的，而形式邏輯則有客观存在的相对稳定的同一性为基础，我們不能說形式邏輯的同一律与客观內容根本"不相干"。因此也就不能主观主义地將同一律絕对化，像对形而上学一样地加以"揚弃"。这是一种反反映論的非科学态度。也正是因为黑格尔不能持有科学态度，所以才一方面主張"揚弃"形式邏輯，另一

方面又自相矛盾地肯定形式邏輯能使我們思想具有"坚定性和确定性"，說"一个有学养的人决不以混沌模糊的印象为滿足，他必力求把握对象，而得其确定的性質。"（黑格尔："小邏輯"，第185頁）这种自相矛盾，不是偶然的，这正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与其方法的矛盾的一种反映。

这种对形式邏輯的一些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观点，也就使得黑格尔不能正确地表述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相互关系。例如他認为："玄思邏輯（即辯証邏輯——引者）內即包含有單純的知性邏輯（即形式邏輯——引者）；而且从前者即可抽得出后者。"（同前引書，第193頁）这是一种一再被我們批判了的"統一的"或"辯証化"的邏輯观点。

这一套黑格尔的形式邏輯以及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相互关系的混乱論点，我們不能認为是正确的。賀麟与張世英二位同志在其"黑格尔关于辯証邏輯与形式邏輯的关系的理論"一文中，認为"黑格尔正确地指出了辯証邏輯与形式邏輯的关系"。并且肯定黑格尔那种主張形式邏輯只管形式的正确不涉及內容的眞实与否的"評論也是合理的"（"新建設"1956年8月号，第13、14頁）。这些肯定的提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黑格尔的邏輯学說，有其必須肯定的"合理內核"，这值得我們很好地研究，尤其在辯証邏輯問題上，黑格尔有其巨大的历史功跡。然而，我們不能把它絕对化，这一"合理內核"不能代替一切。比如他对形式邏輯的那些看法，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观点是不相同的。和黑格尔的那些錯誤观点相反，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揭示了形式邏輯的本質与作用。列宁說："邏輯的規律是客观的东西在人的主观意識中的反映。"（"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第148頁）恩格斯說："形式邏輯首先也是寻找新結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9頁）

正因为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包括黑格尔在內）不能而且也不可能作到像我們辯証唯物主义者这样对待形式邏輯問題，所以列宁才教导我們对形式邏輯进行"修正"。这一指示是完全有根据的。邏輯学說史完全証明了这一点。这絕不是什么虛無主义的空論。

我們有些同志不知不覚地、或多或少地受着旧观点的影响，这些影响是会阻碍我們全面地、具体地考虑問題。甚至不知不覚地用形式主义观点来看邏輯科学的內容。周谷城同志所發表的关于形式邏輯的見解，也說明了这一点。

二

在"形式邏輯与辯証法"一文里，周谷城同志認为："形式邏輯……对任何事物都沒有主張。"它不像辯証法那样，"辯証法要了解事物，形式邏輯則根据对事物已有的了解，依思惟形式作各种推論"，并且这种"論式的正确与否，却只須看它自身前后矛盾不矛盾就可以定。"就是說，形式邏輯是只管純思惟形式的东西，和"文法学修辞学"（"新建設"1956年2月号第58—59頁。重点为引者所加。）一类的学問一样，不干涉客观事物的关系，不管論断的眞实性，等等。

对于这些看法，已有些同志提出过反对的意見，我基本上同意（也有些地方須要研究，下面將談到），不做重复。我只就那些比較重要的，需要进一步具体明确的或沒有提到的一些問題，提出一点見解。以下側重邏輯規律与規則来談。

周谷城同志說："辯証法所依据的諸法則，自始就是屬于事物自身的。形式邏輯則不然，它的法則只是規定推論过程的，对于事物自身并沒有增加什么說明或解釋。推論

式的規則說：‘每一論式中，只能有三个判断和三个名詞，不能多也不能少’，‘每一論式中的中名詞，在兩个前提中，至少必須周延一次’，……。凡此等等，只在作推論时有用；……論式之能够正确，就靠有这些規則。但这些規則只規定推論过程的，即列宁所謂形式的規定，对于事物自身却沒有增加什么說明或解釋。虽然这些規則的依据实际上有一条公理，……似为屬于事物自身的。但仔細檢查起来，这条公理只是推論規則的依据，对于事物自身之存在、發展、变化，依然沒有什么說明或解釋。”（同上書，第60頁）

这段話里有三个內容：1、只有“对于事物自身之存在、發展、变化”加以“說明或解釋”才是反映事物；2、推論規則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3、以上这种看法就是“列宁所謂的形式的規定”。

首先我們必須明确的是，辯証唯物主义的認識論，并沒有那样狹隘的認为：只有說明“事物自身之存在、發展、变化”才算說明事物。解釋事物其他的一些联系、特性——例如質的規定性、相对稳定性等等——就不是对事物的說明。而是認为：解釋“事物自身之存在、發展、变化”也好，解釋事物的相对稳定、簡單关系或特性也好，都是对事物自身的說明。也都是对事物自身的反映。如普通物理学所揭示的物体的硬性、彈性、色采、光澤，化学所揭示的水的成分H_2O，几何学所揭示的“三內角之合等于兩个直角”等等。这些簡單的事物的特性与关系，都是对客观事物的說明。

形式邏輯科学也一样，它的理論并不揭示“事物自身之存在、發展、变化”，但是它也是关于“事物自身”的說明。例如上列推論規則“每一論式中，只能有三个判断和三个名詞，不能多也不能少”……等等。它們是依据一个直接說明“事物自身”的公理而建立的，或者說它們是具体表現公理的。这个公理就是：屬于或不屬于一类对象整体的屬性，也同样屬于或不屬于这一类对象整体中的个别对象。这个公理，就是具体地反映着客观事物所具有的一般与个别的必然联系（当然这还不是全面地反映一般与特殊、个别的辯証法，因为这是辯証邏輯的任务）。例如我們知道了人这类对象都具有能抽象思惟的屬性，那么我們就可以据此推知某一个别人也具有这种抽象思惟的屬性。所以我們在推論的形式中，就可以这样表达：

所有的人都能抽象思惟；
張同志是人，
所以，張同志能抽象思惟。

这种推論的思惟形式，就是客观事物的眞实反映，它絕对不是什么純思惟本身的东西。也沒有任何根据說这个推論据以建立的公理“似为屬于事物自身的”，这根本就是屬于事物自身的东西，就是对“事物自身”的“說明或解釋”。

推論規則要求我們表述这种反映事物的推論形式“只能有三个判断和三个名詞，不能多也不能少。”这就是为了眞实地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因为無論兩个名詞（概念）也好，四个名詞（概念）也好，都不能成为这种正确的反映客观事物的必然联系的形式，或者說不能組成这种形式。至于三个判断，那也只是三个名詞（概念）兩兩配合而已，前者已制約了后者。这条規則，也就只是要求我們在进行推論时，从形式的組成上来把握，以为准繩。其他的邏輯規則也都是一样。实質上都是說明事物的。不能因为它們是規定推論的規則，就把它与客观事物隔裂，那样只有使我們导向唯心主义的空論，以至导至思惟、認識的錯誤。那就会像周谷城同志所举出的推論例子那样認为：“凡金屬是不能溶解的，金子是金屬，故金子不能溶解。”这也是正确的推理。可是誰都会看出，这根本就是錯誤的，因为它首先就是違反公理的，事实上，“不能溶解”这种屬

性，根本就不是“金屬”这类对象所有。所以，依据这样違反公理（亦即違反客观事物自身）的前提，必然得出錯誤的結論。必然达不到对“金屬”这类对象中的个别对象——“金子”的正确認識。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形式主义的推論式。

周谷城同志說，这种形式主义的邏輯論点“即列宁所謂的形式的規定”，这起碼是个誤解。列宁所說的“形式邏輯……以最普通的、眼睛常見的东西为指导，采用形式的定义，”（“再論职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6頁。周谷城同志也曾引証了这句）这段話中的“形式”，同純思惟的与客观存在不相干的“推論形式”有本質的区别。列宁所說的“形式”，是指我們最常見的举目即触的事物存在的相对稳定形态，例如桌子是桌子这种由其質所規定着的外在相对稳定形式。这种事物的外在的形式，就是形式邏輯的客观基础，就是形式邏輯的思惟形式的反映內容。怎么能設想辯証唯物主义的經典理論家能認为推論之类的邏輯形式不是反映客观存在呢？列宁曾一再地反对过这种观点。坚持邏輯思惟的客观性，这是最起碼的辯証唯物主义原理。

由于周谷城同志忽略了这种最起碼的辯証唯物主义原理，所以不仅对邏輯規則的問題流于形式主义，就是对最明显的邏輯規律，也采取了非科学的解釋。例如周谷城同志說：“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这四条規律中，除充足理由律外，其余三者可归并为一条，即同一律是也。同一律謂凡物必同于其自身，如‘人就是人’即同一律的表現，因为‘人’与‘人’是同一的；‘人非非人’，即矛盾律的表現，因为‘人’与‘非人’是矛盾的；‘人不能同时是人又非人’，即排中律的表現，因为‘人’与‘非人’既相互矛盾了，不能同时又互相一致，矛盾律即同一律的反面，排中律实即同一律与矛盾律的結合。我們研究时，只研究同一律可也。同一律不是事物自身存在、發展、变化之法則。恩格斯有言曰：‘但是甚至在無机自然界中，同一性本身在現实中也是不存在的。每一物体不断地受到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这些作用經常在改变它，修改它的同一性。’沒有眞正的同一，便無所謂同一律了。”（“新建設”1956年2月号，第60頁）

周谷城同志在这里是先实行將三个規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归并为一”，然后再抽去这归并出来的同一律的客观基础，就像上面我們所看到的黑格尔那样，最后把它完全加以否定。可是周谷城同志也是拘于不能否認的思惟实踐的事实，所以就又像处理推論規則一样地把思惟規律單純归結为純思惟領域中的东西。

大家知道，在亞里士多德最初确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时候（有人認为亞氏只研究了矛盾律与排中律，但实际上对同一律也有所研究），就很明确地强調过这种規律是指在同一时間同一关系下的同一对象的。他在“形而上学”一著中写道：“同一屬性，不可能在同一时間中并在同一关系下，既屬于又不屬于同一个对象。”“对于同一事物，不得在同一时間中，一面設想其存在，一面又設想其不存在。”（“亞里士多德全集”英文版8卷4篇3节）这里表明了这几个思惟規律的客观根据。从辯証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完全正确的。即由于事物皆有其質的規定性，而在同一时間，同一关系下，一个对象由質所規定的屬性，是采取着相对不变的稳定形态的。处在这样狀态上的对象，它具有其本身的相对同一性，也同时具有与其他对象的区别性，这种区别不仅存在在与其同类对象之間，而且也存在于这一对象与其他所有任何对象之間。这些客观存在的事物特性，經过人类長期实踐、認識而反映到意識中来，形成形式邏輯

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这三者都有其各自的客观內容，不能互相混淆与代替，根本不能“归并为一”，也更不能取消。

周谷城同志援引恩格斯的理論来說明其“同一律不屬于事物自身”的主張，这也是出于一种誤解。恩格斯是指絕对的“抽象同一性”是不存在的，但不是說相对的同一性也不存在。所以不能將恩格斯的辯証邏輯理論与形式邏輯理論混为一談。

在这里也要指出：形式邏輯同一律的客观基础，是相对的同一性，但不能据此就說“同一律是相对的同一律”（这是沈秉元同志的提法，見“新建設”1956年第7期，55頁）。因为这种提法混淆了主观与客观的界限。作为正确反映客观存在的邏輯的同一律，固然是以客观的相对同一性为基础，并为自己的反映內容，但它畢竟还是主观的东西。由于它正确地反映着客观存在（这是由实踐不止若干次所証明了的），所以它就具有絕对眞理的品格。这是科学規律的普遍特性。如果把这种科学規律（例如形式邏輯的思惟規律）都当成相对的，那么就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論点。势必导向唯心主义。

所以說，形式邏輯，它作为一門科学，作为一門古老而又年青的科学，它是有着相对性的客观基础，有着絕对意义的理論內容的。

具有上述性質的形式邏輯它是不能与“文法学修辞学”列为一类的。在抽象性这一点上，形式邏輯固然是与文法相似，而且不仅与文法相似，还与几何学、数学相似。但也仅仅是这一点。文法是关于詞的变化及用詞造句等規則的学問，几何学、数学是关于空間关系、关于数量关系的学問。而形式邏輯則是关于思惟与思惟規律的学問，它很接近認識論，是与辯証邏輯一系列的科学。这已經是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所闡明了的。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形式邏輯本身的性質来理解，而且还可以从其与辯証邏輯的相互关系上，得到深刻的理解。

三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著中，以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关系来比喻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关系。这是一种最本質的比喻。从这个比喻出發，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体会。

首先我們应該明确的就是邏輯学“和其他的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惟的历史發展的科学”，它“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恩格斯：“自然辯証法”，第23頁）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是标志着理論思惟發展的兩个不同的时代，标志着人类認識史的兩个阶段。

在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臘的哲学家們就把理論思惟当作科学的研究对象了（如古代中国的名辯邏輯等学說）。而形式邏輯是古代希臘哲学家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为了适应当时科学振兴与發展的实际需要，而总結与概括了当时科学理論中和論辯中所应用的理論思惟的形式与規律，創立了形式邏輯的基本体系。科学历史的發展，到了近代，突破了过去对世界研究的狹隘界限，許許多多的大量科学材料要求着更高的理論思惟方法，来从对象的联系、矛盾运动、發展等內在規律进行洞察。因而相应的就有辯証邏輯这門科学的产生。辯証邏輯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得到一定的表述，然而正是因为他是个唯心主义者，他把这种反映客观事务內在的普遍規律，看成是“絕对理念”的运动。所以不能徹底地建立这种强大的科学理論武器。只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理論家，才办到了这一点，他們吸取了黑格尔的“合理內核”，适应着科学的高度發展，創立了辯証唯物主义，把辯証邏輯作为自己哲学的一个組成部分，規定了創造性地研究辯証邏輯的基本原理。这就要求着我們

更进一步地从現代人类科学的理論思惟实际中，从認識的历史中，加以总結、概括，使这一門科学体系更加完备。在这同时，还要依据辯証唯物主义清除形式邏輯中的杂質，并使二者向前不断發展。

这是从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同是关于思惟与思惟規律的兩門科学之間的历史关系来看，是这样。其次从这兩門科学理論体系本身之間的关系方面，还可以作以下这样的理解。

辯証邏輯是与唯物辯証法、馬克思主义認識論相一致的，也就是与辯証唯物主义世界观相一致的。而形式邏輯虽然也涉及認識当中的認識形式等問題，但它不是認識論，也更不是世界观，它只是一門研究邏輯思惟的初步規律与形式的科学。从兩門科学理論的关系上来看，形式邏輯是必須以辯証唯物主义为指导的。辯証唯物主义是形式邏輯的最科学的唯一理論基础。不依据辯証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沒法科学地理解形式邏輯問題的。这一点，是和任何一門（自然的或社会的）科学之和辯証唯物主义的关系一样。反过来，形式邏輯作为一門科学对于同样作为科学理論体系的辯証唯物主义、辯証邏輯，也不是完全沒有意义的。形式邏輯所提供的一些运用思惟形式——概念、判断、推理、証明——的起碼邏輯原則，辯証邏輯为了科学地論述自己的內容，也是要遵守与运用的。因为不遵守这些起碼的邏輯規則，是不能被理解的。当然这一点不等于說用形式邏輯的內容代替辯証邏輯的內容。而且这里也不影响尊敬不尊敬的問題。这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科学間的关系。

具有着上述这种相互間关系的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这兩門科学，是具有着不同內容的，它們各自以自己的特殊內容服务于我們的認識。因此，在实际的認識过程中，二者之間也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

辯証唯物主义認識論，科学地揭示了認識的本質，指出認識就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列宁說："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惟，从思惟到实踐，这是認識眞理，認識客观实在的辯証法道路。"（"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第134頁）这种認識是从比較不深刻的本質到較深刻的本質的。在这認識过程中，抽象的思惟（也就是邏輯的思惟）是我們把握对象本質的关鍵阶段。因为認識是在实踐的基础，根据感性的材料，运用理論思惟的邏輯方法，才达到接近眞理的。通过理論思惟所揭示的眞理，再經过实踐的檢証，就达到对眞理的把握。

而認識的辯証过程，与辯証的思惟活动不是完全同一的概念。我們現代水平的科学認識都应該是遵循着認識的辯証法道路的。至于那些在个别場合下的非完整的非辯証的認識活动，虽然也是屬于認識的范疇。但不能当作辯証的認識过程的典型来研究。在辯証的認識过程的理性思惟阶段，既应用辯証邏輯，又应用形式邏輯。形式邏輯保証我們思惟具有确定性，避免自相矛盾，能帮助我們循序漸进地展开辯証的思惟。任何客观对象，無論是簡單的或者是复杂的，都存在着簡單的关系与复杂的关系。形式邏輯反映簡單的关系，辯証邏輯反映复杂的关系，二者各有任务。而在那側重于簡單关系的認識上，也就側重于形式邏輯的运用；側重于复杂关系的認識上，也就側重于辯証邏輯的运用。不过前者为初級的邏輯方法；后者为高級的邏輯方法，并且"在其自身中包含着更广大的世界观的萌芽。"（恩格斯："反杜林論"，第139頁）辯証邏輯比形式邏輯对于我們具有更高的意义，它是人类最高的智慧的概括，它沒有形式邏輯那种帶有片面的局限性。

概括地說来，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相互关系，就是如此。

（下轉第20頁）

太平天国为什么不准繪人物？

罗尔綱

一 引言

革命是艰苦复杂的斗爭，包括軍事、政治、經济、思想意識等方面。思想意識形态之一的艺术，是由社会生活所产生，它反映社会現实，又反过来予社会生活和斗爭以巨大的影响。盛行于太平天国时代的壁画艺术，是写实的，是集体創作的，它却規定了不准繪人物。太平天国这一个不准繪人物的規定，并不是什么宗教的信仰，而是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巨大的反封建作用的。它是在思想战綫上經常地（不分早期、晚期）普遍地（不分中央、地方）使用的对外打击敌人对內团結的有效武器之一。

我們首先要指出：太平天国是19世紀中国农民革命，它制定有明确的綱領和政策，它利用宗教的形式，注入了它的綱領和政策的內容。不准繪人物只是披上宗教外衣的反封建斗爭的艺术表現形式，在本質上是包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的內容，为反封建斗爭而服务。但我們一方面：应了解艺术是客观現实的反映。固然它的內容和形式都反映現实，但反映并不似机械地照像，完全一模一样的。列宁說："反映可以是被反映者底近似地眞确的模写，可是說它們是等同的，这就荒謬了。"① 另一方面：应了解尽管艺术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是統一的，但并非表里完全如一的。馬克思說："如果現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質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② 那么，就使我們不能只根据狹隘經驗以主观主义去看問題，而必需在不繪人物的現象之下，不畏艰辛地向它的深处發掘，以寻找它的本質，它的內部規律性。

其次，我們要指出：太平天国这一个农民革命，它的情况是复杂的，在革命內部里面还有独树一帜思想信仰不同的广东天地会队伍；它虽然制有明确的綱領和政策，但它的政令并不是都能够完全貫徹的，即以避諱一事而論，虽然三令五申，洪秀全并且亲自教导，而在領导人物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的文書里面，还有失檢違犯的情况。如果我們不掌握这些情况，具体地进行分析这些具体的情况，而只憑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加以論断，就必然地陷到錯誤的泥坑。毛主席在"矛盾論"里指示我們："列宁說：馬克思主义的最本質的东西，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又說："研究問題，忌帶主观性、片面性和

① 列宁："唯物論与經驗批判論"，人民出版社版，第354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069頁。

表面性"①，我們在研究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这个曲折复杂的問題时，更深深地体会到这兩句名言的宝貴。

关于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这一个問題，我們要探討的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太平天国眞是不准繪人物嗎？"另一方面是"太平天国为什么不准繪人物？"在"太平天国眞是不准繪人物嗎？"这方面，是曾經呈現出一些錯綜复杂的現象的。但是，这些現象，有的是不可信的，如浙江紹兴神怪壁画；有的是有一部分已被否定，另一部分在存疑，即使确是太平天国的彩画，也只是彩画工人忘記太平天国制度失檢而繪上的，如苏州忠王府四方有人物点綴的彩画；有的是太平天国政策不貫徹的現象，如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广东天地会在安徽績溪曹氏支祠繪的攻城壁画；有的是特殊的例外，只有东王楊秀清假托天父聖旨才可以做的，如張汝南"金陵省难紀略"所記东王府前曾挂过一幅攻城胜利圖等，我們都可以追考出它所以呈現出錯綜复杂的原因的。从文献稽考起来，自太平天国前期以至后期，自天京（太平天国的首都，今南京）以至京外的壁画，凡有記載可考的，都沒有繪人物。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是一件眞确的史实。这一方面，我在"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的問題"一篇考証及其他有关的几篇考証中另作考述，②不在本文論列之內。

在本文中，是專对"太平天国为什么不准繪人物？"方面进行探討。紕繆之处，敬請讀者指教！

二　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这一件历史事实的提出

太平天国規定不准繪人物这一件历史事实被發現出来的經过是这样的：1952年2月，南京堂子街發現了太平天国壁画。③我仔細观察全部壁画，看出那些壁画最特别的地方是有許多画面非有人物不可的地方都不繪人物。例如有一壁山水画，江上正行駛着几只帆船，但船上却空無一人。帆船是要有人駕駛才能够开行的，行駛着的帆船断不可能沒有人駕駛。又有一壁繪太平天国江上防守圖，江岸上有一座作了望和指揮用的五層高的望楼，望楼下江面排着一列太平天国战船。在望楼台上、在战船上都必須有防守的太平軍，但画面上只有旗帜高揚，而却沒有一个人。这一种独特的作風，在中国画史上，是不合常規的。

我当时对堂子街壁画这一个独特的作風，認为掌握到这一点是鑒定那些壁画是否太平天国壁画的最主要的关鍵，于是就进行考証。后来稽考到一部署名滌浮道人著清咸丰六年（即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公元1856年）夏刊的記載太平天国首都情况的"金陵杂記"。在这部書里面，有几条記載到太平天国的壁画。其中有一条記載太平天国壁画的制度，說：

---

①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778頁。

② "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的問題"一文，將收在拙著"太平天国遺迹調查集"一書內。此外，請参看拙著"紹兴太平天国壁画調查記"，見"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績溪曹氏支祠太平天国壁画考証"，此文也將收在"太平天国遺迹調查集"一書內。

③ 見1953年第3期"文物参考資料"曾昭燏等"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遺址調查报告"，及拙著"关于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壁画考証"。案这兩篇文章中所述堂子街李姓一个同住妇人所說屏門繪門神的話是錯誤的。1953年秋，我們發現調查的錯誤，不应以一个同住妇人的話为据，而必須向老房主李奉先訪問清楚，因由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会派該会工作人員丁紹蘭和我同去向李奉先訪問。据李奉先說，那个同住的妇女是他的侄女，她沒有亲見到那副屏門上的画，而是把長輩的話記錯了的。那副屏門上繪的是一个猛兽，記得好像还繪有一把斧，至于是什么猛兽，因他看見时年紀还小，現在已經記不清了。他家因小孩看見猛兽害怕，所以叫木工鉋去。

贼之画亦有伪制，如洪逆之門画双鳳，謂之鳳門，楊、韋之門画龙、虎，伪丞相門画象，以下画獅、豹、鹿、兎，牆壁画魚、雁、鵝、鴨等类，不准繪人物。

滌浮道人屬于地主阶級，对太平天国肆意詆毁，但他久居天京，所記太平天国壁画及其制度都是从亲見得来。他对太平天国壁画特别指出"不准繪人物"这一个規定，他明白地指出，不准繪人物是太平天国壁画的一种制度。因此我就根据滌浮道人这一条記載，作为最主要的一条証据，結合到太平天国望楼的規制以及屋主的口碑，来証实堂子街發現的壁画确是太平天国的壁画。而由于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的鑒定后，就提出了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这一件历史事实。

从1952年南京堂子街發現太平天国的山水花鳥壁画以后，1954年南京如意里又發現太平天国花鳥壁画，①1955年南京罗廊巷再發現太平天国花鳥壁画。这几处發現的太平天国壁画，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它們說明了那一个当时在天京亲見太平天国壁画的滌浮道人所記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的一个最主要的內容。因而这些例証，就給我們提供了說明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的根据。

所以，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这一件事，我們不是根据偶然的例子或主观臆断得出来的"推論"或"假設"，而是根据典型的实物和有力的文献提出来的一件历史事实。

三　太平天国利用"旧約"不准繪人物的宗教信仰只是現象形态而不是事物本質

現在，我們来探討"太平天国为什么不准繪人物？"的問題。②

关于这一个問題，在洪秀全的文書里是可以找得到一些答复的。洪秀全批英国教士艾約瑟（Edkins）"上帝有形为喻無形为实論"③說："上帝最惱是偶像，爷像不准世人望。"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十七日下的詔書④里又說："自古人無見上帝，虑人作像陷沉淪。神父惟神子能識，哥朕識父有耳聞。"据洪秀全說上帝最恨的是偶像，所以上帝要人毁灭偶像，上帝也不准人做他的像。所謂"作像"，是包括泥塑、木雕、石刻和繪画的像都在內，因为同样都有偶像的意味。

洪秀全这一种說法，是据自"旧約"而来的。"旧約"有許多条严禁拜偶像、制作形像的記載，說上帝要人只崇拜他，不得崇拜别神，所以教人拆毁神像，打碎柱像，不准人作神像、立偶像、或是柱像和石像，也不准人为自己雕刻偶像，或作什么形像⑤。十誡中所謂"也不可作什么形像"，就是把一切泥塑、木雕、石刻和繪画的形像都包括在內。这就是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包括神怪和封建的旧內容的人物，以及一切人物都在內的根据。

在"旧約"里面，还記有上帝对人物壁画的憎恨的記載。如在"以西結書"第8章記上帝帶以西結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內院去，看見許多可憎的恶事，其中的一件就是壁画

---

① 見"历史研究"1956年第5期拙著"南京如意里太平天国壁画考証"。

② 这一个問題，我們大家鑽研了好几年。我們的意見曾經一改再改。我在这里写的意見，以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会副主任委員丁云青先生提示最多，謹志感謝。

③、④ 原件藏英国不列顛博物院。

⑤ 如"出埃及記"第20章第3节至第5节、第23节，第23章第24、25节，"利未記"第26章第1、2节，"申命記"第4章第23、24节。

人像。又如同書第23章以兩个行为淫蕩的姊妹阿荷拉、阿荷利巴比喻撒瑪利亞和耶路撒冷的崇拜邪神，背弃上帝。記述阿荷利巴的惡行，即耶路撒冷的“崇邪背主”，就是由于看見壁画人像。在“旧約”中，上帝是这样地痛恨壁画人像的。这也就是太平天国壁画不准繪人物的根据。

根据考証，我們必須指出：“旧約”不但不准制作神像和人像，也不准制作“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的形像；① “旧約”不但反对壁画人像，也同样反对壁画“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② 但是，承襲其主旨的基督教，到了在其他国家广泛傳播后，并沒有遵守“旧約”的禁条。③ 而太平天国却根据“旧約”規定不准繪人物，然而却大繪飞禽走兽，也沒有完全遵守“旧約”的禁条。这就可見太平天国虽然抬出了“旧約”的上帝，但它只利用了这一个上帝对它有利的方面，而对它的革命斗爭沒有好处的方面却毫不理会。这就說明了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并不是为了什么宗教的信仰。这一点，是研究这一个問題具有关鍵性的地方，我們必須首先掌握住。

因此，我們論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的問題，就不能只到考出它是从“旧約”而来为止，假如我們就此作出結論，說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是“为了專崇上帝”。这只是从現象看問題，而沒有从本質看問題，这只是皮毛之論，而結果就必然陷于錯誤。所以我們必須从深处的本質去探討它为什么利用“旧約”不准繪人物的意义与目的所在，然后才可能作出眞实的結論。

四　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目的之一是对外打击敌人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农民革命战爭。农民革命特点之一是利用宗教作为發动群众进行反封建的斗爭的工具。这是中国的和外国的农民战爭所共同的一般性。但太平天国在它不同的时代和情况之下，却还有它的特殊性。它的拜上帝会既迴异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的五斗米教、太平教、白蓮教等，也不完全相同于原始基督教。因为农民革命所利用的宗教以及和它相适应的宗教仪式，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發生發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和斗爭的需要而有所变化的。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把上帝教作为动員、組織群众的思想武器，虽然也崇奉上帝、基督，但已經不是西方的原始基督教的面目，而是适应于当时中国革命环境的别树一帜的拜上帝会。它造出了天父（上帝）、天兄（基督）之說，因而就抬出了天王、天国。天国是天上地下一体的，不是單指天上天国的。地上天国的天王是洪秀全，是太陽，“上帝是炎，太陽亦是炎，故上帝并太陽俱来也。”④ 这样就产生了天王与上帝二位一体的理論。它的总目的，是为的要“創开天国”，⑤ “永定乾坤”。⑥ 所以对敌“天要誅他一鍋煮”，⑦ 对群众“朕是禾王”，⑧ “認禾救饑就太

---

① 見“出埃及記”第20章第3—5节。

② 見“以西結書”第8章第7—12节。

③ 关于基督教不守“旧約”禁条繪人物事，考証詳見拙著“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的問題”一文內。案哈唎“太平天国革命史”第24章載“支那之友”記者在苏州忠王李秀成書記住宅游覽，所見天父堂壁間掛的基督自彼拉多裁判至十字架就刑种种圖画，就是当时西洋人傳到苏州来的基督教故事画。

④ 見太平天国刊行的“欽定前遺詔聖書”“馬太傳福音書”第4章洪秀全眉批。这些眉批，夏鼐先生曾把其中一部分摘录，見三联書店出版的拙著“太平天国史料考釋集”一書內“讀夏鼐‘新旧遺詔聖書校勘記’后記”。

⑤ 見“馬太傳福音書”第5章洪秀全眉批。

⑥ 天王玉璽上刻的話。

⑦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天王詔旨。

⑧ 洪秀全在“聖人約翰天啓之傳”第14章眉批，見蕭一山“太平天国叢書”第一集“旧新遺詔聖書跋”。

平”。① 总之，它是在对敌的复杂艰苦斗争中的思想武器和組織形式之一。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意圖之下，随而貫徹于繪画上的也必然有其特殊之点。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就是披上宗教外衣的反封建斗爭的艺术表現形式，它并不是什么宗教信仰，而是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在內。它服务于反封建斗爭的总任务，也的确發生了政治作用。

在对敌人方面，封建統治阶級对于农民大众实行着严重的政治經济压迫，而且还从思想上給被压迫群众以重重束縛。中国古代的封建統治者制造了許多菩薩、神仙、閻罗王、孔聖、关帝，以及無数牛鬼蛇神，来欺騙和麻醉农民，替他們捍衛剝削制度。太平天国革命，在秘密活动的时期，就以上帝去反对閻罗妖，以“無所不在”② 而“金顏体神不得見”③ 的上帝去反对一切木雕、泥塑、繪画的偶像，从而引伸出“眞主”洪秀全来反对“滿妖咸丰”。④ 到起义后，就頒布三道著名的“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諭”，号召人民“速拜上帝”，“拜眞神，丢邪神，复人类，脫妖类”，“各各起义”，“同心同力以灭妖”；又宣告天下，“天既生眞主以御民，自必扶天王以开国，縱妖魔百万，詭計千端，焉能同天打斗乎！”以坚必胜的信心。太平天国这样地以上帝作为武器来向封建統治进行斗爭。而封建統治者也抬出它所制造的神来向太平天国对抗，例如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由朱錫琨、黃益芸率領从天京出發的一支北伐軍后繼部队經过江苏六合县，宿营城外南关，把彤华宫各神像搗毁，削了火神的鼻子。这一夜，营中失火，頃刻十多处火藥轟裂，烟焰亘天，太平軍被燒，死亡狼借，余众敗归。清反动統治就說是火神显灵，咸丰皇帝就亲写了“威灵显曜”四个字頒为庙額，重新神像，大肆宣傳，⑤ 一直进攻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来。⑥ 又如这一年五月，北伐軍在大將林鳳祥、李开芳領导下，以凌厉無前的声威，打到河南的时候，經过河南省城开封并沒有攻城，即向西进軍。而清統治者却捏造說是关帝显灵，高立城头，手执大刀，指揮兵將，飞下城来，把太平軍惊走。⑦ 于是咸丰皇帝就下詔說“仰賴神威助佑，轉危为安”，⑧ 向各地进行宣傳。这就可見当时革命与反革命进行阶級斗爭中，双方利用宗教在思想意識上进行搏斗的激烈。所以太平天国革命，到处都雷厉風行地把一切偶像搗毁，不仅仅把佛寺、道观、城隍、社壇的神像打倒，連孔子、关羽的像，大門繪的門神等等都在扫除之列。而且，据我們在1953年6月到苏州調查过許多所百年前的老屋，在那些太平天国軍队駐过的老屋里面，凡建有庫門楼，其上有磚雕人物的，那些人头多被敲断。口碑傳說下来，都說是：“長毛敲去的”。就連那些含有偶像意味的普通房屋建筑上雕刻的人物也多搗毁，严厉地去扫除偶像。太平天国这一种毁灭偶像的行动，有着鮮明的政治目的，就是为的要卸下敌人对抗的武器。我們知道，太平天国規定“敬上帝者不得拜別神”，⑨ 形式上是宗教信仰問題，实質上是在政治上划分敌我界限的标帜問題。但农民在思想上受了多年神权的束縛，深入腦海，并

---

①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幼主詔旨。

② “天父下凡詔書”述上帝权能的話。

③ 洪秀全改艾約瑟撰“上帝有形为喻無形为实論”文題。

④ 太平天国以东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名义頒布的“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中語。

⑤ 据周長森“六合紀事”卷1“防剿始末”，及卷4“見聞杂志”。

⑥ 据当时在天京的陈作霖“可园备忘录”記道：“四月十三日，見賊多帶伤入城者，蓋自六合敗归，相傳为神火所燒也。”可知当时清統治者这一个宣傳，一直傳入到天京去。

⑦ 据陈善鈞“癸丑中州罹兵紀略”。

⑧ 据清咸丰三年六月辛卯咸丰諭，見“咸丰东华录”卷24。

⑨ “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的話。

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滌除淨尽的。而中国壁画的傳統，自汉、魏以后，就以佛道人物画为主要的內容，配合着木雕泥塑的偶像来进行欺騙和麻醉农民，为封建統治服务。太平天国提倡壁画，如果对这一种傳統的內容不猛烈地徹底地予以禁止，就会使群众在思想意識上再受到妖魔神怪的侵襲，就很难坚定他們对上帝和天王的信仰。除旧布新，不破不立，是必然的規律。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首先从神怪人物說，是卸下了敌人对抗的武器，是徹底地清除了封建統治阶級束縛农民的神权思想，是使群众在政治上更明确地划分了敌我的界限，無疑地在当时的阶級斗爭中是起着巨大的作用的。

五　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目的之二是对內部的团結

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不仅是不准繪神怪和封建的人物，而是包括它所崇奉的上帝和自己的革命英雄事迹以及劳动人民都在內。不准繪神怪和封建的人物，是对敌斗爭的措施；而除神怪和封建的人物之外，一切人物都不准繪，却是对团結內部的一項重要的措施。

关于这一方面，首先必須从太平天国宗教的本質去理解。我們在上面說过，太平天国所創制的上帝教，实質上是太平天国这一个农民革命的武器。洪秀全曾經明白說过，他所說的天国，乃总天上地下而言，①可見他所崇敬的上帝，实在就是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集中的体現。凡与太平天国宗教的上帝的权力牴触的，也就是与太平天国的革命政权牴触。在它的宗教思想意識里面，所有一切偶像，包括画像在內，都含有"崇拜"的意义。"旧約"分明說出上帝不准人刻偶像，不准人作任何的形像，就是預防人們崇拜了别的神而不事奉他，夺了他的至高無上的权力。至于上帝自己却是"無形"的，是"無所不在"的。据基督教的說法，"物之有形者必受統于無形"，"無形尊而有形卑"，"有形之物，耳得而聞其声，目得而睹其狀，口鼻得而知其气味；無形者則超于耳目口鼻之外。有形者不能無所不在，不能同时而在各处；上帝則無所不在。"②正因为上帝是"無形"的，所以上帝才是"無所不在"，才把至高無上的权力都集中到他的手中。这一点宗教上的意义，是跟太平天国革命斗爭有着血肉不可分离的現实联系的。因为这一个宗教既然認为一切形像都有"崇拜"的意义，那么，假如繪上了革命英雄，就必然会引起"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牴触了上帝至高無上的权力，也就牴触了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集中統一。同时，这一个宗教又認为上帝"無形"，才"無所不在"，故不繪上帝的形像，也不繪奉天救世的真主洪秀全的形像，这样才把至高無上的权力都集中到上帝之手，也就是集中到洪秀全之手。所以，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在对內部来說，表面上是为了尊崇它的独一真神上帝，而实質上却实实在在是为了巩固它的革命政权，以防止个人崇拜，防止發展个人英雄主义，以求集中統一。

太平天国革命，对內部集中統一的問題，在秘密活动的时期就已經重視到的。当时就提出了"太平天日"这一个革命的目标，"太平"是中国几千年来人民渴望的理想世界，"天"是"無所不在"的天父上帝，"日"是"照得普天下"③的"天王洪日"，"太平天日普照万方万郭（国）"④，

---

① 見洪秀全在"馬太傳福音書"第5章上的眉批。

② 英国文士艾約瑟撰"上帝有形为喻無形为无論"一文中的話。艾約瑟把这篇論文送給洪秀全。洪秀全把他的題目改为"上帝金類体神不得見論"，还批改了很多，但完全同意此处所引的几句話。

③ "天父下凡詔書"中述洪秀全权能的話。

④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詔中的話。

世界就会得到太平。这一种天日二位一体的說法，在金田起义前对內部的集中統一确实起了大作用，所以"每村每处"，都知道他們的領袖"洪先生"，"到处人人恭敬"。① 但不幸就在那一个时期，發生馮云山被逮捕的事，洪秀全回广州营救，桂平平隘山拜上帝会群众动搖，楊秀清假造天父降托，蕭朝貴假造天兄降托，穩定了群众。到馮云山出獄后，洪秀全回到平隘山，虽然看見楊秀清、蕭朝貴假托天父、天兄的降托將不免造成分取他的領导权的結果，但因革命正在艰苦醞釀时期，既然天父、天兄的降托，对穩定群众起了大作用，所以洪秀全就不得不承認这一个既成事实。此后楊秀清就握代天父傳言之权，蕭朝貴就握代天兄傳言之权。蕭朝貴在長沙战死后，太平天国不再有天兄降托的事。但楊秀清却在宗教上、政治上、軍事上一步步地侵越洪秀全的領导权，甚至在教义上也加上楊秀清与洪秀全同是"天国良民之主"② 的說法，無限制地發展他个人的权威，一直發展到爆發了內訌大变。③ 洪秀全是从开始就看出了这种情况的，但当时政治軍事大权都握在楊秀清手，他只好在还掌握在他手里的典章制度的創制方面运用对策，因此，在避諱制度等里面就貫徹了他的集中統一的政策，而不准繪人物正是这些政策里面的一項重要的措施。

从楊秀清逼洪秀全封万岁而爆發的內訌大变，是太平天国史上第一件極慘痛的大事件。在楊秀清死后，洪秀全就收回了他代上帝傳言之权，从此以后，太平天国軍事的、政治的、宗教的大权都回到洪秀全之手。洪秀全对集中統一政策的措施，更加重視，更加时刻都不放松。如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十七日洪秀全有过一道詔書就說：

> 归荣天父方眞义，归荣始人焉得义？归荣上主方眞义，归荣已（己）長焉得义？归荣上帝方得义，归荣已（己）侯焉得义？归荣天兄方眞义，归荣同僚焉得义？归荣天国方眞义，归荣已（己）邦焉得义？

这就是說一切权力光荣都要归于上帝、天兄（耶穌）、太平天国才是对的，把权力光荣归于人、归于自己的長官（己長、己侯）、自己的同僚、自己的国家（对外国人說）都是不对的。所謂"上帝""天兄"只不过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宗教幌子，而实在是說要把全世界一切权力光荣都归于太平天国，說得更实在些是要把全世界一切权力光荣都归于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掌握中。"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对洪秀全这一种政策說得更是詳細，他說：

> 去年天王改政，要令內外大小軍营將相，民間亦然，凡出示以及印文內，俱要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不遵者五馬分尸。軍称天軍，民称天民，国称天国，营称天营，兵称御林兵，那时人人遵称。……天王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計，天上有此事瞞及世人。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話責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駁，任其称也。那天朝、天軍、天民、天官、天將、天兵、御林兵等皆算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称为我队之兵，称为我队我兵者，責曰"尔有奸心！"恐人之占其国，此是言也。

我們从李秀成的記載中，可以看見太平天国在政治上对革命內部施行集中統一政策的严厉。所以太平天国为了繪像含有偶像崇拜的意义，以防止个人崇拜，防止發展个人英雄主义，防止分散主义，以求革命政权的集中統一，就連革命人物和劳动人民都不准繪。太平天国这一条不准繪人物的禁令，在它对內部說来，正是它的集中統一的政策的一种

---

① "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記天王起义前事的話。
② 見洪秀全在"聖人約翰天啓之傳"第14章眉批。
③ 关于楊秀清企圖夺取洪秀全权位事，請参看拙著"太平天国領导集团內訌考"一文的考証，此文收在三联書店出版的"太平天国史事考"一書內。

措施。我們从洪秀全的政策和他的詔旨上都可以得到明确的理解的。

由此也可知，今天沒有一幅太平天国領导人物的写眞的画像留傳下来，連記載上也沒有說到太平天国領导人物有画像的事的緣由。当时外国著作有几幅革命人物的画像，如法国人卡勒与伊凡合著的"中国叛党起源志"(Callery and Ivan: L' Insurrection en Chine depuisson Opigine jusqu' a la Prise de Nankin)上的"天德像"，过去有人誤認为洪秀全像，其实是当时天地会起义軍的一張宣傳画。又如英国人哈唎(A·F·Lindley)著的"太平天国"(Tai—Ping Tien—Kwoh)有兩幅忠王李秀成画像，案哈唎曾在李秀成部下任职，这兩幅画像是他后来憑記忆繪成的，所以把李秀成繪得好像西洋人，而并不是当面的写眞。哈唎書中又有几幅忠王軍事会議圖、忠王府內礼拜圖等，也都是后来憑記忆繪成的，其中有些也許說不定是哈唎憑想像来繪的，所以也都把那些人物繪成西洋人的样子。哈唎書的封面上还有一幅圖，左边有一个侍衞拿着天父、天兄、太平天国的大旗，中間站着一个穿帝王衣冠的人物，那人哈唎是要作为天王洪秀全的，其实完全是哈唎憑空捏繪的，洪秀全是一个"身材高大，面部橢圓"的人，①哈唎却捏繪成为一个瘦削的矮个子。这些画像，都不是当面写眞的太平天国人物画像。

在这里，我們必須指出：太平天国的防止个人崇拜，和我們今天的防止个人崇拜有本質的不同。我們今天反对个人崇拜，是因为它"縮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降低了党的集体領导的作用"；②而太平天国的防止个人崇拜，表面上說是把光荣归于上帝、归于天国，而实际却是归于天王洪秀全个人。这种不同，正如农民民主主义，和我們今天工人阶級領导的人民民主主义的不同一样。因为太平天国固然是有了某一种限度的民主，洪秀全并沒有說："朕即国家"，他也叫人民把光荣归于上帝，归于天国，而沒有叫人民把光荣归于他个人，这是与封建王朝的皇帝不同的地方；但是，在洪秀全的一切措施中看起来，它的終極目的却是要把一切权力都归到他个人之手，与今天工人阶級的集体領导不同。我們知道："太平天国也像其他国家的农民运动那样，在国家組織中把君主政体和农民民主主义独特地結合在一起"。③太平天国在国家組織中是这样，太平天国的一切政策措施也是这样，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对內部方面这一項措施，恰恰是它这一个农民革命的本質在政策上的一項反映。

六　結束語

总起来說，太平天国不准繪人物，在对敌人来說，是反对維护封建社会的神权，挖掉欺騙麻醉人民的根子，有着强烈的反封建的政治目的与收到政治的效果。在对內部来說，是防止个人崇拜，防止發展个人英雄主义，防止分散主义，目的是要集中統一。所以我們对太平天国为什么不准繪人物这一个問題，初步的結論就是："它是为了革命的斗爭。它并不是什么宗教的信仰，而是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巨大的反封建作用的。它是在思想战綫上經常地（不分早期、晚期）普遍地（不分中央、地方）使用的对外打击敌人、对內团結的有效武器之一。"

---

① 据洪仁玕述韓山文(Theodore Hamlurg)著的"洪秀全之异夢及广西乱事之始原"(The Vission of Hung—Siu—ts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第4章。

② 見"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会总結报告的决議"。

③ 見苏联科学院經济研究所編"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第60頁。

顧愷之的艺术和他的"傳神"美学

馬 采

顧愷之是我国繪画艺术史上今天还流傳着他的画迹，可以由此去領略他的艺术風格和艺术特点的第一个杰出的画家。他的眞正的生平經历，傳記里記得很簡略，我們現在只能从其中一些材料，初步考定他約生在东晋康帝建元二年至安帝义熙元年(公元344—405)。他是一个少年成名的天才艺术家。还在他20岁时（可能还未到20岁）①，就已在当时有名的瓦棺寺繪制維摩詰象，受到了观众热烈的贊賞②。傳記里还保存下关于他的許多为人所乐道的傳說和事迹，显示了他在生活实踐上一种天眞、純摯、富有風趣的个人性格和明朗、乐观、充滿着眞性情的流露的生活态度。这在当时被一般人称为"癡"。在关于他的傳說和事迹中，还有一部分是形容他的聪明的。因此，当时有人說他身上"癡黠各半"。

顧愷之不但在繪画艺术上表現了卓絕的才能，而且是一个擅長語言文字的詩人。鍾嶸曾經在他所著"詩品"里，把他列入中品，称贊他"气調警拔""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他对于自己所作"箏賦"③，也曾表示自負不凡，認为可与嵇康的"琴賦"比美④。在"艺文类聚""北堂書鈔""初学記"等書中，还保存着不少他的秀丽雋美的殘章断句。他那傳誦一时的歌頌会稽山水之美的"千岩竞秀，万壑爭流"和贊美王衍画象的"岩岩清峙，壁立千仞"的句子，可說同工异曲，現在念了起来，还是有声有色，耐人寻味。因此，他被当时的人称为三絕，才絕、画絕、癡絕。

顧愷之的偉大貢献，首先在于他在繪画艺术上的卓越成就。他繼承和發展了我国古代現实主义的优良傳統，成为第四世紀最杰出的画家。他的遺迹已成为偉大祖国民族艺术宝庫里最宝貴的艺术遺产，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他不但在我国美术史上占着光輝的地位，而且在世界美术史上發放着永远的光芒。近代欧美資产阶級美术史家，出于好奇的願望，把他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最大艺术家，被称为欧洲繪画之父的乔托（1266—1336）相比拟⑤。乔托生在顧愷之后將近十个世紀。現在把他的代表作品"逃亡埃及""哀悼基督"和顧愷之遺迹"洛神賦圖""女史箴圖"相較，誰都容易看出前者具有缺乏生气的硬直性的弱点，而对于后者創造生命的天才毅力感到意外的惊奇吧。顧

---

① 在有关顧愷之历史的記載中，直接記明年代的，只有"历代名画記"中引用"京师寺記"一段，說明顧愷之于"兴宁中"（公元363—365）在瓦棺寺画維摩詰象，和"晉書"所記"义熙初"（义熙元年＝405年）为散騎常侍，……年六十二卒于官。据"建康实录"，僧慧力造瓦棺寺在兴宁二年（364），顧愷之在該寺画維摩詰象亦必在同一年。这里說他生在344年，是在假定他二十岁时画維摩詰象的前提下推算出来的。这时候他至多二十岁，因为如果这时他超过二十岁，便来不及到义熙初为散騎常侍年六十二卒于官了。如果未到二十岁，則他的生卒年可能拉后一二年。

② "历代名画記"顧愷之条。

③ "艺文类聚"44，"初学記"16。

④ "世說新語：文学篇"。

⑤ 波西尔："中国美术"。

愷之的光輝成就，在当时就已得到很高的評价。謝安就惊嘆他的艺术是"有蒼生来所無"①。我国古代艺术在表現方面，到了顧愷之，才眞正摆脫了古拙呆滯的作風，变成周瞻完美生动活潑。他最早提出了描写人物的內心表情、精神特征的高度写实的要求。那聳动一时，后来又受到偉大詩人杜甫的热情歌頌，永傳为艺苑美談的，"虎头金粟影"②——兴宁年間他在瓦棺寺繪制的維摩詰象，据說就很能表达維摩詰"清羸示病"的容貌和病中和人談話时的"隐隐忘言"的特殊神态③。为了創作当时的生活圖画，他描写了同时代許多生动形象。他很注意人物的特点和性格。在画裴楷的肖象的时候，他能够簡單地借助細节的点綴，頰上加上三毛，表現对象神情的生动性，使观者覺得"神明殊胜"。他又曾故意把謝鯤画在岩石中間，表示他善于利用背景突出地襯托出人物的特殊性格④。还有許多事例，都显示了他的写实态度的坚决。他最得意的工夫是点睛。他曾为人画扇作稔阮都不点眼睛，人問其故，他答道："那可点睛，点睛便語。"⑤他常說："傳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又說："手揮五弦易，目送归鴻难。"認为点睛是人物画最重要的环节⑥。因为他有了这一套本領，所以能够在繪制瓦棺寺的維摩詰象临到最后完工阶段將欲点眸子时，發揮了惊人强烈的艺术力量，收到了"光彩耀目数日""光照一寺施者嗔咽"的巨大效果。⑦

顧愷之的艺术作品，据"貞观公私画史""历代名画記""宣和画譜"記录，包括人物、动植物、風景等一切題材。人物多是他同时代的人，特别是那些富有才华，以他們激越的言論和行动要求个性解放，对汉代以来腐朽的虛伪的礼教表示反抗的"名士"們。在唐宋时代，还保存着不少他的杰作，到了元代以后，便逐漸减少了。清初卞永誉所著"式古堂書画彙考"登記了五幅。（女史箴横卷、黃初平牧牛圖、淨名天女圖、清夜游西园圖、洛神圖卷。）現在保存下来，可以当作他的代表作品看的，是"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

"洛神賦圖"是以魏詩人曹子建用神話来隐托他的失恋的感伤的詩篇"洛神賦"为主題的。它反映了当时曹氏家庭的尖銳矛盾，也反映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在礼教束縛下所受精神上的悲痛和苦悶。这一圖卷在宋代有过許多摹本，現在分藏故宫博物院、东北博物館、美国佛里尔美术館等处。故宫博物院本是乾隆所定第一卷，东北博物館本是第二卷。第一卷作風比較拘謹，可能比較接近原画。第二卷比較奔放，并分段題录"洛神賦"原文。佛里尔美术館本前段已失，卷后有董其昌題字，断为顧愷之画。清末李葆恂也認为是顧画，并許为海內第一名跡，所著"無益有益齋讀画詩"及"海王村所見書画录"都曾著录。日人瀧精一考証为宋人摹本⑧。細看卷中船窗上有一小幅潑墨山水，画意已是宋人，其为宋摹，殆無疑义。这一圖卷在清朝初年为梁清标所藏，李葆恂著录时归了端方，最后由福开森經手被盗卖到美国去了。

"洛神賦圖"圖名最初見"貞观公私画史"，作者晋明帝。顧笔"洛神賦圖"首見宋末湯垕"画鑒"。明茅維"南陽名画表"汪珂玉"珊瑚網"亦有著录。構想奇古，如宓妃駕云車場面，与武氏祠画象石神話題材極为相近。龙和人头兽身人物以及諸神活动的情况亦相近似。其他山陵树木、長妍人体

---

① "世說新語：巧艺篇"。

② 詩人杜甫送許八归江宁詩中有"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之句。按維摩詰号金粟如来，虎头者長康小字也。

③ "历代名画記"論画工用墨写。

④ 俱見"世說新語：巧艺篇"。

⑤ "玉函山房輯佚書"俗說。

⑥ 俱見"世說新語：巧艺篇"。

⑦ "历代名画記"顧愷之条。

⑧ 瀧节庵："顧愷之的洛神賦圖"，見"国华"第253号。

以及衣冠等等，与龙門雕刻几乎完全相同。由此可以想像原画是繼承汉式的六朝作品。

顧愷之在这本画卷巧妙地創造性地把詩人詩的幻想，在造型艺术上面加以具象化了。画卷从曹子建初見洛神宓妃起，以一系列鮮明的形象，开展了一幅極尽哀怨纏綿的連环圖画。画幅的中心形象显得特别鮮明突出。卷首描写曹子建和他的侍从們于"日旣西傾，車殆馬煩"，秣駕衞皐，秣駟芝田，容与陽林，流眄洛川，遙遙望見那出現在平靜的水面上的，寄寓着他的苦恋的瓌姿艳逸的女神的情境。画家以極其生动簡煉的笔致，把女神刻划得含情默默，回眸顧眄，仿佛飄飄，欲来又去，表現出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無限情意，深刻地体現了賦中所說"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辞未吐，气若幽蘭，华容婀娜，令我忘餐"的全部意境。馮夷鳴鼓，女媧清歌，以及其他諸神嬉游之狀，也描写得非常細致生动，眞正达到了"笔姿灵活，神彩动搖"的境界。到了宓妃駕云車，六龙齐首，鯨鯢夾够，左右异魚翼輔进衞，旌旆飞揚，交織成全画卷的交响乐的頂峰，構想奇逸，笔意紧勁，充分表現出一种不可思議的活躍气氛。卷末描写曹子建坐在洛水岸上，目痴口呆，茫然若失，天已破曉，座前还放着兩支点着火的殘燭，他那副懊丧的面孔，表示"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一夜未曾合眼，意中人来已無望。最后坐上"归乎东路"的四馬蓋車，还是一路回头悵望，表現出"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的留恋神态。整本画卷自始至終紧紧地吸引着讀者，使讀者的感情在欣賞过程中，不由自主地随着画面的进展而欢欣而悵惘。通过这一画卷，我們可以充分地看出作者是如何善于心理描写和內心世界的揭露了。

"女史箴圖"是我国現存一幅最古画卷，原为清朝內府旧藏，1900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軍攻入北京时，被英帝国主义者刼走（一說是清朝反动政府为了巴結英帝国主义者，于英皇举行加冕时贈送給英皇的。），現藏倫敦英国博物館中。画張华所作"女史箴"，絹地横卷，長11.4呎，幅9¾吋，分9圖，詞書与圖画相間。張华的文章全部336字，这里詞書缺最初部分114字。照今藏故宮博物院白描本看来，可能原有11幅，前二幅（一画樊姬諫楚庄王狩獵故事，一画衞姬諫齐桓公听郑衞之声故事）因为破損过甚被人截去。現存"从班婕有辞割欢同輦"起至最后"女史司箴敢告庶姬"止，总共詞書8段，圖画9幅。卷首題簽"顧愷之画女史箴并書眞迹"，为乾隆所書。开卷首見乾隆大璽，以下历代諸家鑒藏印章，不下百数十顆。其中占最多数的，是項墨林和乾隆。乾隆的印几占一半。最重要的是宋祁，宣和和卷末中唐弘文館印顆，足以証明时代的久远。后有乾隆題字："長夏几余，偶閱顧愷之女史箴圖，因写幽蘭一枝，取其窈窕相同之意云尔。来青軒御識。"題字下面附乾隆画蘭小幅。最后項墨林題識："宋秘府所藏，晋顧愷之小楷書女史箴圖，神品眞迹，明墨林山人項汴家藏珍秘。"

关于"女史箴圖"的評論，首見米芾的"画史"，云："顧愷之女史箴横卷，在刘有方家，笔彩生动，毫髮秀潤。""宣和画譜"已見該圖著录，以后历代記載都認为是顧愷之笔。董其昌也認为画是顧愷之眞迹，字是王献之題的①。只有陈繼儒提出不同意見，認为是"宋初笔，乃高宗書，非愷之也。②"胡敬又折衷了米、陈二人意見，以为"是卷古茂奇辟，即非出自顧手，当屬唐人摹本"③。陈繼儒之說当然是不值一駁的。女史箴圖是由于有了女史箴題詞而得名的。旣然早在赵構（高宗）以前北宋时代，米芾已称它女史箴圖了，为什么还說字是赵

① 董其昌："画禪室随筆"。
② 陈繼儒："妮古录"。
③ 胡敬："西清札記"。

構題的呢？而且从画的成立过程看，画既已在宋初画出来了，为什么还要等到百数十年后讓赵構題字呢？分明是不通的。

关于“女史箴圖”繪制年代的这种論爭，亦反映在外国顧愷之研究家的著作中。关于这一圖卷的外人論著，最早是英人斌央在1904年“布林頓”什志一月号中發表的文章，根据古来名人的鈐記証言及收藏此画的历代帝王印章，断定为顧愷之眞迹。随后，日本东京大学瀧精一教授鑒定为宋人摹本。①京都大学內藤湖南教授却把它提前到六朝后期。②东北大学福井利吉郎教授也曾作过綿密的研究，精細地分析纐素的原本和历次补修本，發見了原本尙存六成左右，并且原本和修补本笔力相差很远。这个研究的結果，給了原本眞迹說以有力論据。③

尽管学者之間意見分歧，但認为这一圖卷即使不是顧愷之眞笔，至少当系六朝后期或隋唐时代最能代表顧愷之的風格和特点的摹本，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远自宋的米芾，近至明清諸家，都說它画品高古端丽，笔彩生动，气韵絕倫。“女史箴”原是西晋張华用来教育宫庭妇女的一些封建道德箴誡，但这一有永久艺术价值的画幅，却以一系列动人的形象，描繪了古代宫庭妇女在封建压迫、礼教束縛下过的眞实生活，是一部反映現实的艺术作品。第一圖画馮昭仪以身遮汉元帝当熊故事，描写玄熊佚出圈外，攀檻欲上，左右貴人惊走，馮婕妤直前当熊而立，意态堅定，神色恬然，表現了我国妇女勇敢、無畏、具有自我牺牲的高貴品質④。第二圖画斑姬不与汉成帝同載故事，描写與輦的劳动人民，在載着封建帝王和王妃的重压的輦下掙扎的情景，可以当作一幅很好的諷刺画来看。全卷最雋出的是第四圖临鏡梳裝。箴文是：“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飾其性……”，画家在这里巧妙地抓住了箴文“修飾”的意义，繪制出一幅絕好的風俗画片。这是全卷修补最少部分，特别是左端揎袖攏鬢的女子的手的姿势，画家确实尽到了以醇雅無比的圓細笔致，描繪出纖丽淑婉的姿态。这种笔意正是古人所常加以贊美的“春蚕吐絲”、“春云浮空、流水行地”那样自然流露，連綿不断，具有非常匀和的节奏感。全卷人物形象都能在动态中保持着姿势的均衡（美的均衡），这种均衡特别表現在立像——最好的代表是最后第九圖右端女子那种嬝娜嫵媚的姿态（顧愷之在这里天才地塑造了封建时代美人纖臂束胸、長衣曳地、嬝娜多姿的一个典型形象。），不能不令人嘆为“天才杰出、独立無偶”⑤了。

顧愷之不但是我国第一个杰出的画家，而且是我国第一个画学理論家。顧愷之关于画学理論的著作，現在保存下来的，有“論画”、“魏晋胜流画贊”、“画云台山記”三篇，都被收录在“历代名画記”中。这三篇論文，在張彥远以后，虽然經过了一些勘校訂正，但还是留下不少誤字脫字，詰屈不可句讀。我們現在只能就其中一些我們所能了解的，結合着他的創作实踐，概括出他关于繪画艺术的思想面貌的一个輪廓。

---

① 瀧精一：“英国博物館所藏顧愷之女史箴画卷”見“国萃”第287号。

② 內藤湖南：“支那繪画史講話”，見“佛教艺术”第七册。

③ 福井利吉郎：“临顧愷之女史箴卷”，見“东京美术学校校友会月报”1925年12月号。

④ 这一圖按照画的內容，分明是描写馮昭仪以身遮汉元帝当熊故事，但日人顧愷之研究家伊势專一郎却在他所著“支那的繪画”中，对于这一圖左端一个女子立像，加以歪曲的解釋。因为这一女子立像刻划得非常秀丽，神态悠閑，对于身傍發生的严重斗爭紧張場面表示漠不关心，一若無其事者。伊势專一郎竟把她說成是一个自由閑散的超現实的“閑散者”，并指出：在顧愷之的艺术世界里面，可能同时存在着兩个世界——斗爭的世界与閑散的世界。但据我們研究的結果，这一女子立像显然不屬于这一圖，而是屬于第二圖（描写斑姬不与汉成帝同載故事），即胡敬在1815年7月27日札記（西清札記）里所記“輦后二妃步行”兩个女子立像的一个。不知怎的，第二圖題詞把这兩个女子立像隔开了，唯美主义者伊势專一郎竟由此發生附会，实堪發噱。

⑤ 李嗣眞評語，見“历代名画記”顧愷之条。

我国关于繪画理論的探討，当以战国时代的“韓非子”为最早。韓非子外儲篇有这样一段話：“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問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無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前汉的“淮南子”亦有同样的說法。在卷十三中它說：“今夫圖工好画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出世，而狗馬可日見也。”这些都是討論作画的难易，內容当然是很素朴的。照他們的意見，繪画就是客观現实的反映。犬馬的画是描写現实存在的犬馬的。因为是描写現实，要描写得完全类似，几乎是不可能，所以說它很难。而且犬馬这种現实的存在，是人們日常所接触的，画了出来，馬上可以互相比較，判定它是否画得正确。而鬼魅却是想像的产物，不如犬馬以一定的形象摆在人們的眼前，描写就比較自由，困难的程度也就得到相应的緩和。而且鬼魅的描写，各人各样，千差万别，画了出来，也無从判定究竟是否画得正确。画工好画鬼魅而憎圖犬馬，是可以理解的。

后汉張衡更清楚地指出：“譬犹画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事实难形，而虛伪不穷也。”① 因为事实的描写要受到对象严格的約束，是很困难的，虛伪却可以任意加減，憑着想像加以虛構。在把繪画看作事实的描写一点，韓非子、淮南子、張衡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

但“淮南子”这一部著作，从它的成立过程看，可以預想含有各种思想內容，而在事实上确实是很复杂的。我們可以在这些复杂的思想內容中看出它的一个發展。在画学理論上，它一方面保守着傳統的說法，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在卷十七中它說：“画者謹毛而失貌。”高誘注：“謹悉微毛，留意于小，則失其大貌。”謹毛而失貌这一句話，意思就是太过于精密地描写細节，便会失掉了对象的“貌”。这个“貌”当然不只是对象的外部形貌，因为如果只是对象的外部形貌，是沒有理由会由于“謹毛”，由于精密地描写細节而至于失掉了的。这里所說的“貌”应該是指精神面貌，即內部世界的生命感情。一幅画幅如果太过拘泥于对象細节的描写，結果分散了注意力，抓不到对象的精神实質，不能集中地把对象的生命感情表达出来。在卷十六中更进一步具体地說：“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注曰：“生气者人形之君，規画人形，無有生气，故曰君形亡。”这里所謂“君形者”，不就是上面所說的“貌”——內部世界的生命感情的注脚嗎？因为短了这个生命感情，所以不管西施的面孔画得怎样美丽，总是沒有动人的力量，孟賁的眼睛画得怎样巨大，不能引起人們畏惧。

顧愷之作为这样的傳說的繼承者和發展者，在我国画学史上占着極为重要的地位。顧愷之一样把內部世界的生命感情（他所謂“神”或“生气”）的表現当作繪画的基本原則。他在“論画”中批評了“小列女”，說它只是追求外形的美，只是用力描写細节，“服章与众物既甚奇，作女子尤丽衣髻，俯仰中一点一画，皆相与成其艳姿，且尊卑貴賤之形，覚然易了”，但在追求过程中，却放走了新鮮的印象，不能从画幅上透出强烈的生命感，也就是淮南子所說的“謹毛失貌”“君形者亡”，舍本逐末，結果便犯了“刻削为容仪，不画生气”的严重缺点。他又批評了“壯士”，說它只画了“奔騰大势”，只把奔騰的空架子摆了出来，沒有画出壯士相应的激昂的气概（即奔騰的生命）。兩者都指出了它們只画出外部形貌，不能傳达出对象內部世界的生命感情。“世說新語”說顧愷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

① “后汉書：張衡傳”。

人問其故，他答道：四体妍蚩，本無闕少于妙处，傳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可以作为这一点的証据。因为生命感情最明显地流露在目睛中，既然把画的妙处放在这里，便可以看出他是把生命感情的表現（顧愷之所謂“傳神”）作为繪画創作的中心环节了。

我們說顧愷之作为傳統的繼承者，就是因为顧愷之所說的生命感情，只是对象本身的生命感情，画家只是把这生命感情表現出来而已。这里便含着只是被动地反映客观現实的机械論的因素，不能預想到画家独自的創造活动和構想能力。因为他所說的生命感情，只是对象本身的生命感情，如果对象本身沒有生命感情，便無从表現出生命感情了。事实上他是明白地这样說的。“論画”一开头就說：“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照張彥远的解釋，就是“鬼神人物有生动之可狀，須气韵而后全。”画家的任务就是把这个生动性表現出来。这是很困难的。至于“台閣、树石、車輿、器物，無生动之可拟，無气韵之可侔”，只是一定的器物，沒有什么生命感情，不能有生命感情的表現，問題只是“位置向背”而已①。从这一点看来，顧愷之还是保持着机械論的观点，和淮南子沒有什么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在这里提出了“迁想妙得”一个新的概念。这就标志着他对机械論的初步脫离，比淮南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所謂“迁想”，就是作家在思想上感情上与客观事物有机地联系起来，在創作过程中，免于被表面現象所迷惑。所謂“妙得”，就是妙得对象的“神气”——通过外部現象傳达出内在精神。一个作家决不能是一个冷眼的旁观者。他必須浸沉在他所呼吸着生活着的境界里面，把自己与周圍的事物打成一片，形成一个生活整体。从認識对象到表現对象，作家与对象之間是在精神上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作家被对象所吸引所感动的时候，只有当作家全神貫注于对象的精神狀态并被它所感染的时候，只有当作家以高度的热情企圖把对象的灵魂描繪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現象接触到它的内心世界。在顧愷之提出的“迁想妙得”这四个字中，我們可以体会到作为一个作家的顧愷之是怎样尖銳地感覚到一个作家的存在，一个作家最具有創造性的艺术劳动和構想力量了。

顧愷之又再进一步論述了怎样把对象的生命感情表現在画面。在“魏晋胜流画贊”最后一段他这样写道：“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視面前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傳神之趣失矣。空其实对則大失，对而不正則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从顧愷之的“傳神”观点看来，脫离对象，“空其实对”，固然無的放矢，是一个大缺点，但有了对象，观察得不准确，“对而不正”，不能深入到对象里面去發掘出对象的精神实質，还是一个缺点。必須特别注意的，是顧愷之在这里提出了“以形写神”的口号，正确地論述了“神”不能不借适当准确的“形”来表現，一定的“形”必然寄寓着一定的“神”——“神”与“形”的辯証关系。“神”与“形”是有分别的。“神”不同于“美丽之形、尺寸之制”（“論画”北風詩），它不作为素材表現在画面上，而是使形体生动起来的东西，是“虽不極体，以为举势，变动多方”（同上）的东西。“神”与“形”有分别，但又与“形”相即。他說：“刻削为容仪，不画生气。”生气的缺乏基因于形体的刻削。形体微妙地影响着生气。“画天师，瘦形而神气远”（“画云台山記”）；“作人形，骨成而制衣服幔之，亦以助神醉”（“論画”醉客）。長短、剛軟、深淺、广狹、上下、大小、醲薄、点睛等，如果有一点差錯，便会引起“神气与之

① “历代名画記”論画六法。

俱变”的严重后果。（“魏晋胜流画贊”）外形的变化与神气的变化是互相联系着的。神气必須通过外形表現出来，外形必須寄寓着神气在它里头，然后才能表露出它的生动性和眞实感。

顧愷之在我国美术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关于这一点，我想在这里引用周昉的一段故事作为例証。据說“郭令公婿赵縱侍郎，尝令韓干写眞，众称其善。后又請周昉長史写之。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尝列二眞置于坐側，未能定其优劣。因赵夫人归省，令公問云：此画何人？对曰：赵郎也。又云：何者最似？对曰：兩画皆似，后者为佳。又問：何以言之？云：前画者空得赵郎狀貌，后画者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情性笑言之姿。令公問曰：后画者何人？乃云：長史周昉。是日遂定二画之优劣，令送錦彩数百段与之。”（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这个故事突出地貫穿着我国画学傳統上論画难易——古典現实主义的根本精神。宋陈郁在“話腴”里面說：“写照非画物比，盖写形不难，写心維难也。”所謂“写心”就是“傳神”，就是通过可視的狀貌身姿傳达出对象的性格特征、思想感情。黃伯思評周昉的“按乐圖”云：“此圖尤有思致，而設色濃淡，得顧陆旧法，故可珍爱。”①王世貞評周昉的“擘阮圖”亦云：“此圖設色运笔，風神态度，几可与顧愷之陆探微爭衡。”②周昉描写人物，能于狀貌之外，兼移其神气，得其情性笑言之姿，不就是顧愷之所說的“迁想妙得”、“悟对通神”嗎？

在人民胜利的今天，美术工作者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树立起正确的美学观点，發掘出新社会的新人新事——他們新的精神面貌道德品質，最进步最优秀的思想感情、性格特点，并將其鮮明地如实地表現出来。目前祖国正迫切需要大批美术工作者到斗爭的最前綫，去为捍衛祖国建設祖国的崇高事業而英勇奋斗辛勤劳动的千千万万的人民功臣、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写照，把他們的英雄事跡模范事跡生动地突出地体現在鮮明的形象中，用来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在这个迫切的要求下，在爭取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斗爭中，重新温習一下顧愷之的艺术成就和理論成就，对于我們美术工作者說来，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

① 黃伯思：“东观余論”。
② 王世貞：“弇州山人集”。

訂　正

本刊8月号第18頁右欄第30行第4字“終是”应作“終于”。第19頁右欄第25行第2字“报”应作“执”。第20頁右欄第29行第5字“佛畔”应作“佛胷”。

評介厄斯納著"經济危机"第一卷*

苏 紹 智

經济危机是資本主义的不可避免的伴侶，也是資本主义經济中最复杂的現象。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問題进行理論的分析时，要避免抽象的一般的叙述，要避免教条式的說教，必須对經济危机的史实有充分的了解。馬克思在活着的时候，对于資本主义的各次危机都給予密切地注意。我們对于經济危机的理論往往理解得不深不透，这和我們对資本主义經济危机的具体情况知道得很少这一事实不無关系。所以，一本理論与历史密切結合的、有关經济危机的著作是会受到政治經济学的学習者和研究者的欢迎的。但是，这样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济危机的著作是不多見的。苏联著名經济学家瓦尔加曾著"1848年至1935年世界經济危机"一書，这部在1937年出版的四卷集的巨著，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可惜这部巨著在我国很少見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經济学家厄斯納所著的"經济危机"一書，也是一本从理論与历史兩方面来研究經济危机的著作，从篇幅来看，不及瓦尔加的著作的博大精深，但是也是一本好的参考書。这本書在目前能够翻譯和出版，絕不是多余的。

厄斯納指出，他这本書的任务是要將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論概括起来，把它应用到馬克思以后的經济發展上去，并从它得出适当的結論来。全書分为兩卷，第一卷的副标題是"壟断前的資本主义危机"，第二卷尙未見到，从作者在本書中所談到的看来，应該是壟断时期的資本主义危机。第一卷共分兩編：第一編是"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論"，作者在这里把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論作了概括的、系統的叙述。它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說明危机的可能性、必然性和周期性，又研究了危机的社会后果，包括危机对各个阶級的影响、对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影响。第二編是"至十九世紀末为止的經济危机史略"，作者在这里用很丰富的材料，逐一說明了工業資本主义以前的危机和十九世紀的各次周期危机，并且分析了这兩个时期的危机的性質；最后提出了十九世紀最后二十五年的危机性質的变化。所以，这是一本关于經济危机的理論与历史密切結合的著作。

本書的优点，首先是在經济科学的研究方法上給我們一些啓發。近来，在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后，大家对怎样进行科学研究提了很多意見，例如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从掌握大量材料出發等等，这些意見都是应該贊成的，但是究竟应該怎样去做，似乎还缺少些范例。厄斯納此書，从研究方法来看，可以在三方面給我們帮助。第一，它說明了研究經济科学，首先必須深入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掌握它的精神实質和立場、观点、方法。厄斯納研究了馬克思主义一切有关危机的文献，从而掌握了一个有力的武器。他以此为指南，正确地处理了大量有关危机的实际材料，并批判地吸收了資产阶級学者有关危机的研究成果。

---

*厄斯納："經济危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共269頁。

第二、它說明了科学研究不能停留在熟悉已有的馬克思主义的文献和結論上，也不能單純靠邏輯的推理，而是要掌握大量的实际材料，以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研究这些材料。厄斯納在本書中掌握了丰富的經济危机的历史材料，从十六世紀初直到十九世紀末。这就使他的叙述不致停留在几条干巴巴的結論上，还可以对原理有丰富的說明与闡發。这些实际材料又使得作者对問題的說明生动具体、有血有肉、富有阶級感情。第三、它說明了批判地研究資产阶級学者的論著，吸收其中个别合理的內容，对于科学研究是有帮助的。进行科学研究，当然应該首先致力于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去掌握与分析实际材料。但是，对資产阶級学者的論著采取虛無主义的态度也是不对的。資产阶級学者的整个理論体系尽管是錯誤的，不能就此否認他們的个别結論或說明可能是正确的。尽管他們企圖歪曲現实，不能就此認为他們的資料是完全不能利用的。我們說“不以人廢言”，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厄斯納大胆地和成功地以批判的眼光吸收資产阶級学者的研究成果，丰富了他的著作。举例来說，希法亭的整个理論体系是錯誤的，但是他在說明信用对危机的影响方面有一定正确的地方，厄斯納批判地采用了他的合理的部分。杜干--巴蘭諾夫斯基是个“合法馬克思主义者”，他的整个危机理論是錯誤的，但是他的著作中所用的材料还是有代表性的，厄斯納批判地运用了他的材料。当然，首先这样做的并不是厄斯納。大家知道，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曾批判地吸收馬克思以前的一切資产阶級經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列宁的帝国主义論也曾大量地运用資产阶級的統計材料。

厄斯納这本書在經济危机的理論方面也有卓越的叙述。这主要表現在危机的必然性和危机的周期性这兩个問題的說明上。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論应該能够正确地說明危机的可能性、必然性和周期性。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論是唯一能够滿足这一要求的。关于危机的可能性問題沒有什么可以多說的了。关于危机的必然性和周期性問題在經济学界还有所爭論，还有进一步研究和討論的必要。

关于危机的必然性問題，危机的基础和产生的基本原因是找到了，大家知道，这就是資本主义的制度本身、資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是这还不能全面、具体、細致地說明危机这么一个复杂的現象。馬克思曾經周密地考虑到形成与影响危机的一切复杂的因素，他的見解散見于“資本論”、“剩余价值論”及其他著作中，特别在“資本論”第三卷第十五章有过細致的分析。但是，由于馬克思沒有留下一个概括的說明，他的整个分析未曾被人充分注意。厄斯納在深刻研究馬克思关于危机的文献的基础上，把这一切复杂的因素作了系統概括地說明。

厄斯納正确地指出：“社会的生产和資本主义的占有之間的矛盾，乃是經济危机的最后原因。但这个矛盾并不直接导致危机，而是当它發展为新的、其他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諸矛盾时，它們便引起危机。”（第24頁）然后，他詳尽地分析了这些矛盾，除了我們在一般政治經济学書籍中所看到的生产和市場之間的矛盾（消費不足生产过剩）和个别生产部門之間的矛盾（非比例性）外，他还詳尽地分析了利潤率下降趋势的規律的內部矛盾的展开問題，这里他研究了一系列引起危机的新因素：利潤率平均化不能順暢地进行、增長着的生产力和下降着的价值增殖可能性（利潤率下降）之間的矛盾、資本过剩和相对人口过剩等。他又进一步詳尽地研究了信用和世界市場对危机的影响。这一切分析又都在危机的历史部分得到了具体的說明。这样，他大大地丰富了危机必然性問題的說明，使它具体化了。同时，由于他牢固地掌握着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并沒有像資产阶級学者那样在复杂的現象中迷失方向，他最終把資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对

立，归結到資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归結到資本主义制度。

經济危机周期性的問題是政治經济学理論上的一个疑难問題，經济学家們还有不同的看法。厄斯納在本書中提出了一种看法：危机是循环期的有决定性的阶段，資本主义生产周期發展的原因就是那引起危机本身的同一矛盾。固定資本的周轉并不是危机的原因，它只是危机周期性的物質基础，也就是說它只对循环期限有意义。

关于固定資本的周轉是危机周期性的物質基础这一問題，經济学家們也有不同的解釋，厄斯納根据馬克思所提出的基本原理作了充分的說明。归納起来，可分以下几点来說明：首先，他指出这个問題是与說明循环的期限有关，不是要說明危机周期性的原因。把固定資本的周轉看作危机周期性的原因是不对的。其次，固定資本的周轉之所以变成危机周期性的物質基础是因为，随着資本主义的發展，資本有机構成不断提高，不变資本首先是其中的固定資本不断增長。这样一来，固定資本在它的数量上和它的重要性上就不断增加，它的周轉終于变得对資本主义工業的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意义。第三、循环之所以有一定的期限，比方說十年，这是因为，固定資本由于有形損耗和無形損耗的作用，平均寿命大約是十年左右，到时候固定資本便要替换，这就給新的循环提供了物質基础。他随即指出，十年或七年这些絕对数字是沒有决定意义的，循环期間可以因生产力的發展而逐漸縮短。第四，作者發揮了馬克思的"危机总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点"的說法。他指出，各个企業的資本投下的时間可能極不相同，但是主要的工業部門大致都在危机之后进行新的投資或更新固定資本。他說，"現在那經住了風暴的資本就能將它們的固定資本更新，对生产資料的需求增加，使其他一切生产部門都受激动，于是發生新的高漲，重新有大批大批的固定資本投入生产。还有些資本家，他們的固定資本的寿命并未完畢，在危机中为了保持竞爭能力，也企圖提前將他們的营業設备更新。工業就是这样地通过固定資本的周轉而被束縛于循环期当中"（第94頁）。

这些說明在第二篇危机史略部分中得到証明，例如，1825、1836、1847、1866、1873、1882年的历次危机年分以后都有大量固定資本的更新和新投資，形成了复苏后下一次高漲的基础，也就是为下一次的危机准备了条件，而通过危机又使固定資本大規模更新，这样，循环返复就形成了危机周期性的物質基础。

作者在第二編經济危机史略部分中，分别說明了工業資本主义以前的危机和十九世紀的周期危机的历史。他揭露了至十九世紀末为止的历次危机的性質，并說明了資本主义的周期性的危机逐漸成熟的过程。

工業資本主义以前的危机和資本主义的危机是不能混为一談的。十七、十八世紀的危机是純粹的貨幣、投机和信用危机，它們大多数是由經济以外的原因所引起来的。十九世紀初期的危机虽也具有若干早期危机的特点，如証券投机、信用过度紧張、公司創設狂以及受到外来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已出現了一个最重要的新的特点，即生产过剩。所以，十九世紀初期的危机是过渡的危机。从1825年起，便开始了由資本主义經济的內在規律性产生出来的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到十九世紀的最后二十五年，由于資本主义發展上的新因素——壟断資本主义——的出現，危机在性質上也出現了新的变化。这样的对危机的史的說明使我們可以更好地区别危机的表現形式和危机的本質，从而批判"大多数危机研究者的主要錯誤"，他們的錯誤"就在于他們把这种表現形式看作事情的本質，因而永远拘泥于表面現象"（第177頁）。

第二編的优点还在于把历史和理論結合

得很紧密，能运用第一編所叙述的理論来分析历史，又能从历史来証明、来补充理論的說明，前呼后应，相互發明，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書当然也不是完全沒有缺点的，它的第一个缺点是写得不够簡潔。最基本的、一般性的理論，如商品生产的矛盾、商品的形态变化、再生产的实現条件、平均利潤与生产价格、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等等的叙述所占的篇幅过多，因而使整个的理論部分不够重点突出。其次，在史略部分，引用的史实較多，对浩繁的資料缺乏系統的加工和整理。第三，一般的政治經济学著作都对資产阶級学者的危机"理論"缺乏全面的分析批判，特别是对資产阶級学者对馬克思的危机理論的歪曲沒有批判；本書虽然批判地吸收了資产阶級学者論著的个别的合理內容，但是对于歪曲理論的批判，是进行得不够的，这不能不說是一个缺点了。目前資产阶級学者本身不仅有形形色色的危机"理論"，他們对馬克思的危机理論也有形形色色的歪曲的解釋，例如，哈伯勒認为馬克思的危机理論是"消費不足論"，博洽德、史威塞等人認为馬克思把利潤率的下降作为危机的原因。这些形形色色的資产阶級的謬論，特别是后者，对工人运动具有很大的危害性。給它們以尖銳的批判是具有很大的現实意义，并且能够大大提高本書的战斗性。

总之，厄斯納的这本書是經过了深刻的科学研究，能够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所提出的論点是有說服力的，因而也是可以为人所接受的。虽然也有些缺点，但是，瑕不掩瑜，这是一本好書，我們希望第二卷能够早日与讀者見面。

編 者 致 作 者

我們誠恳地希望給本刊撰稿的同志們，尽量把文章写短些。

理由是大家都知道的：讀者普遍地不欢迎長文章，讀起来費时費勁，常常不能卒讀。

我們也想在有限的篇幅內，尽量反映更多的意見，發表更多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广大的作者和讀者的共同願望。随着百家爭鳴的开展，这一要求越来越是强烈。

我們感謝作者同志們給本刊撰稿，欢迎繼續踊躍賜稿，但是希望文章能够短些。在一般情况下，每篇不超过一万字。一万字以下的更所欢迎。我們相信，文章只要組織得好，字数虽少，也絕不会損害它的內容，反而显得更为精萃。

氾胜之書今釋（初稿）

石声汉著

氾胜之書，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專著农書，作于西汉末年（公元前一世紀之末），以黄河流域的旱农为对象。書已散佚。这个今釋本是就現在殘存的材料整理校勘所得；如有可疑的难解的字句，和不常見的單字，都用近代語加以注解；并逐条用語体文作了釋文。一般讀者，都可直接閱讀。

附录的"氾胜之書分析"是从近代科学知識的基础上总結了全部內容，并將氾胜及氾胜之書底时代与环境背景，作了分析。

（估計11月出版·京版）

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業科学知識——整理"齐民要术"的初步总結

石声汉著

"齐民要术"是公元第六世紀前半作成的。本書在現代科学的基础上，对"齐民要术"底內容，作了一个全面的精詳的分析。首先簡明地介紹了"齐民要术"本身底历史和过去研究"齐民要术"的情形。重点地把"齐民要术"底內容材料，作了縱的（时代的）和横的（农学門类的）分析；考証了"齐民要术"所引用的更古典籍底时代，把"齐民要术"中首次出現的原始記載，分作：1、时宜与地宜認識；2、农艺；3、蔬菜；4、果树；5、屬于以上各項的一些特殊方法和技术知識。最后叙述"齐民要术"对我国后来农学的影响。

（估計11月出版·滬版）

中国区域地層表（草案）

中国地質学編委会
中国科学院地質研究所 合編

这个草案里包括地層表的初稿計81个，就初稿的基础再經簡化和加工的地層表共10个，末后附以参考文献目录。內容包括岩性、化石、分布、厚度、較重要的沉积矿層、火成岩的穿插和变形变質的大略情况等。（京版）

定价 精裝报紙本6.80元
精裝道林紙本9.60元

馬叙倫学术論文集（第一集）

馬叙倫著

本書收集了作者四篇关于文字学的論文。第一篇"中国文字之源流与研究方法之新傾向"是从中国文字構造方法的六書去研究中国文字之發展和演变，同时批評了过去和近时的文字学家的研究缺点，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研究方法。第二篇"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必須了解中国文字"是从中国文字的結構上發現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痕迹，以便找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方法。第三篇"跋石鼓文研究"是研究和考証石鼓文的时代和文字的論文，也提供解答一些質疑的問題。第四篇"孙籀庵先生投瀋古录金文逸記叙"是作者讀了孙先生的手稿后，提出了一些字义的討論，并介紹孙先生的治学方法。

（估計12月出版·滬版）

語言学論文选譯（第二輯）

本書选輯了苏联"語言学問題"和"苏联科学院院报"——"文学与語言"的有代表性的社論和論文三篇。全面而扼要叙述苏联語言学三十多年来發展中的优缺点，詳尽地分析和評价了語言学辯論后几年中的現狀，并着重指出了今后苏联語言学的具体任务，包括批判資产阶級唯心主义語言学理論、語言的历史研究、历史比較研究、語法研究、方言研究、語言規范化、詞典、正字法、借詞問題、語言教学、少数民族語言、东方語言研究和干部培养等方面。从这三篇論文中可以加深我們对苏联語言学的認識。（估計11月出版·京版）

考古学通論

A·B·阿尔茨霍夫斯基著

本書是从A·B·阿尔茨霍夫斯基的原著第三版（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54年出版）譯出的。阿尔茨霍夫斯基現任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本書是他写做高等学校学生适用的考古学教本。因此，本書的特征是：取材以苏联境內考古發掘及考古研究工作的成果为限，依次叙述：1、石器时代；2、青銅时代；3、鉄器时代；4、曾在苏联境內存在过的奴隶占有制和封建国家，而在全部叙述中，著者根据考古發現闡釋人类社会發展的进程，充分論証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則。这使得本書在苏联成为学習考古学的津梁，在我国也可供整理研究考古資料的参考。

（估計12月出版·京版）

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書店發行

零售每册三角五分